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21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0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6,000册

书号11310·46 定价1.5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回顾……………薄一波(1)

回 忆 录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淮海战场上……………滕海清(16)

资 料 概 述

淮海战役综述…………… 南京军区《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30)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新军概况

…………… 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63)

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概况

…………… 山西新军第二纵队史料征集组(84)

专 题 资 料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

- 在汉情况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113)
-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自武汉迁上海的经过
.....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 (128)
- 福建查田运动的前前后后
.....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32)
- 拉法、新站战斗有关简况
.....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吉林蛟河县委党史办公室 (148)
- 英雄的红军第三十四师 朱光梅 (154)

大 事 记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记事 傅国祯 周宏雁 (167)

附 录: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至第二十辑目录 (232)

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斗争历史的回顾*

薄 一 波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策略的产物，作为我党领导之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和军事组织，在抗日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抗日斗争光辉史册的重要一页。成立牺盟会，最初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所属各团体的核心组织）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成立不久，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顿。一九三六年十月，北方局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山西工作时决定成立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山西公开工委）它直接归北方局领导。最初的成员是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由我担任书记。我们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手牺盟会之后，就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方针

* 本文是薄一波同志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在纪念牺盟会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部分。文章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和策略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共山西公开工委，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和策略，具体领导了牺盟会以及后来建立的山西新军的斗争。这个委员会，专门做抗日救亡工作，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得名叫公开工作委员会；在组织上则是秘密的。按照北方局的规定，它同由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月后改为中共山西省委）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工作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组织，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委员会的成员陆续又增加了十一位同志，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来的，他们是：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当时在党内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有这个组织。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历程，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即创建阶段、大发展阶段、反磨擦阶段，以及“十二月事变”后的那个阶段。在最后那个阶段里，为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牺盟会继续活动大约一年，而山西新军则加入八路军序列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每个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的具体工作重点和策略运用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大致是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这将近一年里，我们接手并改组了牺盟会，开展了

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特别是训练军、政干部、组建新军的工作。这期间，我们的工作主要放在站稳脚跟、抓住实权、推动抗日上。

一九三六年，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阎锡山在山西的长期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蒋介石策划河东道独立，企图夺取这块地盘。红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主席曾致书阎锡山，敦促其联合抗日。在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山西当局的上层内部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变化。这时，阎锡山构想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打着山西的旗号，仿照共产党的某些措施，用这种办法来应付时局危机，度过难关。从我们党来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利用山西出现的形势，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推动阎锡山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破一点，去影响全局，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阎锡山邀我回山西工作。经北方局批准，我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作为抗日救亡人士应邀来到太原。动身前，我向北方局汇报了我九月间回太原时所了解的情况，认为在那里可以有所作为，并提出了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站住脚跟，不作“清客”，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能接受的事情；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踏踏实实地

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个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批准。

到太原后，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依照上述工作方针的精神，向阎提出了三点要求。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作客，按照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从此开始，我们逐步地同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阎锡山知道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八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营救”我出狱并邀我回山西工作时，郭知道我们在监狱中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郭早年曾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坐牢多年，后投靠了阎。我同他在草岚子监狱见面时，开始还不知道他已是阎的人，曾告诉他党组织正营救我们出狱，他回去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阎。后来，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张厉生也一再向阎锡山通报过我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阎那时已倾向于抗战，他正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替他打开点局面，完成所谓“保晋大业”，以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阎锡山自信他能在这局险棋中赢得最后胜利。我们也明明知道，阎锡山不可能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

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暂时同盟，我们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也深信，依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同阎锡山合作，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工作并发展抗日力量，就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猾，城府很深。怎样办？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了不少“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清楚这都是怎么回事。一九三七年初，我经过北方局向党中央要来陈玉堂、苏鲁、孟庆山、黄振荣、白书棋等十位红军干部，放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由周仲英同志管的那个连，被梁化之发现了。他气急败坏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明确告诉他，要来的这些人是红军干部，是请他们教学员们打游击战的。阎知道后，没有责难，认为我们讲真话，不骗他，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工作初期，我们是十分谨慎的，尽可能地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办山西当局所允许办的事。赵戴文曾当着阎的面提出，要求我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角，我们表示同意，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在山西当局的政府和军队中发展党员。当时这样做做对了，它便于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否则就站不住脚。

如何对待和处理戴“山西帽子”和“官办团体”问题，是这个阶段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曾有过

争论。在我们接手牺盟会之初，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官办团体”不能发动群众抗日，力主把牺盟会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由我们组织起来的山西抗敌救亡先锋队，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没有照办，引起了争论。刘少奇同志得知后，明确指出：牺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官办”的，否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把牺盟会和抗敌救亡先锋队改为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准许，我们不能那样办。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张友清同志汇报工作时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过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批评了那种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决死队建立不久，又有的同志坚持说，戴阎锡山的“帽子”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反对了这种意见。他们强调指出：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戴“山西帽子”；戴这顶“帽子”对于我们没有妨碍，而且有许多便利。

在抗战以前的这个阶段，当时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最后形成，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公开工作委员会审时度势，小心谨慎地运用阎锡山的进步口号开展工作，着重反对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十分注意团结阎锡山，推动他走向抗战。斗争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拉阎锡山后腿的“山西省主张公道团”等右翼力量。我们正确地运用“山西形式”（即戴“山西帽子”）和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官办团体”，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阶段的大发展，大致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二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当年八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不要怕破裂，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时，合作才能持续下去。当时，我们正在准备并已开始大刀阔斧地干，北方局的指示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给了我们有力的推动。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很快地就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而牺盟会和刚刚成立的决死队则在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军。这时，阎锡山在日军进攻下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对旧军已失去信心。他寄希望于牺盟会和决死队来帮他支撑和扭转山西的危局。在雁北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会议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阎锡山进步倾向最为明显的时期，我们提出的意见，他一般都能采纳，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支持也比较多。

在这个大发展阶段，公开工委坚决而又策略地执行了洛川会议精神。我们及时地转变了工作方针，把主要反对关门主义，改变为主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在继续保持同

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的条件下，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并且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建和扩大新军方面。这一重点转移，是有战略意义的。在当时，掌握和扩大武装这件大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同时，我们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成立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在敌后建设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牺盟会在这些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本侵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八路军的到来和英勇地向敌后进军，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强有力地支援了山西公开工委领导的斗争，对牺盟会工作的开展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无疑起着十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主力部队作坚强后盾，到一九三九年夏，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七十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二十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人左右。同时，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及行政区所属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县长大都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也有从新军中抽出干部担任的，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担任县长后，进一步改造了区、村政权。这时，地方党委，主要是县委，大都建立

起来了，以上这些工作地方党委做得更多些。

这期间，山西新军有了迅猛的发展。到一九三九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一个暂编师（由战动总会组建的），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五十个团，其中有四十六个正规团，约五万多人，实际兵员超过了当时的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等地区，依靠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直接指挥下，阻击日军进攻和反围攻，进行大小战斗上千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保卫了人民，并且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以反对阎锡山妥协倒退和粉碎“十二月事变”为主要标志的第三阶段，大约是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〇年春。在这一阶段，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继续抗日、继续团结、继续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这个根本问题上。当时最紧要的是山西新军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斗争十分尖锐。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北方局的指示，山西公开工委和山西各级地方党委正确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依靠群众力量，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确保了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切实掌握了民主政权，巩固并扩大了已经取得的胜利。

随着工作的展开和斗争的深入，北方局曾经一再提醒我们：要经常想到阎锡山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

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新军配合八路军不断打击和箝

制敌人，逐步稳住了山西的局势。这时，阎锡山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新军、牺盟会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他感到控制不了了。于是，他下决心要取消决死队、牺盟会以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各进步群众团体。他从当年二月的临汾会议开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八月间，他在吉县的古贤村召开的会议上，就策划“收回”新军，重整旧军。他提出煽动性的口号，鼓励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使群众尽为我用”，“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如此等等。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当局在全国酝酿着一股反共投降逆流。三月下旬，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把他早已暗下决心采取的倒行逆施公开化了，公然说什么：“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投降论调，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在会上，他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夺取新军的领导权，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的反动措施，受到我们的坚决抵制。

在秋林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山西公开工委的成员和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开过几次会，并利用散步机会，以“闲谈”方式，碰过多次头，做了应变的具体部署。

向各新军和各牺盟中心区、各专区、各县政权的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不怕翻脸，不怕破裂，回去以后要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财粮，特别是要抓紧时间把顽固的反共旧军官从新军中坚决清除出去。

与此同时，雷任民同志从秋林返回晋西北时，曾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听汇报时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现在是天下大乱，到处为王。意思是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要敢于打开新局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底，阎锡山“命令”决死队第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让旧军紧跟背后“配合”，想与日军对二纵队两面夹击，消灭二纵队。韩钧同志警觉性很高，拒绝执行，电阎陈说道理，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即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公开“讨伐”。于是，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最大进攻。

“十二月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央军委即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我~~ ~~决~~ ~~死~~ ~~二~~ ~~纵~~ ~~队~~，我决死二纵队、二〇九旅在新军各部的 ~~强~~ ~~大~~ ~~声~~ ~~援~~ ~~下~~ ~~坚~~ ~~决~~ 还击。在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工卫旅、 ~~晋~~ ~~西~~ ~~部~~ ~~等~~ ~~新~~ ~~军~~ ~~各~~ ~~部~~ 也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在晋 ~~东~~ ~~南~~ 处境险恶的三纵队，由于应变措施不力，受到严重

损失，但有些部队血战到底，冲出了重围。一纵队也协同主力部队打退了蒋、阎勾结的进犯。在北方局的帮助下，二一二旅、二一三旅突破日顽封锁，转移到晋东南，与决死一纵队会合。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除个别部队如陈士榘支队直接参战外，我八路军象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新军后面，阎锡山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这次事变终于被粉碎了。

阎锡山在“十二月事变”中玩火自焚，招致惨败。他的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等主力部队，都遭受重大损失。除了由他派到决死三纵队的反动军官拉走该部的三个总队以外，别无所获。

在秋林的牺盟总会，在“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也用各种方式同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把绝大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全地撤了出来，有一批干部和学员撤到陕甘宁边区。牺盟总会原来是和第二战区政治部在秋林一起活动，“十二月事变”后，在顽固派的重重压迫下实际上已不能再在那里开展工作。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奉党中央指示，做了仁至义尽的规劝和争取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指示以我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报中说：“为今之计，亟宜有钧座调和，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二十五日，我党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达秋林，

向阎锡山阐述关于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并且提出具体建议。经过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度的公路为晋西北、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虽然新军和旧军划地分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这一阶段的斗争说明，当阎锡山准备投降，背信弃义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在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后，我们根据中央、北方局指示坚持做到给阎留有余地，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继续抗战，这种策略，以大局为重，是很有远见的。

“十二月事变”后，牺盟会还在部分地区断断续续活动了一段时间，至一九四〇年冬停止了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山西新军经过整编仍保留原来的番号，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从“十二月事变”之后到抗战胜利这个最后阶段中，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争取阎锡山，有些电文仍抄报给阎，他只打收条不复电。在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保持了中立。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勉强维持到抗战结束，这对于稳定山西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这个第四阶段中，山西新军分别纳入晋冀鲁豫军区和晋西北军区建制后，继续坚持在敌后沉重打击敌人。一九四〇年有二十二个团参加了百团大战。以后，主要是进行反“扫荡”战斗，还参加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围困沁源的著名战斗。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山西新军的一

些团、队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

一九四〇年三月北方局在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我党领导之下的牺盟会，“由于抗战以来客观形势的发展，这一组织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建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党中央同意这一评价。在一九四三年我向毛主席汇报山西工作时，他欣慰地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正确策略路线成功的一个例证。

牺盟会以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程告诉我们：我们党领导牺盟会、决死队，在策略的运用上是成功的，斗争经验是丰富的。这些经验，是我党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经验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说：“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

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他又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很显然，在四十三三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说这个论断和评价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 在淮海战场上

滕 海 清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可喜变化。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震惊中外、气势磅礴的淮海决战的伟大决策。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中野）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密切配合、浴血奋战，歼灭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我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席卷江南、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淮海战场上，二纵随华野主力东击西进、南截北堵，千里迂回、纵横驰骋。首歼敌一〇七军，激战徐州东南，猛攻敌邱清泉、李弥东援兵团的后路，威逼徐州，为全歼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条件。继而沿津浦路南下，截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掩护中野全歼黄维兵团。随后挥师北上，坚守郭楼，阻止了杜聿明集团的突围。最后直捣陈官庄全歼守敌，胜利地完成了总前委和华野首长交给的各项任务，经

受了空前的锻炼和考验，用自己的行动在人民解放军的军战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一、蛟龙湾出击

十一月六日，淮海决战拉开了序幕。

中央军委根据我军兵力的情况和华东战场敌军一点两线部署的特点，决定以首歼黄百韬兵团作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战役一开始，华野即以两个纵队配合中野四个纵队在徐州以西牵制敌人，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担负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和打援，以斩断刘峙集团的右臂，吸引敌军东援，以利我在徐州西、南、北三面的广大地域歼灭之，这是一着高超的妙棋。

二纵担任苏北兵团的突击军、任务是从临沂东南的蛟龙湾出击，直扑阿湖地区黄百韬兵团的二十五军，完成中间突破，切断其东撤海州，西撤新安镇的退路。离开蛟龙湾后，二纵昼夜兼程，于八日下午抵阿湖地区，发现敌二十五军已西撤，遂转兵西进攻击新安镇守敌六十三军，该敌又向窑湾撤退，奉命追击。九日下午，二纵受令速度沭河，经邵店、曹家集、越运河进至蔡集、耿车地域截击黄伯韬兵团向西南逃窜。纵队马不停蹄，九日一夜跑过十六个村庄，一百三十多华里，到达沭河岸边。

沭河两岸相距二百多米，水面有八、九十米宽，水深三至五米，水流甚急。收集到的船只大都是些小船，骡马、重炮难以渡过。兵贵神速，必须迅速架设浮桥！战士们跳

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架桥。附近的老乡闻讯也抬来门板、木料帮忙，很快架好三座浮桥。纵队飞兵急进，十一日抵指定地域。部队连续急行军五昼夜，迂回千里，体力消耗很大，但仍保持着旺盛的士气。二纵参加了济南战役的南线打援之后，在鲁南蛟龙湾进行了休整。在休整期间，部队根据华野曲阜会议的精神，进行了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形势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识大局、顾大体的觉悟，坚定了打大仗、打恶仗、打到底、坚持到底的信心。经过以攻坚战术为主、辅之以平原和山地的野外攻防战术、技术的训练，纵队的军政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因而自蛟龙湾出击以来，尽管任务紧急多变，跑路甚多，而部队却犹如蛟龙出水，锐不可当。

二、全歼敌一〇七军

十一日夜，纵队得知黄百韬兵团已被我主力包围于碾庄圩地区，邱清泉、李弥兵团正沿陇海路两侧东进救援。鉴于敌救援心切和邱清泉惯用迂回战术的手法，华野首长命二纵兼程西进，沿潘塘、东贺村一线猛攻敌侧翼，楔入敌纵深，切断邱、李兵团的后路，威逼徐州，并相机攻歼敌一〇七军。

敌一〇七军辖二六〇、二六一两个师，分驻双沟和睢宁，扼守徐州东南的门户，是二纵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黄百韬兵团被围后，敌一〇七军已成惊弓之鸟，向“徐州剿总”要来大卡车，准备连夜向徐州撤退。如果敌一〇七军

撤回徐州，势必会增强徐州的防务，如果依附敌邱、李东援兵团，则将增强邱、李部队的战斗力。二纵离双沟镇有百里之遥，要消灭敌人有很多困难，但纵队领导研究了各种情况之后，决定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轻装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敌人，消灭敌人。二纵以四师在左，六师在右为第一线部队，五师为二梯队紧随其后，沿途不受少数敌人的干扰，以双沟镇为合击目标追歼敌人。

十二日上午，四师先头部队便在睢宁西北三十多里处的高集，邢圩子追上了敌二六〇师的后尾部队，在大王集追上了敌一〇七军的军部和直属队。四师以一个加强营监视和阻击大王集敌人，其主力继续沿王牌坊、鲍滩、白土庙、循海郑公路向双沟进击。六师沿海郑公路以南龙集之线追击，先头部队中途与睢宁西撤的一〇七军主力遭遇，俘敌四十余人，敌主力即向东回窜邢圩子。六师主力仍按原计划前进，下午五时，攻占双沟。五师尾四师、六师沿海郑公路追击，至邢圩子发现敌人正埋锅做饭，即以十三团、十四团及淮北独立团迅速将敌包围。纵队令炮团赶到五师，十三日拂晓发起总攻。

敌被围后，其军长孙良诚诚惶诚恐，半夜亲自乘吉普车出来与我五师接洽，声言愿意率部到离邢圩子三十多公里的朝阳集起义。五师方中铎政委义正词严地告诫孙良诚：“你的部队已被包围，只有放下武器迅速投降。否则，我们将用战斗来解决。”孙良诚要求给他时间考虑，五师限期让他作出抉择。

孙良诚是伪军出身，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收编。他在苏北扬州、宿迁、睢宁地区作战相当卖力，得到蒋的信任，是伪军收编后唯一能升任副司令官兼军长的人。他的参议周镐原是国民党军统局驻南京站的站长，抗战胜利因贪污被通缉，逃到苏北投降了新四军。他为了立功自赎，积极作孙良诚的工作，奔走于新四军和一〇七军两年多。在淮海大战前，孙良诚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在南京与冯治安、刘汝明向蒋宣誓尽忠；一方面又答应周镐在适当时机举行战场起义。淮海大战爆发时，周镐赴解放军联系起义未回。当十一月八日下午，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起义后，蒋介石派飞机投亲笔信给孙良诚表示“慰勉”，孙又动摇，连夜向徐州撤退。被围以后，由于周镐未回，孙犹豫不决。

十三日上午，周镐赶回。周认为此时起义已失良机，唯有接洽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孙良诚眼望着我军已做好了攻击准备，抵抗是徒劳的，便于下午七时率二六〇师交械投降。

十四日拂晓，纵队四师于双沟二十多公里处的房村、观音堂追上了敌二六一师主力，攻占房村后，敌固守玫瑰山。四师与敌激战数小时，全歼该敌，唯敌师长孙玉田逃窜。

二纵全歼敌一〇七军，共俘敌八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三十多部运输车辆。纵队在兵员、装备方面得到了较大的补充，部队情绪更加高涨。纵队歼灭一〇七军后，打开了徐州东南的门户，解除了侧后威胁，为进逼

徐州切断邱、李兵团退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在电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时，特对此予以表彰。

三、激战徐州东南

黄百韬被围后，敌东援兵团在空军和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我大许家一线阻击部队连日猛攻，但伤亡惨重进展甚微。蒋介石在发给邱清泉的电报中说：“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不惜一切牺牲……以解黄兵团之围。”严令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者军法从事。杜聿明亲到前线督战时，看到我军奋勇冲杀，反复争夺那种令人丧胆的气势，失去了从正面突破的信心，便与邱清泉商议：令其七十四军沿房村、双沟向大许家迂回我军正面阻击部队，以收前后夹击之效。

由于我华野首长对于杜、邱这种惯用的伎俩十分清楚，因而我军对此预有准备。十四日夜，当敌七十四军先头部队抵房村时，便遭二纵迎头痛击。邱清泉暴跳如雷，严令七十四军继续攻击，但均遭有力反击，无法继续前进。

十五日，苏北兵团展开切断邱、李兵团退路的作战。二纵担任由潘塘和柳集之间攻击前进，楔入敌之纵深的任务。

潘塘是徐州的咽喉要地，它西距徐州十八公里，离徐州机场仅八公里。友邻部队切断了津浦路徐蚌段后，机场便成为徐州唯一的生命补给线。敌人以重兵扼守，潘塘与柳集之间不足五公里的正面上，摆了五个师又一个旅的兵

力。要单刀直入地楔入敌之纵深，这是一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也是一步险棋，成败事关全局。为切断邱、李兵团的退路，减轻大许家一线我正面阻击部队的压力和为友邻兄弟纵队创造歼敌的有利条件，二纵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勇陷敌阵。纵队首长要求二纵全体指战员具有“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严令各师夜间要迅猛地攻击，前进，再攻击，再前进；白天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已得的阵地，寸步不能退，寸地不许丢！

当晚，纵队即以四师、六师为第一梯队，五师为第二梯队，向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四师沿魏家河、土圣庙、前后曲头一线为轴线攻击前进。经反复争夺，歼敌数百，夺得其阵地。六师沿二陈集、李村、王塘一线为轴线攻击前进。在王塘战斗中，该师十六团打得英勇顽强，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七十四军一七三团。战斗中，该团八连连长张春礼见主攻连受阻，立即转助攻为主攻，亲率突击排向敌纵深猛插，连续夺得四所院落。张春礼两次负伤，突击排只剩六人，然仍坚持战斗。战斗小组长王洪仁腹部中弹，肠流一地，仍咬牙跪在地上向敌投弹；二排长董家民胸部中弹，血流如注，他用枪托堵住伤口继续射击；刚解放过来的一〇七军新战士王成信把头上的国民党军帽扔在地上，高喊着：“连长这一面我负责！”他们抵住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直至后续部队冲上来将敌歼灭。

由于当晚各部队进展有快有慢，我军阵地与敌人阵地犬牙交错，为抗击敌人次日反扑，纵队遂将先头各团部署于魏家河、七圣庙、王屯、前后曲头、王塘、李村一线。

部队不顾彻夜激战的疲劳，抓紧抢修工事，准备明天鏖战。

十六日十一时，敌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向我魏家河、郭湖、李村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敌人在密集的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集团冲击，数次突破我前沿阵地，但均被我击退。敌人弃尸遍野、激战直至黄昏。

经过昼夜激战，敌七十四军遭受了重大打击，遂龟缩至潘塘不敢动了。邱清泉连夜从前线指挥所赶回徐州近郊的团山后方指挥所。他担心潘塘守失、机场不保，徐州有失，急令七十军三十二师由霸王山火速车运柳集，以保障十二军和七十四军的结合部。又恐兵力不足，将守备在鼓山的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军九十六师调至潘塘加强守备。

十七日晚，二纵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四师攻击陈屯、文庙守敌，攻势凌厉，迭克敌阵，进展神速。六师攻击前、后蒋楼，顺利突破敌前沿后，勇猛向纵深发展，歼敌一个团，俘敌近千。纵队前出部队直逼潘塘、柳集阵前，志在必得。十八日晨，敌在十二架飞机和数辆坦克的掩护下疯狂反击，但均被击退。

十八日晚，野司鉴于柳集、潘塘集敌重兵，遂令二纵向东转移至水口、小店地区，协同友邻纵队攻歼鼓山、狼山、仲山、盛山、马山守敌。激战三昼夜，歼敌七〇军一三九师大部，夺得其阵地。在马山战斗中，十四团余铸义团长以身殉职。

二十日下午，总前委在来电中说：刘峙因受韦、吉（苏北兵团首长韦国清与吉洛，吉洛即姬鹏飞）威胁，正令李

延年向北急进，欲与黄维兵团会师，令苏北兵团南下阻击。据此二纵当晚即撤出徐州东南战斗，挥师南下。

二纵在徐州东南连续五昼夜侧击敌东援兵团的作战中，楔入敌之纵深四公里，歼敌七〇军一三九师大部、七十四军三个团，粉碎了杜、邱迂回侧击我正面阻击部队的诡计，调动了邱、李东援兵团的主力，震撼了徐州守敌，有力地保障了歼灭黄百韬兵团。

四、南线阻截

黄百韬兵团被歼之际，总前委作出了首先歼灭黄维兵团的决策，因为根据淮海战场当时发展形势，邱清泉、李弥兵团背靠徐州不易分割；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可凭借淮河抵抗难以合围；唯黄维兵团孤军远出，部队疲惫、比较好打。与此同时总前委还作了将三坨敌人拉开距离，便于我军各个击破的部署。这一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总前委即令中野主力围歼黄维兵团，令华野八个纵队在北线制止徐州之敌南下，以二、六、七、十、十一、十三等纵队到南线阻击并求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二十二日，二纵进至水池铺、西寺坡一带构筑阻击阵地。二十四日夜，中野全线出击，包围了黄维兵团。二十五日，黄维兵团向东突围，欲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二纵受令隔断任桥李延年兵团和双堆集黄维兵团之间的联系。当夜，纵队攻占湖沟集、高口集，完成切断敌人的任务。

黄维兵团被围后，刘峙认为其未受重创，我军吃不掉

它，便令北上增援的李、刘兵团星夜南撤。野司下令堵截追歼，二纵担任沿津浦路向南追歼的任务。二十八日，二纵直逼固镇，歼敌掩护撤退的后尾部队。这时，敌主力向浍河南岸逃窜，并破坏了大铁桥，以一部兵力控制南岸的桥头堡阻我追击。二纵十二团一举攻占桥头堡，敌又向新马桥撤退。二十九日，四师向新马桥追击。十一团从灊河上游张店过河迂回截击敌人，他们不怕天寒水冷，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强涉水深及胸、水幅宽达三百多米的灊河。敌人仓惶向蚌埠奔逃，四师紧追不舍，予敌以重大杀伤。在追到淮河北岸临近蚌埠的曹老集，奉命停止追击。这样，便迫使李、刘兵团远离双堆集百余里，粉碎了其于黄维会师的企图，给中野全歼黄维兵团造成了有利态势。

五、郭楼守备战

十二月一日，杜聿明率二、十三、十六兵团放弃徐州西窜，妄图经永城与黄维会师。华野为确保中野全歼黄维兵团，除留几个纵队在南线阻击李、刘兵团回援外，集华野主力北上，将杜集团包围于肖（县）永（城）地区。当日上午，二纵奉命于两日进到濉溪口。下午又奉命‘急赶亳州’截击敌人向西南逃窜。纵队飞兵急进，一天两夜行程近三百里。大部分战士脚上打了泡，行军中常有部队饭没做熟便丢下出发，后队常吃前队做好的饭，部队十分疲劳。三日夜抵张弓店。待要安营，突然又接到命令“转回濉溪口”。刚要启程，又接到命令“继续向亳州进发”。纵队

马不停蹄进到岳集、临焕集时，又接停止前进待命的号令。二纵在短促的三小时内三易前进方向，战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五日，野司按照对杜聿明集团“先围后打”的方针，令二纵进至大茴村、郭楼，阻敌向南及西南突围。

郭楼距陈官庄仅两公里，是阻敌南逃的要冲。七日，我全线部队紧缩包围圈后，杜聿明集团困兽犹斗，拼命反击突围。二纵左右两邻纵队的鲁楼、李楼、窦洼阵地相继失守，更使郭楼突出，呈三面受敌之势。野司首长对坚守郭楼极为重视，亲自用电话指示二纵部队：“你们的阵地一定要寸土不准丢，寸步不许退！”二纵深知坚守郭楼的重要性，遂重新调整了部署。将四师、六师配置在董窑、黄沟崖、郭楼、堽上为第一线部队，五师位于张庄为预备队，纵队指挥部在小郭庄。并令部队抓紧抢修工事，从前沿到纵深筑成了堦壕和支撑点相结合的坚固阵地。前沿各村中堦壕、交通壕连成整体，在横向交通壕上构筑了小据点和侧防火力点，并在主要方向上设了三道鹿砦、挖了防坦克壕，整个阵地呈环形。十一日夜，纵队令六师十六团在郭楼左侧建立侧防阵地，加强侧防火力；又令十四团、十八团分别插在郭楼至杨庄和孙庄的交通壕中准备反击，支援郭楼十七团的战斗。在火力配备上，除六师的火炮外，又将二线各部的百余门迫击炮配置在郭楼侧后；纵队的炮团和特纵的大口径炮两个营，编成纵队炮兵群，直接听从郭楼部队调用。缴获敌一〇七军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昼夜不停地运送弹药。整个阵地纵队指战员信心百倍，严阵以待，决心不让敌人从二纵的阵地上突出去！

十三日下午两点，敌先以飞机十余架次向郭楼阵地狂轰滥炸，后集中炮火轰击二十多分钟，当时整个阵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敌炮火延伸后，敌坦克疯狂地冲了过来，在前沿鹿砦中压开数条通路，掩护敌七〇军九六师向我郭楼阵地冲击。战士们从火里、土里钻出来奋起反击，连续打退敌人两次疯狂进攻。这时，暮色苍茫，整个阵地忽然寂静下来。原来是狡猾的敌人借夜色昏暗，兵分两路向二纵阵地进行袭击。指战员们沉着冷静，待敌冲到前沿二、三十米处。猛然开火，炮声如巨雷轰鸣，枪声似疾风骤雨，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阵地前沿弃尸成堆，武器满地。

十四日，杜聿明见黄维已危在旦夕，深恐自己成为瓮中之鳖，便不惜一切代价疯狂突围。上午十一时，激烈的战斗再次展开，敌邱兵团中号称“战将”的七〇军军长邓军林，亲乘坦克冲到阵地前沿的鹿砦内督战，严令九十六师、三十二师迭次集团进攻，但一次次的进攻均被我反击下去。激战至黄昏，我阵地岿然不动。邓军林懊丧地说，郭楼战斗的惨败，使我完全丧失了打出包围圈的信心。

敌人两天的进攻遭到惨败，杜聿明集团象泄了气的皮球，完全失去了突围的信心，惶惶不可终日。

六、直捣陈官庄

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南逃后，为了稳住华北战场上的敌人，使之不致在我军合围之前逃跑，中

中央军委命令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暂缓攻击，部队进行战场休整，做好攻击准备。十二月十六日，二纵根据上级指示，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二纵部队进一步加强了郭楼纵深的防御阵地的构筑，做到了纵长十余里的地带村村有工事，进行了战斗组织调整、开展了新年战地文娱工作，为总攻准备了粮、草、弹药；开展了近迫作业、攻击方法与防毒、打坦克的训练和研究；发起了大规模的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日夜轮流向敌喊话，传递宣传品，释放俘虏，积极争取敌中、下级军官来降。二十余天之内敌人来降者近千名，攻心战术收效颇大。

杜聿明集团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但仍拒绝投降，企图以空军施放毒气掩护其突围。华野根据中央军委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乘敌疲惫、动摇、恐慌之际，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发起全线总攻。二纵的任务是攻击敌十三兵团，首先攻歼李明庄、范庄、王庄之敌、尔后直捣陈官庄。

李明庄、范庄、王庄是杜聿明集团固守陈官庄的屏障，敌人均派有重兵扼守，并筑有坚固的环形防御阵地。

当日下午十七时，纵队令四师攻击李明庄守敌，仅用七十分钟便全歼敌二八七团，俘敌团长李启龙。十二团七连单刀直入直插范庄守敌师指挥所，迫使敌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生瑞率部投降，全歼敌一八六团。七日下午，六师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对王庄守敌进行轰击，部队随即发起攻击，战斗仅用四十分钟便全歼守敌二八八团。

全歼李明庄、范庄、王庄守敌后，陈官庄杜聿明集团的阵地便暴露于二纵面前。九日晚，四师攻陈官庄南公路

上的据点，五师攻穆楼，六师攻地祖庙，激战竟夜。十日凌晨，陈官庄南公路上敌两个排向四师十一团投降，空出缺口，该团乘机攻击李康楼。经过激战，歼敌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及炮兵、工兵各一个团。四时三十分，纵队发出全线出击的命令。四师、五师、六师部队象潮水般分别冲向陈官庄、刘寨，会同其它纵队一起，全歼敌人。这时，整个战场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

在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决战中，二纵转战二千五百余里，进行了团以上的攻防战斗五十多次，共俘、歼敌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七人，缴获山、野、榴炮三十七门、轻重迫击炮八十三门、冲锋枪二千三百二十八支、长短枪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二支、轻重机枪一千五百四十七挺、六〇炮、掷弹筒四百五十件、坦克两辆、汽车六十七台、弹药物资无数。战役结束后，二纵的人员装备和实力都比战前有了较大的增强。

淮海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此次决战中，二纵全体将士识大体，顾大局，听从指挥，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总前委和华野首长交给的各项任务。在此次决战中，二纵有一千一百零四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活着的人们心中，他们的英名永垂千古。

淮海战役综述

南京军区《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华野），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现名薛城），南达淮河的苏、鲁、豫、皖广大地区内，对国民党军南线主力集团进行的一次巨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次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战役规模之大，歼敌数量之多，人民支前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此役，敌我双方参战兵力共约一百四十万人。国民党军为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计三十四个军，约八十万人，多数为其精锐嫡系。人民解放军为二十三个纵队（中野七个纵队，华野十六个纵队），加上江淮、豫皖苏、豫西、陕南、冀鲁豫五个军区的七个旅，约六十万人。兵力对比，敌多我少；武器装备，敌优我劣。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以及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以气吞山河的气概，坚韧不拔的毅力，高超的作战艺术，

经过首歼黄百韬兵团、继歼黄维兵团、再歼杜聿明集团的六十六天连续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主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这一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一、战前形势和战略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开始，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止，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时，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形势对人民解放事业更为有利。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两年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二百六十四万人。国民党的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含战时补充数），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正规军计一百七十四万人，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政治腐败，各级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内部明争暗斗，矛盾日趋尖锐；在经济上强征暴敛，货币贬值，生产凋零，民心日益丧失。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均陷入严重危

机之中。

与国民党情况截然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歼灭敌军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总兵力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建立了五十一个步兵纵队，以及相当规模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机动作战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技术装备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战锻炼，军政素质大为提高，不仅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同时也能进行大城市攻坚战。解放区的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一亿六千八百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党的各项政治主张深入人心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广大翻身农民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参军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区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大大加强。所有这些，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为扭转日趋恶化的军事形势，继续进行反人民战争，其统帅部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在军事战略上提出确保辽东、热河、巩固华北；确保关中、汉中，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作战地带，控制西北，掩护西南；加强中原、华东战场战略要点防守，编组强大“进剿”兵团，实行“堵剿兼施”，寻我作战，置全国作战重心于黄河、长江中间地区，以图挫败人民解放军的攻势。

为了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尽快夺取全国胜利，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五年左右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规定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并指出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作战，这是党中央指导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会议还要求全党全军加强组织纪律性，将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再增进一大步，同时强调加强解放区建设，做好培训干部、支援前线和敌占区工作。

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规定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军应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师）左右，其中中野歼敌十四个旅（师）左右，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华野歼敌四十个旅（师）左右，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十二个旅（师）左右，牵制胡宗南集团，使之不能进行战略机动；华北第一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师）左右，并攻占太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担负消灭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三十五个旅（师）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打通东北和华北的联系。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应敢于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敢于攻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局的

迅猛发展，因势利导，逐步形成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伟大战略决策。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华野发起济南战役，二十四日攻克济南，歼灭守敌十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的信心。山东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全境解放，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使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拥有更加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援，为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济南战役中，华野强大打援集团位于徐州和济南之间，严阵以待，中野在平汉路以西积极钳制。随着济南战役迅速解决，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和武汉白崇禧集团的机动兵团未敢北上增援。济南战役快要结束时，华野前委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问题。九月二十四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鉴于济南即将攻克，敌可能停止北援。为了更好地改变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条件，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即以华野主力由鲁南前出苏北，先取两淮，吸引歼灭援敌，然后攻占海州。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即予批复，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样“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举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中野当日致电支持，表示以“南北出击”的作战行动，配合华野作战。军委批准举行淮海战役，进一步明确战役目的，这是对南线战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

济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统帅部判断中原、华东解放军即将在陇海及其以南地区发动新的攻势，命令武汉白崇禧集团以积极的作战行动牵制中野不能东进与华野会合，命令刘峙集团加强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和津浦路段的防御。十月下旬确定：将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自郑州东调蒙城集结，其第九十九军转进蚌埠；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自开封、兰封东移商丘；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东移砀山周围地区；第十三兵团李弥部东移碾庄、炮车陇海路段；第七兵团黄百韬部仍住于新安镇。同时以武汉白崇禧集团之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向确山、驻马店集中，准备转用徐州方向。

随着郑州、开封的解放，中野向徐州迅猛逼进，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形成联合作战有利态势。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卫立煌集团，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新的转折。蒋介石慑于重蹈东北战场的复辙，决心固守徐州，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于十一月五日，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以徐州为中心，进一步收缩兵力。接着华野攻势亦全面展开。

二、作战方针和战役准备

中央军委批准举行淮海战役和以后的一系列指示，明确规定了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原则。九月二十五日指出：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九月二十八日，军委又强调：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

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要求华野认真地抓紧部队休整补充，做好作战的各项保障工作，有了充分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此目的，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援敌一部，重申九月“攻济打援”的部署原则，强调应将打援兵力配置在援敌翼侧，形成围攻徐州的态势，造成敌之错觉。预计时间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为配合华野作战，军委又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时要求华野、中野各部于东西两面同一时间动作，以达成战役的突然性。

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和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任务，华野、中野在战前进行了充分、周密的准备。

十月上旬，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团以上党委普遍作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决议，部队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并深入进行了打更大胜仗的思想政治动员，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内部团结。同时，整顿了战斗组织，抓紧了干部的培训 and 战前练兵。

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任务，两大野战军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华野从十月九日起，先后三次召

开作战会议，统一作战思想，深入研究首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部署，至十月二十八日呈报了战前最后一次作战计划，军委立即批示：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该计划集中第一、四、六、八、九、十一、鲁中南等七个纵队和苏北兵团指挥的第二、十二、十一（中野）三个纵队，共十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主力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切断其与李弥兵团的联系；以山东兵团第七、十、十三纵队直出台儿庄、贾汪，进击运河线，促使徐州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起义，配合徐州以西部队，形成对徐州合围态势，并直出陇海线，切断黄百韬兵团退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另以第三、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前出鲁西南，从西北方向威胁徐州，造成合击徐州态势，迷惑敌人；要求东、西两线各参战部队于同一晚上同时发起进攻。

中野在八月豫西宝丰会议整党整军的基础上，九月颁发了政治动员和指挥工作命令，要求全军树立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发出配合华野作战，全部解放中原的号召。十月十三日，中野前委召开中原军区直属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部队组织性纪律性。在十月中旬开始的连续作战中，实行“以战教战”，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

中野根据中央军委十月十一日关于配合华野作战的指示，制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十三日军委批准同意。十月二十二日，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解放郑州，二十四日占领开封。根据军委十月二十二日指示，中野决定：

由陈毅、邓小平率领中野第一、三、四、九纵队，并指挥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消灭徐州以西永城之孙元良兵团，如该敌已南下，则求歼商丘与马牧集地区的刘汝明部，尔后直出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段；由刘伯承率领第二、六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及江汉、桐柏军区武装继续牵制武汉方向之敌，准备阻击黄维兵团东援，保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

各地方武装也作好了积极配合主力作战的准备：桐柏、江汉军区破击平汉铁路南段；江淮军区破击徐州至运河车站陇海铁路；冀鲁豫军区破击徐州至商丘陇海铁路；豫皖苏军区破击徐州至蚌埠津浦铁路；苏北、鲁中南、胶东军区向当面之敌展开攻势，抓住敌人不使它调。

为保障大兵团连续作战，中原军区和华东军区抽调地方武装，准备分批升级补充野战军；中原局、华东局各级党政机关和军队后勤部门，普遍建立了支前机构，加强后勤力量，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后方支前组织动员，在粮食、弹药、医疗、运输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些，都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十月三十一日，粟裕向军委提出：这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根据两大野战军主力逐步靠拢的态势和粟裕的请求，于十一月一日决定：整个战役由陈、邓指挥。至此，我军完成了淮海战役各项准备。军委最后决定，于十一月六日发起淮海战役。

三、首歼黄百韬兵团，攻克宿县， 完成对徐州战略包围

追击、堵击、合围黄百韬兵团

按照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徐州作战会议确定的收缩计划：邱清泉兵团集中于砀山、永城地区；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退守韩庄、台儿庄一线；李弥兵团向灵璧、泗县转移；第七兵团黄百韬部由新安镇退守运河西岸；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放弃海州从海上南撤蚌埠；第一绥靖区周鲁部守淮阴、扬州运河段；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转进。由刘峙直接指挥的第七十二军守徐州；第一〇七军位于睢宁；第九十六、六十六军守蚌埠等地。黄维兵团由确山、驻马店向阜阳、蒙城开进。各部队于十一月六日开始行动。嗣后，由于第九绥靖区海上撤退船只困难，临时决定其司令部空运蚌埠，第四十四军沿陇海路西撤，改归黄百韬指挥；并令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到达后，一起西撤。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按既定部署，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徐州东、西两面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淮海战役正式开始。华野主力从临（沂）、邳（县）一线疾向陇海路东段挺进，其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邳县等地区的黄百韬兵团。第六纵队首先歼灭码头镇之敌。鲁中南纵队包围了郯城，并于七日歼灭郯城守敌王洪九部。第四、八纵队占领邳县、滩上一线，七日，

先头部队向运河桥挺进。山东兵团第七、十、十三纵队，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从临城、枣庄线，直向韩庄、万年闸、台儿庄运河线急进，从东和东北两面进逼徐州。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从鲁西南单县一带向徐州以西砀山进逼。中野第一、三、四、九纵队，向陇海路商(丘)、砀(山)线以南地区挺进。十一月七日，中野第一纵队在第三纵队和华野第三纵队各一部配合下，于商丘以东张公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八一师，尔后直指徐州。人民解放军出敌不意的猛烈攻击，使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恐慌万状，判断解放军主力似在攻取徐州，急向蒋介石求救，决定调驻徐州以东曹八集地区的李弥兵团和徐州以西砀山地区的邱清泉兵团即向徐州东、西两侧收缩，令已进至蒙城的孙元良兵团折返徐州。

黄百韬待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即率主力四个军沿陇海路西撤，命第六十三军从窑湾渡运河西撤，担任翼侧掩护。当华野发现黄百韬兵团撤逃时，华野前委遵照军委关于“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的指示，立即要求南下各纵队急速前进，追击逃敌。命令山东兵团排除一切困难插向徐州以东之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百韬兵团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的联系。命令位于陇海路以南皂河地区的华野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山东兵团断敌后路；华野第一、六、九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越过陇海路，沿铁路南侧向西追击；第四、八纵队在陶勇、郭化

若指挥下，沿铁路北侧向西追击。各部队在“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的口号鼓舞下，克服一切困难，忍饥耐寒，昼夜兼程，以一天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勇猛追击。广大后勤、支前队伍尽一切努力，保证部队的粮弹供应。

山东兵团按预定计划，于十一月八日突破韩庄至台儿庄敌人防线，攻克韩庄、万年闸、台儿庄，渡过运河，进逼贾汪。此时，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动下，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系中共地下党员）率领其所属第五十九、七十七军二万三千多爱国将士，举行战场起义，使徐州以北门户洞开。山东兵团当即穿过该部防区，渡过不老河直插徐州以东。十日，第七纵队攻占大许家，第十纵队攻占徐州东北荆山铺、大庙地区，第十三纵队进至陇海路南侧，歼灭退缩曹八集之黄百韬先头部队第四十四师三千余人，占领了曹八集。十一日，山东兵团与皂河地区北进的华野第十一纵队会合于徐州以东大庙、候集地区，完全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并占领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有利阵地。

苏北兵团的第二、十二纵队以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在韦国清、吉洛（姬鹏飞）指挥下，由新安镇以东向南穿插，沿宿迁、大王集向徐州东南挺进，担任向徐州东南迂回的任务。该兵团于十一月十日渡过运河，十三日，在大王集地区追击并包围了从睢宁向徐州撤退的国民党第一〇七军，迫使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该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和第二六〇师投诚，并歼灭该军西逃之第二六一师，进至徐州东

南和碾庄西南地区。

至此，华野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主力的迂回分割。其六十三军在西撤途中，被华野第九纵队于堰头镇歼灭后尾一个团，主力于九日狼狈逃窜至窑湾及其附近地区，遭到占领蒋家湖、三岔河之华野第十一纵队一部的迎头堵击，十二日拂晓被华野第一纵队全歼，军长陈章被击毙。黄百韬率第四十四、一〇〇、二十五、六十四等四个军，于九日仓惶退至运河西岸，未及渡河之敌被华野第八纵队和第四纵队截歼。尾追渡过运河的华野第四、八、六、九纵队乘敌混乱，展开了猛烈攻击。至十一月十一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华野合围压缩在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纵横十余公里狭窄地区内。

攻占宿县，孤立徐州

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的交通枢纽，也是徐州刘峙集团的重要补给基地和南撤的必经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中央军委在计划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曾于十月二十二日指示：“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并指出：这一行动“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二十三日进一步指示：“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县、蚌埠。”

陈毅、邓小平于十月二十二日复电军委，表示完全赞同“直出徐、蚌，箝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并于十一月二

日向军委提出了“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徐蚌线西侧歼灭孙良兵团的作战方案。十一月三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电军委并陈毅、邓小平，认为“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十一月七日，华野粟裕、陈士榘、张震亦向军委提出：以中野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线，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

淮海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鉴于战局的重大变化和徐州之敌有可能实行总退却的征候，于十一月九日果断作出“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大战略决策。并于十、十一日连续致电陈毅、邓小平：“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线”，“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

根据军委指示，中野主力于十一月十一日夜向宿县地区开进。十二日，中野第四纵队、华野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进至肖县和津浦路徐宿线夹沟地区，歼灭正向徐州撤退之孙元良兵团后尾一部，接着又在三堡歼灭了冯治安部起义中逃窜的第七十七军军部及所属第三十七师残部四千余人，占领了宿县以北广大地区。十三日晚，中野第三纵队围攻宿县，十五日晚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攻占宿县城，十六日晨肃清残敌，全歼守敌第一四八师等部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物资。与此同时，豫皖苏军区等地方武装占领了宿县以南固镇广大地区，破击徐州以南曹村至固镇间铁

路二百余里。至此，中野完全控制了徐蚌之间宿县南北地区，切断了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战略包围，使刘峙集团完全陷于孤立，有力地配合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行动。

成立总前委，统筹全局

中央军委鉴于战局迅速发展，战役规模日趋扩大，于十一月十四日及十六日电示：徐州集团是个大敌，此次战役是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为实现歼敌主力于徐州附近的决心，中野应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南面之敌，华野全部对付陇海路上之敌。全军必须准备在现地作战三个月。为统筹一切，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并指示：后勤保障和支前等事宜，必须“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是淮海前线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总前委的成立，对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指示，对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对组织战区党、政、军、民统一对敌斗争和动员后方人力、物力全力支前，保证淮海战役全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歼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一面调集兵力竭力增援，一面令黄固守待援。黄百韬利用并加修原有工事，以碾庄

圩为中心，第一〇〇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二十五军在北，形成集团式环形防御阵地，原地固守。

从十一月十二日起，人民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之各纵队，从四面向敌展开猛攻，敌人在空军掩护下逐村顽抗。由于各纵队从追击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准备不足，进展不大。华野首长于十四日晚，召集担任攻击任务的六个纵队(含特纵)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总结经验，研究措施，决定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战斗力较弱的敌第一〇〇、第四十四军，尔后围歼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五、六十四军，并调整部署：以第九纵队在南，第六纵队在西南，第十三纵队在西北，第四纵队在北，第八纵队在东，特纵(炮兵)按配属分别进入阵地，并改由山东兵团首长统一指挥。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近迫作业，把堑壕挖到敌阵地前沿，插入村落之间，做好充分的攻击准备。

十六日晚，我军利用夜暗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发起猛攻，展开了逐村逐点的争夺战，至十八日，全歼敌第一〇〇、第四十四军，第一〇〇军副军长杨诗云、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被我生俘，第一五〇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二千余人投诚，第二十五、六十四两个军也伤亡惨重。此时，华野第十三纵队奉命南调蚌埠方向作战。十九日晚，华野部队继续对碾庄圩敌兵团部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于二十日晨攻占碾庄圩，全歼敌兵团部和第二十五军，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第六十四军军部，企图继续顽抗。当日，华野第

六纵队奉命南下作战，由第四、八、九纵队及特纵一部，于二十一日晚向敌第六十四军发起最后攻击，二十二日全歼守敌。黄百韬被击毙，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生俘。

坚决阻击各路增援之敌

当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急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并限于十一月二十日与黄百韬会师；令刚在蚌埠组建的第六兵团（原第九绥区李延年部）和第八兵团（原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向北增援；并严令黄维兵团急速东进，以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华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以三个纵队于徐州以东正面阻击，以五个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邱、李两兵团的增援。中野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后立即南下，阻击刘、李兵团和黄维兵团的增援。

十一月十二日，敌由徐州东援之邱、李兵团，以十二个师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坦克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我军阵地进攻。担任正面阻援的华野第七、十、十一纵队，在宋时轮、刘培善指挥下，于侯集、林佟山和大许家地域，依托构筑的坚强防御阵地，顽强坚守，逐村逐堡与敌反复争夺，给敌以重大杀伤。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歼时，邱、李兵团连续猛攻十天，伤亡万余人，前进不足二十公里。

苏北兵团指挥第二、十二、一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中野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军区两个旅，在邱、李两兵团东援

之际，于徐州东南地区向援敌翼侧不断发起攻击，一度楔入徐州机场附近。第三，两广纵队同时由南面进逼徐州，使援敌不敢大胆东进。在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前，正面阻击部队曾于十一月十六日主动东撤，诱歼邱、李，该敌慑于被歼，畏缩不前。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建议，将阻援部队立即南移增强南线作战，中野第十一纵队归建。华野在徐州东面坚强的阻援、打援，有力地保证了围歼黄伯韬兵团。

为了对付南线各路援敌，中野在攻占宿县后，即以第一纵队开赴蒙城，与阻滞黄维兵团进至皖北的第二、六纵队会合，阻击黄维兵团东进；以第九纵队并指挥豫皖苏独立旅及豫西两个团，南下进至津浦路任桥地区阻击刘、李兵团由蚌埠北援；第四、三纵队南下宿县地区，准备阻击南线增援之敌。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碾庄圩敌人遭全歼，黄维兵团被阻于浍河上游赵集地区，四天前进了三十公里。刘、李兵团被阻于浍河下游任桥地区，四天前进了十五公里。中野部队坚决阻击南线增援之敌，有力配合了华野的作战行动。

中野、华野密切协同作战，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八个军部（含起义、投诚各一个军部）、十八个整师（含起义三个半师、投诚二个师），十七万八千余人，重创国民党各路援军，削弱了刘峙集团，攻占了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了徐州，为取得淮海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四、继歼黄维兵团，追截、合围杜聿明集团

确定先打黄维兵团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人民解放军的歼敌目标有三个：一是位于徐州及其以东地区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二是位于蚌埠及其以北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三是位于赵集地区的黄维兵团。

此时，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改变其不利局势，决定以徐州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沿津浦路南进；以蚌埠、固镇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犯；以涡河一带的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企图南北夹击、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对于第二阶段的歼敌目标，中央军委曾于十一月七日指出，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如果徐州之敌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十一月十八日又指示华野：“谭王指挥之四、六、八、九纵队及十三纵，于歼灭黄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的预备队，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总前委根据战局发展，于十一月十八、十九日致电中央军委：战役第二阶段以中野全部和华野一部求歼黄维兵团为上策。因为邱、李虽经第一阶段打击，兵力有所削弱，但其紧靠徐州，不易分割；李延年、刘汝明在固镇附近地区，背靠蚌埠，其主力仍在淮河以南，李、刘很滑，不易抓住；黄维兵团孤军远出，沿途连遭中野和地方武装阻

击，消耗较大，部队疲乏，又处于运动之中，利于我军围歼。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在祝贺第一阶段胜利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总前委于二十三日夜向中央军委报告：现在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为有利。此时，中野决心放弃南坪集，布置囊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之。并建议华野以一部兵力阻击李、刘兵团北犯，以一部兵力参加攻打黄维兵团。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军委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总前委依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中野全部（含归建的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华野第七纵队及特纵一部歼灭黄维兵团；以华野主力担任阻击徐州南援之敌，并求歼蚌埠北援的李、刘兵团一部或大部。其具体部署：以中野的两个纵队和一个独立旅，位于南坪集地区，担任正面阻击，诱黄维兵团一部进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分割敌人；以五个纵队隐蔽于浍河以南之曹市镇、白沙集、五沟集、胡沟集等地区，待黄维兵团展开并处于半渡之际，从东西两翼合围歼灭黄维兵团。

根据军委、总前委的指示，华野决心以八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徐州南援之敌；以五个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南下固镇地区，阻

击并求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合围黄维兵团

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共十二万余人，大部为美械装备，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兵团之一。该兵团辖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等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第十八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中野参战部队有七个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以及豫西、豫皖苏军区各一个独立旅，但自转战大别山以来，减员较大，未能补充，除第一、四纵队各有九个团外，其余第二、三、六、九、十一纵队只有六个团，兵员不充实，重装备很少。中野总兵力虽与黄维兵团相近，但装备处于劣势。因此，要全歼黄维兵团，任务非常艰巨。

中野为全歼黄维兵团，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动员。中野首长表示，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怕一切困难，不惜最大牺牲，坚决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各级领导在动员中反复强调战役的整体性、持久性、连续性，要求指战员顾大局、识大体、全力以赴，在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中立大功。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历时二十三天。

根据蒋介石三路会师打通津浦线的计划，十一月二十三日拂晓，黄维兵团以第十八军为中路，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八十五军殿后，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蒙（城）宿（县）公路及其两侧向南坪集、宿县方向进攻。中野第四纵队在南坪集顽强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

后，于当晚放弃南坪集，转至徐家桥、朱口、伍家湖、半埠店一线，诱敌北渡浍河。此时，中野已构成囊形阵地。二十四日上午，敌先头部队第十八军强渡浍河后，继向第四纵队阵地攻击，当敌发现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后，下午又缩回浍河南岸。黄维惧怕落入“口袋”，即令其他各部后撤，沿浍河南岸向湖沟方向退却，欲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日黄昏，中野趁敌撤退之际全线出击，第四、九纵队由东北向南，第十一纵队由东向西，第六纵队由南向北，第一、二纵队由西向东，第三纵队由西北向东，猛力合围。至翌日晨，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宿县西南忠义集、王朱庄、马家楼、双堆集地区。合围圈外的敌第十八军第四十九师，被第六纵队十八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歼灭在大营集地区。二十五、二十六日，中野各纵向黄维兵团展开猛烈攻击，由于从运动战仓促转入野战阵地攻坚战，对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受到一些挫折。各部队及时总结经验，纠正急躁情绪，加强战场侦察，开展土工作业。

二十七日黄维为了扭转其被动局面，集中第十八军的第十一、一一八师和第十军的第十八师、第八十五军的第一一〇师等四个主力师为第一梯队，在坦克、大炮、飞机的掩护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被中野第六纵队和陕南十二旅击退。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趁突围之机率部起义，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二十八日，黄维再次组织大规模的突围，又被我军击退。黄维在多次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于二十九日调整部署，固守待援。其部署为：第十八军守双堆集及其西北、东南的平谷

堆、尖谷堆；第八十五军守腰周圈、大王庄至李土楼地区，向西防御；第十四军守沈庄、李围子、张围子地区，向东防御；第十军守东西马围子、杨文学一线，向北向南防御；其兵团部位于双堆集以北的小马庄，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构筑临时机场，以求空中补给。调整部署后，每天以三、四个团或两三个营出击，企图夺回丢失的阵地，但均未得逞。

中野为紧缩包围圈，防敌突围，决定实施稳扎稳打，逐点攻击，攻占一村，巩固一村和“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战法，进行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把交通壕逐步延伸到敌人前沿阵地，有的楔入敌之第一道鹿砦内。至十二月二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十里的狭窄地区内。全兵团有三万余人被歼或起义、投诚，所剩的十一个师，只有第十八军的第十一师较完整，其它均残缺不全，机动突击兵力仅七、八个团。

北阻邱、孙兵团，南击李、刘兵团

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在李弥兵团掩护下，沿津浦路向宿县方向进攻。华野的第一、三、四、八、九、十二、鲁中南、两广等八个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由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在徐州以南孤山集、后官桥、四堡、褚兰一线，连续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至三十日的七天中，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被阻于官桥以北一线地区。

为求歼北犯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华野第二、六、

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分路南下。第十三纵队和江淮军区独立旅，于二十五日在灵璧歼灭国民党第十二军二三八师。华野南下各纵队的积极行动，给敌造成极大恐慌，蒋介石误认为我军在南线要先歼李延年兵团，二十八日急电李延年撤至蚌埠守备淮河，而李延年却早于二十六日南逃。华野南下部队兵分两路勇猛追击，因固镇以南浍河铁桥被敌炸毁，未能及时通过，仅追歼敌后尾一部，敌主力逃至淮河以南。我军坚强的南北阻击，保障了合围黄维兵团的作战。

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

在我军强大兵力的阻击下，徐州之敌南犯不逞，蚌埠之敌北上被阻，黄维兵团处境日趋困难。蒋介石眼看“三路会师，打通徐埠”的计划全部破产，被迫改变计划，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邱、李、孙三个兵团避开徐州以南华野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经永城南下，先解黄维兵团之围，与黄维兵团会合后共同南撤。令刘峙飞至蚌埠，指挥李、刘兵团北进，接应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突围。

在杜聿明集团撤逃之前，中央军委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判断敌有放弃徐州，向武汉或两淮方向逃窜的可能，指示总前委做好准备。总前委令华野除以一部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和监视蚌埠李、刘兵团外，主力转为对付徐州逃跑之敌。华野前委于十一月三十日发布《全歼当面之敌，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全军做好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把一切力量用于前线，争取全国胜

利提早到来。

十一月三十日，杜聿明令孙元良、李弥两兵团在前，邱清泉兵团殿后，裹胁部分学生，共约三十万人，由徐州向西南方向撤退。华野即令渤海纵队占领徐州，令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和鲁中南、两广等十一个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一、三旅，采取多路多梯队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战法，实施猛追猛打，务必抓住杜聿明集团。各部队不顾敌机轰炸，不避艰险，不怕劳累，分多路展开勇猛追击。十二月三日，蒋介石手令杜聿明改变方向，向睢溪口方向攻击。杜聿明采用三面掩护一面突击的战法，向南攻击前进，企图与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兵团协力解救黄维，但遭到华野反击。十二月四日拂晓，华野将杜集团全部合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五日，杜聿明召集邱、李、孙研究突围办法，决定六日晚由各兵团同时分别自行向淮河以南突围。六日晚孙元良兵团刚向西南突围，即被华野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分别歼灭于肖县、永城之黄瓦房、张老窝和亳县地区，兵团司令官孙元良逃脱，主力被歼，残部缩回包围圈。七日至十日，杜集团数次向东南方向突围，均未得逞，伤亡不断增加，阵地逐渐缩小，即调整部署，固守待援。

全歼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被围后，由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前进，蒋介石又从武

汉方向抽调第二十、二十八军已到达浦口。此时中野、华野必须迅速歼灭两个集团中的一个，才能保持战役主动权。为此，总前委研究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首先集中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歼灭黄维兵团。以华野主力围困杜聿明集团，以华野、中野各一部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为增强攻击黄维兵团的力量，总前委决定使用战役预备队华野第七、十三纵队及特纵炮兵一部。

十二月五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要求各部不惜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及时主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决定组成三个攻击集团：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等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富治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以华野第十三纵队、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特纵炮兵另一部组成西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进攻；以中野第六纵队、华野第七纵队和陕南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近山、杜义德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进攻。

总攻发起前，各纵队进一步加强战斗动员；补充解放战士，实行火线整编，充实战斗部队；各级首长深入第一线，亲自动员组织突击队；开展军事民主，解决战术难点，组织沙盘作业，研究歼敌办法；为增强火力，推广了被敌称为“特大威力炮”的土造炸药抛掷筒；加强通信保障，架设了一百三四十里的环形电话网，重要线路架设了双线；并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支前力量，将粮草、弹药、药品送到前沿阵地，保障部队连续作战。

十二月六日下午十六时，中野对黄维兵团发起了总攻击。各纵队吸取了第一阶段的作战经验，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七日晨，攻占了李围子、李土楼、小周庄、宋庄、东西马围子等地。敌遭猛攻，猬集一团，以家屋为核心，地堡群为骨干，作困兽之斗，每天以一个营至两个团兵力，在坦克、飞机掩护下疯狂实施反击，均被中野击退。十日，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两个团向我投诚。十二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黄维拒绝投降，继续进行垂死挣扎，并施放毒气。经过连续激烈的战斗，至十三日，将敌压缩在东西不到三华里的狭小地域。此时，敌人饥寒交迫，中野各纵队抓紧时机，广泛开展政治攻势，敌人整连、整营、整团纷纷来降。为迅速全歼黄维兵团，总前委十三日又调整了部署：以南集团为主，东西集团配合，并调华野第三、十三纵队加入南集团作战，南集团改由陈士榘指挥；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十四日夜发起攻击，南集团攻占敌临时机场南端阵地，东集团攻占杨老五庄、杨子全庄，华野七纵攻克双堆集以南尖谷堆阵地，使敌兵团部完全暴露。十五日黄昏，敌残部向西突围，攻击部队立即追击。当日晚十二时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

与此同时，华野第六纵队和渤海纵队第十一师、中野第二纵队及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五个团，在固镇、新马桥、曹老集地区阻击李、刘兵团。敌人出动八个步兵师、一个战车大队，昼夜向我军阵地实施连续攻击。阻击部队

坚守阵地，历时十二天，歼敌一万余人。十六日，李、刘闻悉黄维被歼，仓惶逃向淮河以南。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个兵团部（含孙元良兵团）六个军部、十六个师（含一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一个快速纵队计二十万余人，打退了敌人南北增援，解放了徐州，并将杜聿明集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为夺取淮海战役全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五、战场休整和全歼杜聿明集团

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逃向淮河以南后，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此时，华北战场我军已发起平津战役，但尚未达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合围。中央军委为抑留和全歼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战场，十二月十一日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十二月十四日军委指示华野：“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十六日又指示华野，要“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华野根据中央军委、总前委指示，于十六日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华野除加强对敌围困外，紧张地进行了下列各项工作：

第一、恢复和整顿战斗组织，提拔大批干部，并从地

方动员一批干部参军，充实基层。抽调十八个地方团升级编入野战军。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和补入大批俘虏，充实了兵员，并通过诉苦和团结互助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部队。

第二、深入进行“军队向前进”、一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形势教育，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使指战员更加坚定了决战到底思想。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并通过火线入党，火线战评等各种形式激励部队奋勇作战。

第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广播了毛泽东为前线司令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过广播喊话，发射传单、阵前上课、劝降、释俘、送饭等多种形式瓦解敌军。被包围之敌在连日大雪，空投中断的情况下，经我军宣传、瓦解，大批士兵和下级军官，整连整营纷纷携枪来降，从十二月十六日至一月五日二十天中，向解放军投诚者达一万四千余人，约等于敌两个师的兵力。

第四、召开“诸葛亮会”发动群众摆沙盘，论战法，反复讨论拟定作战方案和对付敌坦克、地堡及毒气等具体对策，并针对当面敌人防御特点，进行敌前练兵。同时，还以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的手段，进行规模巨大的近迫作业，为总攻准备了良好的出发阵地。

第五、各级支前组织和军队后勤部门，向前线运送了大批粮食、副食品、弹药和药品。并在以阵地为家过好新年的口号下，改善伙食，搞好战壕卫生等工作。

杜聿明集团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困难重重。时值天

寒地冻，雨雪交加，空投困难，偶而空投食品，官兵互相争夺以至残杀。许多官兵杀骡马充饥。大批伤员冻死、饿死无人过问。官兵惊慌不安，充满着悲观绝望情绪。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杜聿明在内终日消沉、沮丧。但是杜聿明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仍拒绝投降，企图在获得大量空投物资后，以空军轰炸、施放毒气为掩护进行突围。

华野经过二十多天休整，充实了兵员，补足了粮弹，总结了经验，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此时，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经中央军委、总前委批准，华野调整了部署：决定以十个纵队和冀鲁军区部队组成东、北、南三个突击集团，向敌纵深猛烈攻击。东集团由第三、四、十、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三旅组成，在宋时轮、刘培善指挥下，向敌阵地东部攻击；北集团由第一、九、十二纵队组成，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由北向西南攻击；南集团由第二、八、十一纵队组成，在韦国清、吉洛指挥下，由南向东北攻击。另以第六、七、十三、鲁中南、两广等纵队及第三十五军，为外围拦截部队，截歼可能突围之敌。

中野于歼灭黄维兵团后，按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即作为围歼杜聿明集团总预备队，转入战场休整，进行战斗总结，抓紧补充兵员，“溶化”俘虏，调整战斗组织。十二月下旬，邓小平、张际春就准备加入对杜聿明作战或阻击蚌埠北援之敌的部署，向军委作了报告，认为中野经过休整，继续作战不成问题，确定：第一、二、三、六纵队位

于涡阳、蒙城一线以北地区，以第一、三纵队为对杜聿明集团作战之第一梯队，随时准备截歼突围逃窜之敌，如蚌埠之敌北援，则以该四个纵队协同第十一纵队阻援。第十一纵队并指挥豫皖苏军区部队于蚌埠以北地区监视蚌埠、怀远地区之敌；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华野按照预定部署，向杜聿明集团残部发起总攻。攻击部队依照割裂邱、李兵团，先歼战斗力较弱的李弥兵团的方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敌实施突击。当日晚即攻克敌人十三个据点，歼敌一万余人。七日，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二十多处据点，歼灭了李弥兵团的主力及邱清泉兵团的第七十二军大部，李弥率残部逃向邱清泉兵团防区。八日，华野总结前两天战斗经验，再次调整了部署。九日，以更猛烈的炮火再次发起攻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杜聿明集团残部在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连续向西突围，但未得逞。华野攻击部队以猛攻猛打猛冲的动作，插入敌指挥中心阵地陈官庄，残敌失去指挥，完全陷入混乱状态，纷纷向我军投降。敌六辆坦克突出了重围向西逃窜，被我骑兵支队追获。十日下午，战斗全部结束。杜聿明被生俘，邱清泉被击毙，李弥只身潜逃。

战役第三阶段，华野经过战场休整、围困和瓦解敌军，待发起总攻后，仅用了九十多个小时，就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包围圈里的十几万敌军。此一阶段共歼敌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二个兵团部（不含孙元良兵团）、一个绥靖区司令部、八个军部、二十二个师计十七万六千余

人，获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

淮海战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胜利对于全国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战役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中央军委的英明预见。

此役，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五个兵团部、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二十二个军部和五十六个师。至此，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已全部覆没，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加之战略要地徐州丢失，南京门户洞开，宣告了国民党置全国作战重心于长江、黄河中间地区的战略彻底破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江、淮、河、汉广大地区遂告解放，大军直抵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随着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连遭失败，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国民党政府要求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出面“调停”，遭到拒绝后，不得不承认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临绝境，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告“引退”，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了土崩瓦解之中。这就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作战，彻底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解放全中国，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光彩夺目的丰碑。它记载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丰功伟绩；记载着为战役的胜利前仆后继、英勇作战的指战员的英雄史绩；记载着为战役作出巨大贡献的华东、中原、华北广大地区千百万民众的历史功绩。淮海决战的伟大实践，充分反映了人民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客观规律，它发展了我党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学习淮海战役决战战胜的宝贵经验，对于重温历史、教育后代，以及研究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都有重大的意义。淮海战役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烈士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保卫祖国和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

（《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欢迎大家对本文提出意见）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新军概况

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西战场上出现了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新军诞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当时叫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新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团。新军成立之后，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已发展为九个师（旅）级单位，下辖四十六个正规团又四个游击支队（团），主力部队约五万余人。新军的四个决死纵队（旅）、三个政卫旅，一个工卫旅是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合法形式组建起来的。而由十四支游击支队改编而成的暂编第一师，则是抗战初期由邓小平、程子华、南汉宸、彭雪枫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直接组建的。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支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在八年抗战中，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参与建党、建政、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新军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准备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继占领我东北四省之后，一九三五年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胁迫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参加，另一方面又指使伪蒙军不断侵犯属于阎锡山势力范围的绥远东部。与此同时，蒋介石借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境内之机，以增援阎锡山为名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等五个师进入山西南部，在红军撤离山西之后，赖在晋南不走，并暗中策划河东道（山西南部）独立，企图分裂山西，进而控制山西。阎锡山，受到蒋夹攻。红军的东征，在山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速了广大的山西人民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得到山西人民广泛的拥护，同时也促使山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阎锡山的核心政治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内一部分爱国进步人士发表了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在抗日高潮汹涌澎湃的情况下，长期实行亲日反共，善于应变的阎锡山为形势所迫，实行了“迎共抗日”的新政策，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和“建立国民兵”等口号。他的这些口号与主张，都是从维护其统治的根本立场，即所谓“自存与自固”出发的。阎锡山企图借助共产党的影响，任用新的干部，实行某些进步措施，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为此，阎锡山派专人赴北平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一九三六年八月，阎锡山派其部下郭挺一持阎锡山的

函件及大批款项赴北平，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释放关押在北平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薄一波。郭在狱中会见了薄，提出赴晋工作的邀请，但被薄拒绝。九月初，薄一波经党营救出狱后，向北方局报告了这一情况。

当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的原则，认为阎锡山正处于动摇之中，阎邀请薄一波回晋，是党在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战的有利时机，因而决定派薄入晋。一九三六年十月间，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人组成对外秘密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为书记，专门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前后，为加强山西工作，又陆续增派牛荫冠、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徐荣）、傅雨田、刘亚雄、谷景生等同志赴晋，使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扩大为十六人。与此同时，党的北方局又派遣曾与薄一同坐牢，随后出狱的张友清同志到太原任山西临时工委（地方党委）书记。临时工委与公开工作委员会统归北方局领导。严格规定这两个委员会在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而在政治上、行动上则要互相密切配合。

薄一波等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到太原后，很快与阎锡山达成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等三项具体协议。随即于十一月，接手了于九月份成立而又因日、蒋及

山西内部反共顽固势力的反对陷于停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

薄一波接管牺盟会后首先改组了领导机构，将牺盟会实际上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七七”事变前的八个多月时间里，本着团结多数，反对关门主义，谨慎地运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估计阎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使牺盟会工作沿着党所确定的政治方向顺利开展。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三年中，在薄一波同志主持下，牺盟会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参与政权，武装群众，协助建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进入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受到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表扬。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很重视抓建立武装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阎锡山召开的一次高干会议上，由董天知同志出面，第一次向阎锡山提出了建立一支以进步思想武装的“政治化、主义化”的新军的倡议，为阎首肯，但未实行。之后，牺盟会除了大力发动群众以外，便着重抓军、政干部的培训，为创建新军作准备。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牺盟会先后成立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成立）、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实有九个团，从一九三七年五月开始正式训练）、军士训练团（共两个团，一九三七年五月起，主要担负训练国民兵军官学员的任务）等十三个机构训练干部。学员绝大多数是由牺盟会出面动员、招考来的，共招收省内外的爱国知识青

年两万余名。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团是最早建立的，也是主要的干部训练基地。它为后建的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了大批政工干部。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团前后培训了三千多名学员。其中除山西青年外，许多是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的知识青年和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学员以北平、天津、上海、河南等地的居多。这些地方的党组织派遣了共产党员并大力组织进步青年到太原受训。一时，爱国知识青年潮水般地涌向太原。军政训练班中有一个女兵连，学员是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的女知识青年，前后有一百九十余名。还有一个红小鬼连，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从山西训导院经党营救出来的（红军东征时因伤或因病被俘的战士）组成的。在这些受训的青年中，牺盟会大量地发展会员，很多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这十三个训练机构的全部人员顺利地改编为新军。

山西新军的组建和发展

“七七事变”后，薄一波再一次提出组建新军的建议，阎同意试组一个团。刘少奇听了汇报后说：“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我们也干。”正式组建新军的消息传出后，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团的学员首起响应，并发起签名运动。三天时间即有一千五百多人报名参加。这个报名活动在我党所掌握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中也迅速展开。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的

国民师范礼堂举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团）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诞生了。同年九月底十月初，决死队由一个团扩建为四个团：决死一总队，由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全部及国民兵教导第八团、第九团各三百名学员组成；决死第二总队由军士二团全部、军士一团一个营及教九团二百余名学员组成；决死第三总队由教导团第十团改编组成；决死第四总队由教导第五团改编组成。按照与阎锡山达成的协议，这四个团的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政工干部由牺盟会委派。四个团均设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是最高首长。决死第一、第四总队政治委员为薄一波；第二总队政治委员张文昂；第三总队政治委员戎子和，均系共产党员。

一九三七年九月，为了发展抗日革命武装力量，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三个月内“扩红十万”的号召。在具体部署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发展十万部队的数字应把决死队和牺盟游击队包括在内。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还具体建议“加强晋东南……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来扩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这个方针和部署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薄一波又向阎锡山提出：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再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的建议，阎同意，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给了五个旅的番号，并授权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前，薄一波同志在中共北方局杨尚昆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同志的密切配合下，

迅速提出了这五个旅一级纵队的组建方案和纵队政治委员、政治主任等主要干部人选。其方案是：

由第一、第四两个总队合编为决死队第一纵队。

由第二总队和教导第八团合编为决死第二纵队。

由第三总队及教导第六团合编为决死第三纵队。

由教导第九团和牺盟会另行动员组建起来的少年先锋队第一团合编为决死第四纵队。

以上每个纵队各辖两个团，同时确定各个纵队再自行各发展一个团，达到每个纵队各辖三个团。四个纵队的组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临汾失守前完成的。各纵队的政治委员、政治主任都是薄一波等提名，经阎锡山同意，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而各纵队长则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担任。

在薄一波全权负责组建的五个旅中，有一个是工人武装组织。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北方局、山西地方党委和薄一波的领导下，太原工人组成工人武装自卫队（团）。同年十月，确定工人武装自卫队扩建为工人武装自卫纵队。这个自卫纵队的纵队长兼政治委员是新军政治委员中唯一的非共产党员郭挺一。政治主任侯俊岩是共产党员。

各纵队的负责人及其活动地区是：

一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纵队长鲁应麀（旧军官）、政治主任牛佩琮、参谋长梁述哉（旧军官）。主要活动在晋东南太岳北部地区，并在这里独立创建了根据地。

二纵队：政治委员张文昂、纵队长陈庆华（旧军官、不久离去）、政治主任韩钧、参谋长艾子谦（旧军官、后代

理纵队长)。活动地区主要在灵石至临汾的同蒲铁路两侧，以及乡宁、吉县、石楼、永和等晋西南广大地区。

三纵队：政治委员戎子和、纵队长陈光斗（旧军官）、政治主任董天知、参谋长颜天明（旧军官）。开始活动在曲沃、绛县、闻喜、运城一带。一九三八年秋转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高平、长治一带。

四纵队：政治委员雷任民、纵队长梁浩（旧军官）、政治主任李立果、副主任刘玉衡参谋长马骥（旧军官）。活动在文水、交城、汾阳、离石一带。

工人武装自卫队于一九三八年春扩建为工卫纵队，一九三九年改编为工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郭挺一、政治主任侯俊岩。该旅活动在太原、清徐、交城、文水、汾阳、离石、岢岚、五寨一带。

一九三七年成立的新军五个旅一级纵队，当时都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第四旅。工人武装自卫旅则为二〇七旅。但这些番号当时并未公开使用。

暂编第一师是由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的。从一九三七年九月组建开始，即在战动总会武装部程子华同志的领导下，在晋西、晋西北陆续组织起十四支游击队。一九三八年春整编为以续范亭为司令的保安二区部队时，合成八个支队。其中第四支队是由太原市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组成的，支队长刘墉如。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保安二区部队再次改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政治主任郝梦九（旧军官）、参谋长张希钦。暂一师先活动于太原、清徐、

交城、文水、汾阳、离石等地区，后转移到晋西北神池、五寨、岢岚一带活动。

山西新军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成立第一个团，到九月发展为四个团，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前发展为五个纵队共辖十四个团，这是新军发展的第一阶段。

一九三八年二月，阎锡山在临汾土门召开高干会议，开始倒退。他成立了反动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同牺盟会对抗。不许再用决死队名义发展部队。新军乃采取其它形式继续发展抗日武装。第一是成立游击团；第二是成立政治保卫队，第三是成立保安部队。当时，由于山西旧军被日寇击溃后尚未恢复，而敌人占领大城市和交通线后，对根据地的围攻与“扫荡”有增无减，所以阎锡山还需要新军为他抵挡日寇，因此，一九三八年新军的发展尚称顺利。

游击团，是于一九三八年夏秋，由四个决死纵队活动地区的牺盟游击队和农村人民武装自卫队为基础组建的，共建立起十三个游击团。

政治保卫队组建的情况是：决死二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仿效苏联红军，成立了三个政治保卫队（排），分属三个大队。一九三七年底又将这三个政治保卫队合并为政治保卫中队（连），以此为基础，在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由牺盟总会出面组成了政卫队（旅级）。接着，又以晋西南三十几个县的牺盟游击队和人民武装自卫队为基础，陆续组成了政卫一支队、二支队等两个旅一级的部队和三支队、四支队等两个团一级的部队。这五支部队都设有政治委员、政治主任，并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九三九年七月，

这五个单位分别合编为二〇九、二一二、二一三等三个旅，共辖九个团。具体情况是：

政治保卫队改编为二〇九旅，代旅长张韶方，政治主任廖鲁言。该部活动在晋西的吉县、蒲县、石楼、永和、大宁、汾城一带。

政卫一支队扩编为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政治主任朱佩瑄。该部活动在汾河以南，同蒲铁路以西的猗氏、临晋、安邑、万泉、荣河、稷山、闻喜、新绛一带。

政卫二、三支队合编为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政治主任程国梁。旅部和五十七团、五十八团活动于汾河以北、同蒲路以西汾城、襄陵地区；五十九团单独活动于中条山区的平陆、垣曲、夏县、芮城一带。

关于保安部队。由于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二纵队政委张文昂，三纵队政委戎子和同时兼任地方专员和保安司令，因而又各自成立了一个保安旅，每旅辖两个团，共六个团，大都是由牺盟游击队合编而成的。一九三八年，游击团、政治保卫队和保安部队的发展是山西新军发展的第二阶段。

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以前，新军共发展为九个师旅级单位，下辖四十六个正规团又四个游击支队（团），共计五十个团。当时，阎锡山的旧军编制也是五十个团。但新军是满员的，旧军则缺额甚多。因之，新军的实际兵力超过了当时阎锡山的旧军。以大的活动区域划分，新军在晋东南根据地活动的有十六个团；在晋西南根据地活动的（包括中条山的五十九团及游击支队）有二十一个团；在晋西

北根据地活动的有十三个团。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新军中的活动情况

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山西新军建军初期，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认真抓了新军的组建和训练，直接投身到组织和掌握武装这一中心工作中来。以后又分别担任了新军各纵队、师、旅的主要领导职务。新军各部从领导机关到基层连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领导。中共北方局鉴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为加强领导，协调行动，于一九三八年又确定薄一波为牺盟会和新军的总负责人。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前，在各根据地被日寇分割的情况下，薄一波与新军各部队负责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阎锡山召开的几个重要会议上（如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土门会议、一九三八年九月吉县古贤会议、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宜川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薄一波等新军各部负责人在党的领导下，对反共顽固派的倒退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各纵队、师、旅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都及时得到了党的指示。他们密切结合实际，正确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

山西新军中，除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委员制度。由

薄一波拟订、经阎锡山同意的《政治委员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是部队中的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均受其领导。”这一条例，大大便利了党对部队的掌握和控制，对部分反动的旧军官是个约束。二〇七旅是个例外，旅长兼政治委员郭挺一系自首分子，党就加强了对其下属干部的配备，使实际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新军中的党组织，在“十二月事变”前，大多是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各纵队（师、旅）和团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了党委、军政委员会、总支委员会、特别支部或特派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山西新军的三大任务，即“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主共和国；建立人人劳动，人人享受的按劳分配社会”。借用阎锡山的语言，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斗争口号以动员群众，推动工作。党中央对此种方式给予了肯定，并且指示推广这种做法。新军中实行着“三一制”，即军民一家，军政一体，官兵一致的制度；实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主集中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新军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八路军多方面的巨大支援。八路军先后派往新军各部的军事干部在四百名以上。不但加强了新军部队的指挥作战能力，也加强了党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力量。一九三七年七月，党中央应薄一波的

请求，从陕北秘密派去十名军事干部到军政训练班，开始当学员，后来都担任了游击教官。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开抵山西前线后，总部和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大主力陆续给决死队二、三、四纵队、暂一师等派了成批的红军军事干部。同时还代新军培养了大批干部。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邓小平、罗荣桓等八路军领导同志，都直接到新军各部队讲话、讲课，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讲八路军的传统，传授作战经验。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总部在沁县西林村还专为决死一纵队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两期，每期训练连排以上干部四百人左右。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授课，这对提高新军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大作用，山西新军把这次干部训练班称之为“西林整军”。

山西新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

山西新军诞生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大部分团队是在太原失守后、旧军不战而溃，日寇长驱直入，人民群众奋起自卫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在八年抗战中，新军各部进行了数千次大小战斗。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春，主要是阻击日寇向山西的进攻；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主要是反击日寇对根据地的围攻；一九四〇年参加了百团大战，以后主要是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积极参加了恢复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根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在晋东南太岳区的决死一纵队（其主力后编为决死队第一旅）从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参加的主要战斗约三百七十余次，毙伤敌伪一万四千六百余人。决死一纵队仅参加百团大战一役即伤亡九百九十七人。

决死二纵队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三十余次，毙伤敌伪军五千九百余人，俘日伪军四名，伪军投诚一百二十三名。二纵队亦伤亡九百九十一人。

决死三纵队，仅从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七月，即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五十余次，毙伤敌二千余人，俘日军八人。我军亦伤亡七百三十七人。

决死四纵队，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共进行大小战斗二百三十余次，大的战斗有十四次，其毙伤敌伪军二千余人。

工卫旅在八年抗战中，在晋西北晋中等地区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余次。其中由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二年即进行大小战斗一百八十六次。毙伤日伪军二千一百余人，工卫旅亦伤亡九百人。

政卫队（后编二〇九旅）经过大小战斗百余次。

政卫一支队，后编二一二旅，在八年抗战中，历经大小战斗二百余次，解放县城六座，歼灭日军四百余人及顽伪军等八十余人，自身伤亡五百人。

战斗在吕梁山南端的政卫二支队（后改编为二一三旅，不含五十九团），从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十

日，共进行大小战斗二百二十余次，毙伤敌伪军一千五百余人，政卫二支队亦伤亡三百五十多人。

政卫三支队(后编二一三旅五十九团)，半年内进行大小战斗二十余次，毙伤日、伪军近千人。

暂一师在第一路纵队时期，由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底，共作战一百余次。

新军在开展游击战争，浴血奋战的同时，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各部除抽调成批人员转作地方政权或群众团体工作外，团以上单位组织有专门的民运工作队，营、连设民运工作小组，协助地方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训练游击队和自卫队；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新军有四百名以上女战士，有的纵队还组织了有专门的妇女工作队；各单位建立了政治先遣队，宣传队和剧团。如一纵队的燎原剧社、二纵队的长城剧社、三纵队的前哨剧团、四纵队的前线剧团、二〇九旅的前锋剧社、工卫旅的工卫剧团、暂一师的长城剧团、二一二旅的黄河剧团等，进行了大量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在阎锡山旧军溃不成军，县长闻风而逃，政权纷纷瓦解的情况下，薄一波等通过合法手续，从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抽调成批干部担任抗日县长。到一九三八年春，全省一百〇五个县中，已有六十二个县的政权为我掌握。县长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基层政权也得到改造。如一纵队在太岳担任专、县、区领导的干部达二百人左右。工卫旅派出专员二人，县长九人，其他工作人员一百余人。一九四〇年以后，山西新军各部大多兼管军区、军分区的工作。如决

死一纵队兼太岳军区；决死一旅兼管太岳第一军分区；二一二旅兼管太岳第三军分区；决死三纵队兼管太行三分区，七团参加了组建太行八分区的工作；决死二纵队兼管晋绥八分区；决死四纵队兼管晋绥六分区；一纵队的五十九团参加组建了太岳四分区，五十四团及五十七团一部开辟了太岳五分区等。抗战胜利后组建野战军时，分区部队升级为野战师、旅；各分区又组建了基干团，并把基干团不断升级为野战军师、旅，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山西新军中，排以上的军事负责人员基本上都是由阎锡山配备的旧军官。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旧军官中的多数有抗日要求，但在训练、管理、作战等方面仍搬用旧军队的那一套。有一部分旧军官军阀作风较重，反共意识浓厚，抵制政治工作，并且同我党争夺领导权。对于这一部分反共顽固分子，我党通过民主运动、政治整军的办法，运用政治委员所具有的“最高首长”的权力，对他们的破坏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旧军官中的大多数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和区别对待的方针，不断扩大进步面，缩小和孤立反动面。从而团结了中、下级军官中的多数，也团结了一些旅、团高级军官。少数坚持顽固立场的则陆续离去，其中，有因打击政工人员、破坏政治工作被撤职的；有因怕苦和不愿由薪饷制改为津贴制而自动离职的；有因贪污腐化行为被揭露被调离的；有的因怕死，战斗不力被革职的。新军除九个团外，其余四十一个团，都是直接由我党组建的牺盟游击队升级而来的，其中虽有一些旧军人出身的干部，但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基本改造。

部队中的反共顽固分子，主要是团以上的旧军官，对于这些人在“十二月事变”前和事变中，新军的多数单位把他们或则撤换，或则调离，从而使我党牢牢地掌握了这支部队。

山西新军在成长过程中，还同张慕陶、李石安等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挫败了他们的破坏阴谋。在同晋绥军，中央军中的顽固派部队的斗争中，因为我们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结果无不以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

山西新军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山西“十二月”事变中经受了严峻考验

在山西新军中，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进步力量同新军中的顽固势力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订了反共的方针。是年冬天，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抗战开始，阎锡山在日寇进攻面前遇到重大困难时，希望新军和牺盟会为他“抵挡一阵”，保住地盘。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牵制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稳定了山西局势，使他得以存在并得到巨大利益之后，他看到新军和牺盟会的发展超过了他所“许可”的范围，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便支持右翼势力和顽固的旧军官压制，打击新军，暴露了其反动本质。他派遣联络官，视察团、“突击队”等“蛇蝎蝎蜓”进行捣乱。特别是一九三八

年底，在汪精卫投敌叛变、日寇加紧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他急剧倒退，密谋消灭新军，为他实行对日妥协投降铺平道路。一九三九年三月，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的军、政、民高干会议上，阎锡山坚持要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取消共产党对新军的领导权。并把四个决死纵队划分为两个旅，直接归他指挥；要将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编入旧军序列；把全省分为四个大行政区，由杨爱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等反动分子分任主任，以控制我各专署和新军各部队的活动；对调去秋林参加军官集训的干部单独接见，进行拉拢收买；甚至派遣特务，企图暗杀新军领导人。当这些阴谋破产后，便不惜使用武力。于一九三九年冬，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他以六个军的兵力，并与日寇勾结，向新军发动了进攻。企图先在晋西消灭决死二纵队和二〇九旅，然后再进一步消灭晋西北，晋东南的新军。新军各部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事先对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多方面作了准备。事变发生后，新军各部，在八路军的援助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对反共顽固军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

决死二纵队和二〇九旅连续击退六倍于自己的顽军七个团的进攻，击溃顽军二〇二旅两个团并消灭其大部，与八路军晋西支队一起苦战兼旬，转移到了晋西北。

四纵队、工卫旅和暂一师，在内部清洗了阴谋叛变的反动旧军官之后，北上接应二纵队，全歼了顽军骑一军步兵第三团及游击第三师，击溃了杨集贤、白志沂所部。晋西北的新军在一二〇师彭绍辉旅长率领的三五八旅的密切

配合下，驱逐了赵承授，郭宗汾的骑一军和三十三军并歼其一部，从而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固势力，使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除派部队接应由晋西南向太岳区转移的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外，还配合进入太岳区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三八六旅，给向我屯留、张店进攻的蒋军二十七军以严重打击，扼止了临屯公路以南的蒋军向路北的进攻。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日，配合八路军全歼了向榆次、榆社地区进攻的阎军暂一旅和新编第二师的大部。

处在晋西南地区，被日、阎四面包围的二一二旅和由中条山地区转移去的二一三旅五十九团，在配合八路军晋南支队突围途中，与日、顽军进行大小战斗十二次，经过七个昼夜的连续急行军，与一纵队接应部队胜利会师在太岳区。二一三旅五十七团、五十八团突破反共顽固军十二个团的重重包围和日寇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经历七次大小战斗，连续行军两周，于一九四〇年元月中旬到达太岳区沁沅县。位于汾河南北两岸新军部队的胜利突围，是山西新军在十二月事变中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决死三纵队，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指示，坚决清除部队中的反共顽固分子，在“十二月事变”中吃了亏。该纵队一九七旅旅长赵世龄，三纵参谋主任李翔初，总队长张济、孙瑞琨、王寿堂等反动旧军官率部叛变，使三纵队损失了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三个团又两个营，共三千五百余人。旅政治主任张凤阁，团政治主任郭鸿璜、郝廷珪及其他共产党员三百余人惨遭杀害。一九四〇年三月，

决死三纵队以游击十团、保安十一团、十二团和几个县的独立营为基础，恢复了三纵队的建制。随即配合八路军新一旅，三四四旅，在晋城、高平之间消灭了阎军独八旅的一个团和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继续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在其它部队中，也有个别旧军官趁机叛变的事例：二纵队六团团长陈雉卿、四纵队独立第七旅旅长卢宪高和二十团团团长刘鸿绪、暂一师四十四团团团长冀聘之等企图率部叛变。由于在这些部队中的我党组织采取了果断措施和部队中指战员的奋起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以失败而告终。他的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都遭到了沉重打击，有的溃不成军。蒋介石的中央军又趁机侵占了他一部分地盘，并企图趁机倒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党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镇，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劝其悬崖勒马，和平解决新、旧军冲突。为阎接受，达成协议。党的正确方针和措施使阎锡山后来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保持了中立，从而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

“十二月事变”后，新军整编为二十二个团，晋东南及晋西北地区各有十一个团，在晋西北成立了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治委员、张文昂、雷任民任副总指挥。一九四二年，新军各部名义上虽然保留了新军番号，实际上已分别加入了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一二〇师和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这时，新军各部队在内部进一步清除了反动旧军官，公开了党组织，

在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党委，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机构，以新的姿态阔步前进了。

一九四〇年秋，整编后的二十二个团全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奉命向各线出击，均取得了重大战果。在经受了严酷的战争锻炼后，新军各部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百团大战中，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决死一纵队二十五政治委员凌则之光荣牺牲。

随着日寇对根据地日益频繁而残酷的扫荡，新军在各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扶剔扫荡”和“铁滚扫荡”，进行了反蚕食斗争，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八年抗战中，山西新军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两万余名干部，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支军队的建立和巩固对于稳定山西抗战局面，保持山西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由于阎锡山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山西新军遂改变了原来的新军番号（有的在一九四二年底便改变了番号），正式列入解放军建制，分别南下或西进，参加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原新军中的有些部队编入了空军，装甲兵，工程兵等特种兵外；有些以新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有的获得了“临汾旅”，“雷锋团”，“石油师”，“南疆长城”、“老山英雄部队”等荣誉称号。山西新军的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概况

山西新军第二纵队史料征集组

一、决死第二纵队的组建和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决死第二纵队于山西赵城好义村在第四、第五、第六总队的基础上组建的。

第四总队，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总队。二总队是继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在太原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之后，于九月间在祁县成立的。它由晋绥陆军军士训练第二团的团部、政训部、第二、第三两个营、驻太谷的军士训练第一团的一个营和忻县的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九团的二百余人编成。下辖三个大队(营)，大队各辖四个中队(连)，近两千人。总队长崔郁(旧军官)，政治委员张文昂(共产党员)，政治主任韩钧(共产党员)。一大队大队长×××(旧军官)，政治主任廖井丹(共产党员)；二大队大队长程映泉(旧军官)，政治主任刘俊才(共产党员)；三大队大队长刘毅民(旧军官)，政治主任苏宇涵(共产党员)。总队政训部组织科长郝德青、宣传科长高子华、民运科长李汝山(亚马)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不久即被调往太原守城，十月中旬到达洪洞、赵城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扩大部队。

第五总队，是以二总队南下后扩建的四大队（原灵石游击队）、五大队（原洪赵游击队）和随后在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等地扩建的两个大队为基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组成的。共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两千五百人左右。总队长先后是郭熙春（旧军官，不久便辞职），钟舍生（钟人仿、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政治主任廖井丹（共产党员），总队附李子法（旧军官）。一大队队长张龙韬，政治主任先后是彭永年、武振刚（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二大队队长何金明（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政治主任石玉淦（共产党员）；三大队队长王英清（共产党员、红军干部），政治主任任象贤（共产党员）；四大队队长岳毓海，政治主任余平若（二人都是共产党员）。

第六总队，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由原驻原平的国民兵军官教导第八团改编的。当时该总队在晋东南长治一带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到吕梁地区归建。下辖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内有一个机炮中队），近两千人。代总队长陈纯汉（旧军官），政治主任先后是傅雨田、廖鲁言（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一大队大队长赵成玉（旧军官），大队指导员（六总队在晋东南时期称大队的政治主任为大队指导员）先后是任景龙、王润（都是共产党员）；二大队大队长刘××（旧军官），大队指导员先后为张一琦（张俊造）、郝上甫（都是共产党员）；三大队大队长先后是郎子箴、赵文汉（都是旧军官），大队指导员先后为张静波、刘崇忠（都是共产党员）。

纵队部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组成，纵队长陈庆华（旧军官），不久辞职，遗缺由纵队参谋长艾子谦（旧军官）代理，

纵队政治委员由第六行政公署主任张文昂兼，纵队政治主任韩钧。纵队司令部下有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秘书处及电台、机要室等。纵队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民运、敌工、秘书等科。纵队直属单位有特务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扩大为特务营）、山炮连。干部多数是由四总队调配的，队员大部分是就地动员来的。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纵队机关和直属队共有一千四百余人。

太原失陷后，日军大举进攻，阎锡山的山西旧军及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山西旧政权纷纷垮台。遵照我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的方针，各决死总队和牺盟洪（洞）赵（城）中心区各县牺盟会在晋西南区党委和各县委领导下，发动群众，组成自卫队、游击队奋起抗战。抗日自卫队、游击队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三八年秋，组成了六个游击团（即游击第三、四、五、六、十二团和保安十二团），统归二纵队建制。这时，二纵队已拥有九个团的兵力，一万四千余人。

游击第三团，是一九三七年冬由孝义县牺盟游击队和平遥县牺盟游击队一部分组成，全团人数最多时达二千余人。团长曹诚（共产党员，原孝义县牺盟特派员），政治主任李文炯（共产党员，原平遥县牺盟特派员），副团长先后是杨家泰、潘峰（均为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主要活动于孝义、灵石。

游击第四团，是由隰县、灵石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洪（洞）赵（城）游击第一支队合编而成，全团一千二百多人。团长先后为刘毅民（旧军官）、张龙韬（叛徒，晋西事变时

被处决)，政治主任金树源(共产党员)。主要活动于灵石、隰县一带。

游击第五团，是由洪洞、赵城、临汾三县联合游击支队和游击一支队合编而成，全团二千多人。团长杨育才，政治主任李明成(均为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团附吕怀忠(共产党员)，主要活动于洪洞、赵城、临汾、汾西。

游击第六团，是由隰县、汾西的游击队和活动在汾西、赵城边界上活动的张官年(共产党员)营合编而成，全团一千人左右。团长缺，政治主任李汝山。主要活动于汾河以东的霍县、赵城、洪洞等地。

游击第十二团，是由汾西游击队(一度曾编为第六行政区保安四支队)与活动在晋西南的决死三纵队的十支队合编而成，全团一千人左右。团长陈雉卿(旧军官)、贺鸿庆(共产党员)，政治主任孙迪民(共产党员)。主要活动于汾西、蒲县、隰县。

保安第十二团，是由五总队第四大队和第六行政区保安支队扩编而成，全团近一千人。团长李子法(旧军官)，政治主任张少康(共产党员)。主要活动于汾西、隰县之间。

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二纵队部办了随营二分校，各总队都办了军政训练班，招收、培训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部队输送了不少干部。当时纵队和牺盟洪、赵中心区负责人去讲过课。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不断加强部队的建设

决死二纵队和新军各兄弟部队一样，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的产物，是在党的“扩红十万”的号召下组建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始终是党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武装。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文昂受命组建决死二总队时，党的北方局负责同志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就对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了指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朱德、任弼时等，曾先后到洪洞万安镇向驻在那里的五总队和四总队及纵队部的部分同志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华北抗战形势和任务等报告。一九三八年四月，罗荣桓曾召集张文昂、韩钧等研究部队建设问题，指示二纵队进行整顿，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游击三团创建之初，邓小平、傅钟曾多次给予具体指导，帮助解决问题。北方局、八路军前总、一一五师领导同志的关怀、指导和大力支援，对决死二纵队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二纵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为书记）直接领导的。为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当时，党的组织和领导关系是秘密的。纵队（旅）党组织与各总队（团）党组织，不发生组织联系，直接归区党委军事部联系领导。区党委军事部长黄骅、副部长王逢源，经常巡回深入部队指导工作。各总队（团）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随历

史演变，不尽相同。多数总队（团）设有总支，大队（营）设分总支或支部，中队（连）设支部，但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传达党的决议指示，安排工作，交流情况和意见，一般都是单线个别进行。部队中党的工作抓得很紧，党员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是部队建设、战斗和各项工作中的骨干，从而保证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随着二纵队的大发展，地方党组织也不断输送党员参军，部队的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到晋西事变前夕，五总队党员的数量在全体指战员中已占百分之十左右，排以上政工干部和连以上军事干部大多数是党员。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部队普遍建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这本来是阎锡山为抵制“三青团”和“民先”倡导组织起来并自任团长的，但实际上为我党所掌握，起了党的外围组织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二纵队从组建之初就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突出了政治委员职权和政治工作的作用。总队一级虽未设政治委员，但当时的政治主任完全行使政治委员的职权。强调实行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贪污浪费。连队组织伙食委员会，经济公开，按时公布账目，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民革室”、“救亡室”，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纵队政治部出版了《‘长城’三日刊》，还组织了长城剧团。各总队也都出版了油印小报，并组建了剧团，以指导工作，丰富部队的精神生活。此外，政治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是

组织和发动部队，做好驻地的群众工作；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的宣传，组织防奸反特，武装自卫；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增进军民团结。纵队还建立了民运工作队，部队各级也都组织有相应的队、组负责此项工作。

由于部队处于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戴着阎锡山的“帽子”，特别是在四、六总队当中，从上到下阎锡山配备了旧军官和旧军士。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抗日的，但他们旧习气很深，同二纵队的新制度，新作风格格不入；少数中、上层分子思想反动，反对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排挤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同我党争夺对部队的领导权。因而经常发生所谓“军政磨擦”。党组织对旧军官、旧军士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团结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的人进步很快被吸收为党员，有的被提拔为营、团干部。对少数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则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人以后陆续地离开了二纵队。

二纵队是在八路军的大力帮助下迅速发展健康成长的。早在二纵队成立之前，从二总队南下洪（洞）赵（城），六总队转战晋东南时，就同八路军紧密配合，共同战斗。在训练、作战、干部培训和政治工作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和支持。八路军曾先后派出百余名红军干部到二纵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对二纵政治、军事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配合八路军坚持吕梁山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向晋南作战略性进攻。此时，决死二纵队成立不久，便配合八路军及其他友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二总队在贯彻上级关于“发展游击战争，保护人民，打倒伪组织，恢复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扩大决死队”的指示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创建晋西南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日军为实现其占领临汾及整个晋南，然后移兵徐州前线，打通津浦线，会攻武汉或进军西北的战略意图，调动以三万余人，从晋中、冀南、豫北，沿同蒲、平汉、道清等铁路线，向临汾进犯。二月二十日，敌与二战区部队激战于隰县上下均庄一带。二纵队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从侧后箝击敌军。三月十日，五总队收复隰县康城镇，并破坏了汾（阳）隰（县）公路，造成敌后勤补给的严重困难，配合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取得了著名的午城战斗大捷，粉碎了敌人进犯黄河河防的企图。

三月二十日，决死二纵队对南同蒲路中段，长达一百多公里的铁路线进行大破击。袭击了孝义、义棠、两渡、南关、富家滩、许家店、霍县、朱家山等敌据点，破坏铁路数十公里，毁机车两台，车箱多节，使敌半个月多未能通车，迫使敌人不得不转移兵力，回守据点。

三月二十八日，敌人向兑九峪、大麦郊、郭家掌进攻，企图将我军赶出吕梁山区和同蒲路沿线。二纵队首先集中

全力阻击进犯之敌，迫其退回原地。其后，五总队伏击经石口、川口进犯双池之敌千余人，毙、伤敌二百余人，迫使其回窜孝义。同时，进犯兑九峪、郭家掌之敌，遭一一五师痛击后，也败回孝义。四月初，四总队的七、九两个中队在汾西神符与四百余名敌人激战终日，毙、伤敌甚众。

四月中旬，五总队一、二大队在韩信岭与静升镇前后设伏，击毁敌汽车近二十辆，毙伤敌百余名。

同年秋，游击三团在霍县以北设伏，全歼敌护路队两个班。九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汾离公路上三战三捷连续歼敌。该团在这次战斗中，积极配合八路军箝制敌人，完成了保障一一五师师部后方安全的任务。

十一月，游击四团三营在汾西之瓦窑圪塔，抗击由霍县进犯之敌两个中队的进攻，毙、伤敌三十余人。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五总队在隰县午城镇附近，毙、伤敌近三百人，受到纵队的表扬及二战区的嘉奖。次日，游击十二团在蒲县金沟子伏击由午城溃逃之敌，毙、伤敌五十余名。

四月十八日上午，五总队在罗汉予企图在同蒲铁路西侧之王禹扎据点，建立伪政权的四百余名敌人以迎头痛击，并将敌围困在罗汉村一座大庙中。次日（十九日）在与敌人援军激战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毙、伤敌三百余名（其中指挥官四名）。这次战斗，振奋了人心，挫败敌在王禹安设据点的企图。从此，五总队（老五团）被人们称做“老虎团”。

据统计，截至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决死二纵队在近两

年中，共进行大小战斗三百二十八次，毙、伤敌、伪军五千九百余人。伪军反正投诚一百二十三名。在两年浴血奋战中，二纵队也有干部和战士六百三十九人负伤（其中干部三十三人）有三百五十二人（其中干部三十二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四、在反共投降的逆流中前进

武汉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策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诱惑下，本着他“存在就是真理”的老主意，逐步由所谓“联共抗日”转向“联日反共”。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他在陕西宜川县召开“秋林会议”，提出了种种反动措施，限制和破坏新军和牺盟会。

一九三九年七月，阎锡山为对新军“分而治之”，把二纵队分编为三个旅。原四、五、六总队改为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团，编为独立二旅，旅长艾子谦，政治主任韩钧。游击三、五、十二团，改为十五、十七、四十一团，编为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旧军官），政治主任徐荣（唐方雷，共产党员）。游击四团改为保安十一团，和保安十二团合编为保安旅，旅长由第六行政区专员张文昂兼，政治主任彭永年。游击六团改为游击九团，调归晋西北的工卫旅（已被改为二〇七旅）建制，为二十三团。阎锡山还派遣“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的反动分子到新军各部暗中破坏；派“联络官”、“点验团”公开捣乱。并纵

容旧军向新军防区大宁、临汾、蒲县、洪洞、赵城等地逼近，摧毁牺盟政权，绑架杀害地方干部，袭击新军甚至八路军分散活动部队、后方留守单位和兵站；禁止群众给八路军送粮。一时反动气焰甚是嚣张。

针对山西出现的反共投降逆流，党中央于五月十三日和八月十日，接连就我党在山西的工作方针和对策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对于阎锡山的进攻必须予以反击；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对此也都有明确的指示。七月，廖井丹奉命由延安返回二纵队，传达了毛泽东“反投降提纲”报告的精神。

二纵队于八月在隰县义泉召开原二纵队各旅、团负责人会议，明确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为宗旨，拟定了各项工作原则，决定仍由原二纵队的纵队部协调各部的行动，以抵制阎锡山“分而治主”的阴谋。并决定部队干部的升迁调动和作战命令，不经政委张文昂批准，一律无效，从而坚持了政治委员制度。遵照党中央和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二纵队在党内进行了防止突然事变的动员，在部队中深入广泛地开展了有关形势和政策的教育。先后将五团、四团的反动军官调离连队或送到纵队或送秋林“受训”，挑选了政工人员担任军事指挥员。做了防止突然事变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阎锡山在秋林召开“同志会”临时代表会议时，就决定成立所谓“讨叛军总指挥部”，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任总司令，企图以其在晋西南的大部兵力，联合日军，消灭决死二纵队，并向驻隰县、蒲县、

中阳、孝义等地的政卫二〇九旅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支队进攻。

十一月初阎锡山派其第六十一军的吕瑞英和第十九军的梁培璜为代表与日军清水师团长的代表山下，在临汾刘村秘密会谈，达成了联日反共的协议。

十一月二十九日，陈长捷密令顽军各部开始行动。兵分三路：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警备军七十三师，陈自兼司令，进攻驻隰县的黄土，义泉的六区专署、决死二纵队司令部；北路纵队司令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一部，进攻驻隰县、孝义交界处的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的八路军晋西支队；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泉子坪。这时，日军也集中五千余人于临汾至平遥之间的韩信岑一带，准备配合顽军行动。

与此同时，阎锡山密令驻晋西北的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和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将骑兵军和三十三军集结于兴县、临县地区，监视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的动态，阻止晋西北与晋西南两区的新军、八路军汇合，以便将决死二纵队消灭于晋西南后，再合力消灭晋西北的新军和八路军，以实现“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的美梦。

十二月一日，阎锡山借对日军开展秋季攻势之名电令决死二纵队务于五日准时向同蒲路灵石至霍县段的日军“大举进攻”，他把四十七个团的旧军作为“总预备队”，堵在二纵队的背后，以配合日军消灭决死二纵队。十一月下旬，顽军六十一军即将一个营安置在决死二纵队司令部和第六行政专署附近的谙正村，其目的在于战斗一打响即首

先消灭二纵部队的首脑机关，使部队失去指挥。事变已迫在眉睫，决死二纵队遂于十二月二日将该营解除了武装。

十二月三日，一九六旅旅长、反动旧军官白英杰在永和驻地叛变，策应十九军包围解决了该旅旅部，将游击三团警卫旅政治部和驻守永和兵站的两个连缴械，将大部分政工干部逮捕。先后捣毁了我永和、大宁、蒲县、临汾、洪洞、赵城等县县政府，公安局、自卫队和牺盟会，杀害了蒲县县长李玉波，临汾县长李从文，洪洞县县长高希敏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多人。八路军晋西支队隰县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病员也惨遭杀害。

早在十月间，阎锡山为了消灭二纵队，借开会之机，将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羁留于秋林，以封官许愿的办法引诱韩脱离二纵队。十一月二十七日，韩钧脱险回到部队，即将会议期间所了解到的阎锡山阴谋消灭新军并已准备就绪的情况向区党委作了汇报，区党委亦当即报告了党中央。

十二月六日区党委书记林枫在隰县张家川召开紧急会议(张文昂、韩钧、廖井丹、郝德青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形势，决定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前敌指挥，廖井丹为参谋长，统率晋西南所有的新军和八路军一致行动。并任命徐荣为西南军区司令员(未到职)指挥一九六旅三个团；郝德青、刘德明(八路军晋西支队参谋长)为东南军区正副司令，指挥保安旅两个团。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有关部队的重大行动由陈士榘、黄骅负责指挥。

总指挥部成立后，部队集中动员和准备了三天，进

一步对反动军官进行了清理，并从晋西支队调去干部加强部队的指挥和领导。

十二月七日韩钧致电阎锡山，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的罪恶行径，拒绝了执行阎锡山包藏祸心的所谓“命令”。阎锡山逐通电全国，诬称“韩钧叛变”，对决死二纵队“明令剿除”。二纵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晋西事变”就这样开始了。

十二月九日我方开始军事行动。总指挥部的第一个作战方案是：我军一部就地作战，主力部队分两路，一路出击隰县，一路出击石楼、永和，然后会师午城，直捣大宁、蒲县，彻底粉碎旧军的包围和进攻。当天，五团在隰县附近，捕获顽军北路纵队总指挥梁培璜派往二一七旅递送作战命令的少校参谋吕昌寅及其所带全部文件。这使我们准确地了解到顽军的作战部署和其险恶用心。

十二月十一日晚，二纵队六团团长、反动旧军官陈雉卿于汾西它支村发动叛乱，将政治主任李曙森、组织科长任景龙、宣传科长廉指明、民运科长王劲虹、一营教导员王润等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秘密逮捕。六团指战员在二连指导员姚永征的带领下，粉碎了陈雉卿的叛乱阴谋。接着进行了整编，三个营合并为二、三两个营，将游击十二团的一、三营编为六团的一营。以后，六团在川口、石口、大麦郊等地连续作战。先后打退了顽军三十三军两个团、七十三师和十九军一个师的轮番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完成了指挥部下达的任务。

十二月中旬，我二纵队出击隰县的部队，消灭了顽军

十九军一个营及一个团部，敌驻隰县之一个旅部逃走，取得初战胜利。

十二月十四日，陈长捷率七个团向二纵队保安旅进攻，占领汾西县暖泉头。黄骅率晋西支队第二团增援，顽军两个团击溃。

二十一日，决死二纵队集中游击三团和四团、五团及晋西支队一团、二团、政卫二〇九旅两个团向据守于孝义县水头镇之顽军十九军一部发起进攻。进攻受阻，遂撤出战斗。

总指挥部鉴于部队已很疲劳，且弹药不多，而顽军各部已大体完成其会师康城北进的部署；汾孝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又处于日军与顽军包围之中，对我不利，毅然决定部队西进南下，打到顽军后方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总指挥部以新军各部为第一梯队，晋西支队为第二梯队，出弓阳，关上，准备由中阳、石楼分两路南下，直捣永和、大宁、吉县、乡宁顽军老巢。两个梯队先后顺利越过吕梁山，抵中阳县境。二梯队西进，第一日占留誉，歼三十三军一个营；第二、三日，在三交激战两日，歼顽二〇二旅两个团大部。一梯队南下被阻，未至石楼即撤回三交与第二梯队会合。这时，由于部队极度疲劳，且兵员、弹药、被服无以补充，敌我兵力悬殊，南下势难取胜。为保存革命力量，遂决定变南下为北上，向晋西北转移（行动的同时报经中央军委同意）。总指挥部为了掩护主力北上，令游击三团转回孝义牵制敌人。

晋西南的新军和八路军冲破顽军的围攻和截击，击溃

和歼灭顽军两个旅后，胜利实现了向晋西北转移的战略意图，并与彭绍辉、罗贵波率领的接应部队取得联系。

游击三团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之后即开赴临县归建、该团二营在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长王达成率领下，返晋西南中（阳）离（石）汾（阳）孝（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小股顽固军，安排地方工作，收容失散人员。在两个月中，先后歼敌约两个多营并击溃顽警卫军傅存怀部八个团的进攻。

一九四〇年元月二日，晋西北的新军和八路军开始临县战斗的外围战，经八天激战，消灭顽军三个团，击溃其一个团，将顽军压缩到临县城附近。此时，八路军晋西支队、决死二纵队，亦开赴方山、圪洞结集待命。

一月十一日，在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我军向临县发起进攻。以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为右集团，自白文镇沿大川南下，直趋临县；以晋西南新军和八路军为左集团，从方山、圪洞向临县出击。经过三天艰苦战斗，歼灭三十三军二〇〇旅等部，迅速逼近临县县城。十三日晨左集团晋西支队一团、二团和决死二纵队六团会攻临县城东的指火圪塔制高点。十三日晚，守敌赵承绶、郭宗汾率部弃城南逃。我军即占领临县城，继续向三交、招贤方向追击，直到顽军越汾离公路南窜，始奉命停止。

临县战斗俘顽军副师长郭如嵩以下二千多人，缴获第二行署印钞所的全部机器和人员（内有少将一人）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一月二十一日，晋西南区党委在临县龟岭村召开晋西

南反顽斗争总结大会。在会上滕代远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宣布“决死二纵队是党领导的有保证的部队”，使与会同志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一月中旬，贺龙、关向应、甘泗淇返回晋西北。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新军总指挥部相继成立。二月初，我兄弟部队又次第肃清盘据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地的阎锡山顽军。一二〇师主力也返回晋西北。从此，开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党中央为争取阎锡山抗日，不给蒋介石插手山西以借口，四月初与阎锡山达成以汾（阳）军（渡）公路为界，以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以南为阎锡山活动区域的协议。二纵队遂留在晋西北，加入了建设和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的行列。

五、四个月大整军

一九四〇年三月，临县战斗结束后，二纵在以方强为首的整军工作团和八路军一二〇师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了全面整军工作。

整军中最振奋人心的事，是党组织的公开。整个纵队建立了党的统一领导体系，加强了部队各级党的领导，建立了“党日”、“党课”、会议、汇报等党的生活制度；严格了党的生活，提高了党的战斗力。经过“晋西事变”、“反顽”斗争等严峻考验，党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和个别坏分子，提拔了一批优秀干部

到各级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工作。同时，加强了参谋工作，建立与健全了作战、侦察、通讯等机构和业务制度。建立了供给机构，实行了供给制，健全了纵队和各团的卫生处（队），千方百计克服物质供应和医药卫生方面的困难，使部队生活有了改善。增设了保卫工作机构，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部队还普遍建立了朱德青年队，培养进步青年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开展了民族仇恨与阶级觉悟的教育。在整军中纵队开办了教导营，各团开办了训练班，培训了大批干部和专业人员。为推动整军工作全面进展，开展了纪念“红五月”大竞赛。部队搞得热火朝天、生龙活虎，到处是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气象。这次整军，虽然仅四个月左右，中间还不断受到敌人“扫荡”进攻的干扰，但部队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飞跃的进步。使二纵队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次整军中，纵队党员结合实际，深入地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据据地的政权问题》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澄清了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反顽”斗争是“变相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合”等等糊涂认识，从而使“晋西事变”以来，部队以至党内产生的“左”的倾向以及发生的乱抄、乱打，乱抓、乱杀等错误做法从根本上得到了纠正。指战员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在整军中，部队进行了整编。二纵队当时为八个团，“晋西事变”中游击五团编入四团；游击十二团编入六团。这次整编将保安十一团、十二团，分别编入四团和六团。游

击三团当时随晋西支队活动，同年十月归建后与五团合并。这样原来的八个团就编成四、五、六三个团了。

整编后纵队及各团的领导人是：纵队司令员韩钧，副司令刘德明，政治主任廖井丹，副主任王逢源。四团团团长李敏，政委郝德青，政治主任武振刚；五团团团长刘兆先，政委暂缺，以后是李文炯，政治主任先是李晓村，后是林山；六团团团长熊钧，政委李曙森，政治主任李明成。

在整编中，贯彻执行了精简机关，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撤消了各团留守处。团宣传队并入纵队宣传队；老、幼、病、残送纵队后方安置；有一部分干部转到地方工作；动员补充了一大批新战士。整编后纵队机关和直属队、各一千三百多人，四、六团都是八百多人，（五团与三团合并后）约二千一百人，全纵队合计五千多人（不包括纵队后方留守处），部队大大精干了。

整军是在战备姿态下进行的。为保证部队安全整军，各团经常派出一部分部队，进行侦察、警戒，游击活动，随时打击出扰之敌。三月下旬，日军四千余，在空军配合下进犯我三交、碛口、临县地区，遭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和游击三团打击后，又窜犯二纵队驻地方山、圪洞、兴隆一带。二纵队各部自二十八日到三十日，连战三日，将敌击退。

六、参加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坚持八分区的对敌斗争

整军刚刚结束，部队就开始反敌夏季“扫荡”的战役行动。从六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二日，二纵队各团在大武至临县，大武至方山的公路两侧，连续进行了杨家岭、南沟、木谦塔、姚家山、康家塬、水杨树梁、白龙山、柳坪塬、阳湾、贺家圪台等十多次战斗，共毙敌一百九十三名，伤敌六十名。还袭击了信义、大武、峪口等敌据点，破坏了大武至临县，大武至方山之间的公路桥梁、涵洞，断敌交通，造成其补给困难。敌人所到之处，空室清野，敌人无法立足，被迫退走。

八月，二纵队参加了“百团大战”，由临县玉荐一带出发，于二十日夜对汾（阳）离（石）公路分段进行破坏，袭击了汾离、离岚公路沿线的大武、信义、吴城、王家池及文水西关等敌据点，攻入了信义和王家池，杀死了敌人驻王家池部队指挥官川濑队长，并毙、伤敌三十余人，一度使敌人的运输中断，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对正太、同蒲铁路的大破击。

十月二十七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各一部共三千多人，对决死二纵队活动地区汾阳、交城、文水及静乐、楼烦等山区疯狂“扫荡”。二纵队五团三营趁敌在汾阳高家庄集结出发之际，猛袭其后卫部队，杀伤敌伪军

一部；对其前卫部队也在马家庄予以袭击，毙敌指挥官两名，士兵十数名。

（一）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的成立和对敌斗争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晋西北军区（一九四二年十月改为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以二纵队为基础组成。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王逢源，副司令员侯俊岩（工卫旅旅长）、刘德明，参谋长李敏，政治部主任廖井丹（未到职，由王逢源兼）。分区部队主要是决死二纵队、工卫旅和洪赵纵队。二纵队四团团长王何全，政委李明成；五团团长刘兆先，政委李文炯；六团团长陈菊生，政治委员李曙森。

八分区地处同蒲铁路以西，汾（阳）离（石）公路以北，北接六分区，西连三分区，东邻太原，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通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旁边的太原市汾阳县，是日军屯兵重地，是日本山西派遣军旅团部驻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二月十二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及二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第四混成旅团之各一部，共二万多人，分兵三十一路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三十五天的冬季大“扫荡”。敌人的基干支队共十八路，就有六路是在八分区境内。敌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和“筑（据）点修（公）路”，以长期分割我根据地。二纵队一方面以小部兵力在内线袭扰敌人，并抽调干部组成武工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活动；一方面令四、五、六团各以一部转到外线，在太

(原)汾(阳)和汾(阳)离(石)公路沿线，破路炸桥，断敌交通。在这次反“扫荡”中，二纵队作战数十次，破坏公路数十公里，歼敌四百余名，配合军区主力取得冬季反“扫荡”的胜利。

接着，自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日、伪又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我实施所谓“总力战”，在敌占区强化其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对根据地加紧“扫荡”和“封锁”、“蚕食”，并配合远距离轻装奔袭。据统计，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敌对八分区部队的奔袭达十七次之多。其中最严重是三次：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军清水旅团之“敏速部队”四个中队，包围袭击了驻交城中庄之二纵队纵队部，二纵队伤亡、被俘、失踪百余人；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六团在中庄被袭，两个连和团党员训练班受严重损失；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春节，二纵队纵队部在交城南沟被袭，副司令员刘德明亲率警卫连掩护机关转移，不幸遭狙击光荣牺牲。

敌人的猖狂，并没有吓倒八分区军民。为扭转局面，二纵队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活动，掩护地方工作，破坏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并相机打击敌人。一九四一年三月六团一营和汾阳大队下到平川敌占区，在平遥县回回堡反击进犯之日军，歼敌大部，击毙敌小队长高桥，生擒日军曹长佐佐木。五月十三日，六团为掩护地方干部筹集军用物资，又深入汾阳敌占区裴会镇，在汾阳大队配合下，粉碎晋中五县之敌一千多人的合围，毙、伤敌二百多人，大大

振奋了敌占区人民，牵制了侵入我根据地的敌人。同年秋，二纵队五团三营及二营四个连，在交城刘庄与敌堂滕小队三十余人及伪军七十余人遭遇，将敌全歼。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二纵队集中了四、五、六三个团的各部分兵力，于交城中西川石沙庄附近围歼由文水奔袭二纵队之日军佐佐木突击队，毙、伤敌百余名。敌突击队长佐佐木被击毙，只剩十三个残兵败卒在援敌的接应下狼狈逃走。这次战斗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再不敢长驱直入根据地了。但是，敌大兵力的“扫荡”却频繁起来，并且常常是数路出动，分进合击。六月，敌若松旅团，调动驻离石、汾阳、文水、岚县、古交等地之三千多兵力，分头“扫荡”八分区。从八日到十八日，二纵队和分区各部队以及民兵、游击队共战斗四十一次，毙敌二百余名，伤敌九十余名。由于日寇对八分区的封锁、包围、逐步紧缩，八分区一度缩小到只有十七个行政村，大片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分区部队几无回旋余地。延安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被切断，形势非常严重。为改变被动局面，部队主动出击。九月二日，六团组织三个连的兵力奇袭了位于汾阳城西五华里的协和堡敌据点，毙敌三十余名，俘伪区长以下二十余名，缴获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四十馱，自行车二十辆。这年冬，驻峪口之日、伪军四十余人，又潜入到交城水冲沟山庄待机袭击我军，被我五团二营六连歼灭其大部，日军小队长志贺义雄被击毙，残敌十余人在援敌接应下逃走。

在坚持八分区的对敌斗争中，二纵队派出得力干部，

加强各县区游击队的建设，协助各地武装部开展群众性的地雷战、麻雀战和侦察、情报工作。并先后多批调干部到地方参加党、政及财贸、政法、文教以及农、工、青各方面的工作。还组织部队干部积极参加当地减租减息、反奸反霸等工作。

(二)保障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之间交通安全

接送过往干部和文件、物资，是第八军分区党、政、军民的一项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往来于八分区境内，不仅要通过同蒲铁路、汾河、太（原）汾（阳）公路、离（石）岚（县）公路等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还需经过星罗棋布的敌人据点，和百里行程的晋中平川敌占区。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纵队组成了交通支队（营的编制），支队长马林，政委郝上甫，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密切配合下负责执行这项繁重任务。在许多情况下还得增派部队掩护。一九四二年以来，交通任务日增，敌人的封锁也日严，为适应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原交通支队扩建为四个交通队、六个兵站，在分区交通科的领导下，分工担负分区东西两方面的交通任务（后来地委和有关县委也都组织了交通科、队）。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据不完整的统计，共接送干部二千七百五十二人，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邓小平、刘伯承、杨尚昆等许多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同志以及“七大”代表多人；掩护过往部队、学校等多批，约五万人；护送“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及新闻记者等外国人数百；护送物资、武器、文件、

书刊等甚多。这些任务的完成，是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深入的群众工作，可靠的群众基础，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根本保证。

不少交通任务的完成，经过了激烈战斗和流血牺牲。如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分区部队在掩护八路军前总炮兵团通过敌战区时，四团在交城东雷庄与敌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掩护炮兵团安全通过，四团团团长王何全牺牲。同年夏初，五团二营到太岳区接干部，途经清(源)太(原)平川敌占区，在东里解村与出扰之日、伪军数十人发生战斗，歼其大部，并击毙日军小队长。接着又将由太原等处增援之日、伪军七百余人击溃，日军黑石大队长被我击伤。敌受重创后，弃械逃跑，我俘敌数十人，缴获自行车七十多辆。我亦伤亡数十人，三营营长董志行阵亡。

(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坚持第八军分区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敌人的频繁“扫荡”、“三光政策”、“治安强化”、“封锁”、“蚕食”，使八分区受到极大破坏，真是“敌踪所至，庐舍为墟，淫虏烧杀，万民涂炭”。加之连年灾荒，军民生活极度困难，基本上靠吃黑豆、糠菜维持生命，油盐很少吃到，人们体质下降，疾病丛生。指战员有冻饿而死者，有因病无药治疗而死者。困难如此严重，但大家坚信，这是暂时的，是“黎明前的黑暗”。决心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八分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

一齐动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群众劳武结合，生产自救，尽管自己生活十分困难，但仍做鞋交粮，支援部队。部队挖窑洞建设营房，开荒种地，尽力减轻人民负担。没有鞋穿就拣破布乱麻来打草鞋；没有冬装，就梳洗羊毛代棉絮。每人口袋里都装着羊毛，得空就捻线，编织衣、袜、手套。学文化没有本册，就剥桦树皮当纸用。在严重困难面前，大家同甘共苦，互爱互让的精神是克服困难的无形力量。

在晋绥根据地物资极端匮乏的时候，晋中平川敌占区人民给予了可贵的支援。晋中平川原本物资丰富，盛产粮、棉，由于敌、伪的搜刮、抢掠，群众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可是敌占区人民心向共产党，仍千方百计地筹粮、筹款，支援根据地的斗争。他们白天把粮食分散藏在各家各户，躲过日、伪搜刮，夜晚迅速集中，冒着身家性命危险，在部队的掩护下，突破敌人的封锁，送粮上山。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不到半个月时间，敌占区人民就把五十多万斤粮食送到山上；他们还不断地为根据地代购、代运布匹、纸张、文具、医药等必需物资。为粉碎敌人的冬季大“扫荡”作出了贡献。

为了克服困难，保障供给，部队各级后勤部门的同志们尽心竭力地做好工作。一九四〇年，纵队部派副官长张英明等到陕北佳县神泉堡组建了后方留守处。他们艰苦创业，不久就办起了修械所、被服厂、织布厂、鞋厂、化工厂（生产肥皂）、运输队以及休养所等。与此同时，韩钧司令员亲自出马在临县组建了“同济商号”，吸收了一些开明人士参加，开展生产、运销、采购等业务。随后又办起

了“晋华货栈”以及纸厂、烟厂、被服厂、休养所等等。这些都由后方留守处管理。后方留守处的职工们，深知责任重大，尽管生活也很苦，甚至连津贴费也没有，但工作和生产的热情很高，在一切为了保证前方需要的口号下，不但担负起对部队供应的任务，而且还承担了接送延安与各根据地之间来往经过的人员的工作。后来纵队的教导队、家属学校也都在这里办起来，一切供应均归他们负责。后方留守处成了二纵队对敌斗争的可靠后方。后来新军后方留守处成立，二纵队后方留守处并入新军后方留守处，其规模和任务进一步扩大了。

在前方，部队各级后勤供应部门，也在地方党、政、民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发展生产，力求自给。他们在交城横尖镇、西葫芦都设了生产科，在横尖、会立、关头、戴家庄、小木沟、天池店等地设点榨油，养猪，做豆腐，部队所到之处可以就近得到供应。除此之外，前方还设立了修械所、炸弹厂等。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从事农业生产，到一九四二年，部队口粮的三分之一已可自给，食油基本自给，还可保证少量的肉食，生活开始有了改善。一九四三年以后，随着党的“十大政策”的贯彻执行，对敌斗争的不断胜利，根据地生产得到发展，部队的物质生活逐步有了更大的改善。

七、精简整编，迎接新的胜利

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和晋绥军区的指示，二

纵队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先后两次精简整编。第一次整编（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先是四团、后是六团各编为三个连，直辖于团。四团团团长张开基，政委武振刚，参谋长吴化民，政治处主任刘英。六团团团长陈菊生，政委李曙森，参谋长郭庆祥，政治处主任张范。五团编为两个营，每营辖三个连，并保留了通信连、警卫连。团长刘兆先，政委李文炯，副团长吕怀忠，政治处主任张献奎。整编中抽出不少干部转到地方上工作，加强了武工队、敌工站、情报站、各县、区大队和基干队的领导。有些则送后方单位或学校工作或学习。精简以后，部队和机关总人数大为减少，但组织精干了，战斗力增强了。

第二次整编（一九四二年底），四、六团合编为晋绥区第八军分区第六支队，直辖四个连。支队长郭庆祥，政委张范，副支队长吕怀忠。五团改编为五支队，直辖五个连。支队长王文理，政委刘耀夫、张献奎。这样就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不仅有助于克服困难，而且适应了斗争的需要。

一九四二年整编后，决死二纵队的番号实际已不存在。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也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同第八军分区合并后撤销了番号。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十一月初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据此，晋绥分局决定派罗贵波任八地委书记兼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此后，晋绥八分区党、政、

军、民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积极地开展了对敌的斗争。从此，八分区的形势日渐好转，岔口、芝兰、草庄头、东社、五元城、金庄、朱化、丰润、利润、赤尖岭、协和堡等一系列敌据点一个个被“挤”掉。甚至连敌人重兵据守的县城周围，如汾阳的协和堡、大营盘、飞机场、火车站、火柴厂，也被我军多次袭击。基本上改变已往的被动局面，根据地又一天天发展壮大。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主席电示晋绥军区，号召各分区也“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高度评价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为准备对日大反攻，开辟豫西根据地，六支队奉命调离八分区，转战豫西；五支队在八分区继续坚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五、六支队都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五支队编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团。六支队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六三团。在解放战争中，五支队转战晋西、晋北和西北五省，参加过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二十四个大战役。曾在宜川战斗中夺得第一功，取得了进军新疆的胜利。六支队转战南北，足迹通及祖国的晋、豫、陕、鄂、川、青、甘、藏、内蒙等省、区（自治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等十八次较大战役。一九六二年又参加过中印边界作战。它们战绩卓著为解放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不朽的功勋。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 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及在汉情况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曾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在这里度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关于中共中央何时正式决定迁汉、中央机关迁汉的经过、以及在汉情况等，目前尚未见到当时的有关会议纪录或完整的专门文件，只能从少数历史文献涉及的有关情况和一部分当时在汉的中央负责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回忆材料中看出一个概貌，有许多具体问题还未搞清楚，需要继续研究探讨。

一、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武汉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面临着工作任务异常繁重，斗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早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即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张国焘九月被任命为中央驻汉代表，十二月又兼任湖北区委书记。九至十二月，中央先后调彭泽湘、项英、

林育南、罗章龙、陆沉、汪泽楷、聂荣臻、李硕勋等充实湖北区委。在此期间，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亦按照中央指示相继抵汉，以加强对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运、农运、上层统战和军校工作的领导。加上原来即在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蔡以忱、许白昊、陈荫林、李求实、吴德峰等，党在武汉的干部阵容颇强，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要求中央机关迁武汉的呼声便渐渐高了起来。因为武汉发生的问题往往牵动全局，其中很多都不是地方党组织所能解决的。中央如迁驻武汉，不仅对当地的一些重大问题能实地指挥，及时作出决策，同时也可以加强对江西、湖南、广东及西北等区域工作的指导。

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一九二六年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就曾有过“中央地址问题”之议。会议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指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并决定将中央迁到北京或广州。陈独秀当时因病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作出的这个决议由于陈独秀不同意而没有执行。北伐战争开始后，陈独秀一度对北伐战争持消极态度，他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因而对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缺乏思想准备。当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陈独秀不顾在汉的部分中央委员提出的中央机关搬来武汉的多次建议，仍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为理由，迟迟不愿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

但是，中央机关迁武汉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实际上已

逐渐地在实行了。据中共中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记载，党的“四大”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九人（即陈、李、蔡、张、项、瞿、彭、谭、李），候补委员五人（即邓、王、罗、张、朱）。其中，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五名中委驻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一九二五年冬，蔡和森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留苏一年多；张国焘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被派往武汉。因此，一九二七年二月底以前在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的中央委员仅有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三人。二月下旬，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瞿秋白奉中央命令离开上海，大约于三月中旬到汉。彭述之到四月一日也离开了上海，在南京作短暂停留后于四月十日抵汉。与此同时，谭平山和蔡和森也在二月分别离莫斯科回国，于四月三日左右由广州经长沙到达武汉。至此，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剩下陈独秀一人，而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张国焘、彭述之、项英、罗章龙、张太雷等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已会集武汉。

四月四日到四月二十日，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湖北区委成员一起连续召开了多次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苏兆征、李立三、贺昌、项英、彭述之、邓中夏以及鲁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等。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四月二十日召开中央全会，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五次大会。同时决定：由中央委员、湖北区委

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致电上海，催请陈独秀速来，并把中央迁到武汉，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代表来武汉开会。这样，中央委员、湖北区委与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事实上已在武汉行使党的最高职权。

从当时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的一个报告中，可以证明武汉联席会议所行使的中央最高职权已为下级党组织所承认。大约在四月十日左右，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国际代表一起分析了形势，讨论了上海的问题，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及维金斯基组成特别委员会去上海。四月十六日，李立三和在沪的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一起召开了特委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并讨论了致电武汉反蒋的问题。四月十八日，罗亦农即在上海区委会议上向全体委员报告了“中央已派特别委员会来沪”的情况，并说到自己已向特委会汇报了上海区委“自二月十九日至现在的策略”。

尽管陈独秀对党中央机关迁汉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但迫于日益险恶的政治形势，并面对大多数中央委员已齐集武汉这一事实，同时又连续接到鲍罗廷及在汉的中央委员们催请他速来武汉的电报，他终于不得不在四月十日左右动身前往武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陈独秀正在赴汉途中。四月十六日或十七日，陈独秀到达武汉，并参加与主持了十八日和二十日的中央会议。

四月中、下旬，候补中央委员王荷波、中央秘书长王

若飞、中央妇委书记杨之华以及李立三、罗亦农等人也均为参加党的“五大”赶到了武汉，仅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留在上海处理善后。至于原在上海的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陈独秀兼主任）、中央宣传部（彭述之兼主任）、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的迁汉时间，有的始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但多在四月左右。

上述情况说明，一九二七年中央机关迁汉，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迁汉的过程，是从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三、四月从各地陆续到达武汉开始，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于四月十六日前后到汉为标志而完成的。至于中央机关各部门从上海迁到武汉的具体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周恩来率军委的一部分同志离沪到汉时才告结束。

二、中共中央机关在汉情况

中共中央正式迁汉后，特别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党的中央机构先后逐步建立和健全，并开始了日常工作。各部门在汉的情况大致如下：

关于中央秘书厅：

当陈独秀离沪赴汉时，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王若飞也在四月十日左右来到武汉，并在汉口四民街六十、六十二号（现胜利街185、187号）建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处。这里是一栋三层楼的红砖洋房，左边是唐生智的公馆。中央秘书厅、宣传部都设在这里，陈独秀常在这里办公和主持中

央会议。

大约在五月中旬，中央常委决定王若飞继续担任中央秘书厅主任。不久，王若飞奉中央常委之命赴上海办理秘书厅的有关事务，后又留在上海负责上海区委宣传部的工作。王若飞走后，常委于五月二十九日决定任卓民暂代其职务，瞿景白、陈昭礼担任记录等工作，黄文容专任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的主要工作是给陈独秀管理文件，做关于党内外活动的备忘录，有时还代表陈独秀去参加当时十分频繁的群众集会活动。原宣传部工作人员羊牧之也于五月左右调往秘书厅，其具体工作是帮助整理文稿，油印、装订、分发送往各省的中央文件。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一九二七年在汉时不住在中央办公处，而是和他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任卓民、黄文容、任淑兰（任管理一般事务性工作）等人住在一起。他在汉的住处很少有人来，中央领导干部也没有什么人来过。这是一栋二楼二底的中国式民房，其具体地址黄文容已回忆不起来，至今尚未搞清楚。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常委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鉴于中央军事部报告三十五军何健将有举事之说，常委讨论结果，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部队。同时决定中央机关暂时移到武昌办公，蔡和森即动身前往武昌布置新机关。陈独秀、张国焘料理常委及秘书厅事务。六月二十九日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在武昌湖上园新机关举行了会议。会后，因解散工人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等问

题，引起了党内思想混乱，部分同志激烈反对中央机关（秘书厅）移于武昌，陈独秀也认为在汉口与汪精卫接触方便，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七月十日前后，陈独秀离开中央，瞿秋白、李立三、鲍罗廷等去了九江。在汉的几位中央负责人面对险恶的政治局势，考虑到武昌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再次决定将中央机关由汉口移于武昌。

中央秘书厅移武昌后，主要工作任务是疏散党员和干部。我党一些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可能筹集了一些款子，秘书厅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左右，中央宣传部主要工作人员黄文容、羊牧之先行到汉。三月，瞿秋白到汉，住在汉口辅义里12号。他以中央宣传部委员的身份负责了一段时间宣传部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未能被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全文刊登，瞿秋白到汉后即将此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交长江书店出版发行，并为推荐这本小册子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四月初，瞿秋白在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沈雁冰谈话时，指出《汉口民国日报》要着重宣传三个内容：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准备。

四月蔡和森来汉后，即主管中央宣传部的全部工作。他住在中宣部机关，着手扩大中宣部机构，准备分设几个

科。据李立三、张国焘及宋侃夫、黄文容等人回忆，彭述之来汉后就不管宣传部了，武汉时期的中宣部长是蔡和森担任的。

五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决定宣传部分科，由尹宽负责宣传科工作。五月二十九日，决定王步文负责出版工作并任《向导》周报编辑。王明在“五大”以后曾任中宣部秘书，后为鼓动科科长。苏联米夫是中宣部的顾问。整个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共有宋侃夫、李德昭（或李昭德）、朱自牧、汪海若等二十余人。黄文容、羊牧之来汉时从上海带来了许多图书资料，在汉建起了图书室。陈伯达曾在这里管理图书资料。据宋侃夫回忆，中央在汉时还有个宣传委员会，曾就湖南农运等问题召开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李富春、郑超麟、沈雁冰、施存统、毛泽东、王明等人，会议由蔡和森主持。

中央宣传部最初在中央办公处办公，即现汉口胜利街185、187号。后来搬家两次，第一次是搬到汉口后城马路（现中山大道）的一个里弄内，此房间是宋侃夫去找的，具体地址尚未查清。第二次是搬到汉口铭新街13号，和中组部在一起，中组部在楼上，中宣部在楼下。尹宽、宋侃夫以及陈乔年夫妇住在这里。

中央宣传部的的主要工作是抓《向导》和《汉口民国日报》。

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党就在武汉设立了长江书店。该书店先设在汉口后城马路血花世界下首，后迁到后城马路济生路口中南旅馆对面的一栋三层楼房（现中山大道831

号),由苏申甫(或苏新甫)负责具体工作。与此同时,党中央又把上海创办的文明印务局的机器全部运到汉口,在福生里内办起了长江印刷所,印刷长江书店的出版物。当时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许多进步书刊,在武汉都交由长江书店出售。《向导》的编辑部设在现中山大道的一个里弄内,稿件编好后,经常是由宋侃夫交给苏申甫,然后转给长江印刷所印刷,再由长江书店出售。从一九二七年元月份开始至七月编辑部被汪精卫查封为止,中央在武汉共出版了21期《向导》,即第181~201期。

《汉口民国日报》创刊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董必武任经理,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先后担任主笔,社址设在汉口歆生路忠信二里四号,即现江汉路泰宁街二号。该报是董必武等人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会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两党部合办的,但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掌握,并受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七·一五”后,报社被迫改组。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谈到党的宣传工作时,曾提到中央计划办党校和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开办中央党校的问题,决定将校址设在武昌,招收学员三百人,半年一期。这以后不久,常委决定以张秋人、任卓民、陈潭秋以及庶务会计一人,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负责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六月二十三日,常委再次讨论了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批准了筹办预算和每月经费,并决定尹宽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拟七月二十日开学。“五大”后,中央决定瞿秋白任党报委

员会书记。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决定沈雁冰到中央准备出版党的日报的工作，随之决定其参加党报委员会。并决定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等组成党报委员会，指定沈雁冰为书记。六月十三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决定催瞿秋白速出版党的日报，同时指定金树成筹备创办“国民通讯社”。七月五日，中央决定日报及通讯社停办，中央党校也因形势的恶变而未能开学。

“五大”后，党中央还在武汉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先是张太雷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任。

中央组织部：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曾由陈独秀主管过一段时期。一九二六年底前后，中央又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但不久又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需要，周恩来即转做军事工作，所以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陈独秀本人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中央机关迁汉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决定张国焘任组织部长，不久又决定张去河南视察和了解情况。六月下旬，李维汉到汉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当时为组织部副部长，原中央农民部的罗严任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先在汉口贯中里内办公，工作人员有洪扬生、朱孔阳等人，洪扬生在党团员登记处负责登记工作。六月，组织部又迁往铭新街13号和中宣部一起办公。

“七·一五”前后，中组部进行了转移疏散党员干部的工作。他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

返回原籍工作的，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还有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学习。据宋侃夫和刘淑琴回忆，宋当时去浙江和刘当时去上海都是由罗严负责分配的。分配宋侃夫的工作时，李维汉还亲自谈了话。

中央军委：

一九二六年九月周恩来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的职务后，于同年底率领一部分军事干部从广州到达上海，健全了中央军委机构，并开展了工作，周恩来任书记。同年八月左右，聂荣臻以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的身份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后，即到北伐军中做联络工作。他向北伐军中的我党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或将问题、情况反映给军委。九月，聂荣臻随北伐军从长沙到汉。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昌时，聂荣臻即随先头部队进城找到了湖北省军委，并在武昌中和里设立了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所，和湖北省军委在一起办公。聂这时还担任了湖北省军委书记的职务。

一九二七年四月，聂荣臻随李立三等去上海。周恩来和聂荣臻同为中共“五大”代表，原准备赶回武汉参加会议，但因事务耽误，五月下旬方赶到武汉，此时“五大”早已闭幕。中央军委所属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于四、五月左右离沪来汉。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常委决定周恩来继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在此前后，常委决定，并组成了七人参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主任。三十日，中央常委决定顾顺

章加入军委，六月二十日又决定张国焘参加中央军事部部务会议。聂荣臻同志的职务为军委参谋长。

军委在汉先分两处办公。一处是在武昌中和里，聂荣臻负责；一处是在汉口友益街尚德里，由周恩来在此主持整个军委的工作。当时，军委设有秘书科、组织科和特务科。王一飞和欧阳钦分别负责秘书科和组织科。特务科科长顾顺章，下属四个股，特务股由李强负责，另有情报股、保卫股、土匪股（专门打击土匪，负责人姓胡）。中央军委事情多而人手少，除周恩来、聂荣臻、李强、王一飞、欧阳钦外，还有贺昌、颜昌颐、唐泽英、虞一鸣、裘古怀、徐以新、陈养山、龚饮冰、蔡飞、王竹樵、陈莲生以及黄埔四期的几个毕业生等共二十余人。

中央军委当时不直接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军委的人员分别到各部队去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作政治工作，培养新的力量。武汉三镇的武装部队是军委工作的重点。当时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士兵和干部。周恩来主要负责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和往军队中分配派遣重要干部的工作。七月，周恩来同贺龙进行了谈话，对贺龙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军委在汉时还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工作。

七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军委会议上传达党中央决定后，即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先赴九江做起义准备。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离汉赴九江，军委大部

分人员也都被派往较为左倾的国民革命军中而离开了武汉。

中央农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就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底前后到汉。“五大”后，中央常委于五月十四日决定由谭平山、毛泽东、周以栗、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罗绮园、阮啸仙、陆沉等九人组成中央农委。中央农委先在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办公，后迁到武昌抚院街慈善会。

中央工委：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在汉口设立汉口办事处，至次年二月正式迁汉办公。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苏兆徵、邓中夏等先后到汉工作。五月三十日，中央常委讨论了中央工人部和工委的人选，决定李立三任中央工人部部长，林育南为秘书，同时决定以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徵、项英、刘少奇、王荷波、许白昊等七人组成中央工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在汉口友益街陈汉卿（旧将军团将军、曾任督军署陆军审判处处长）的住宅内办公，后来迁到华商总会（现武汉市科技情报中心、江汉二路157号）。

中央妇女部：

一九二七年三月瞿秋白到武汉后不久，杨之华也来到武汉，仍为中央妇委书记。五月十四日，中央常委决定陈志筠任中央妇委秘书。

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沪的情况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已决定秘密迁回上海。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大体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唐生智部，因此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为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中共中央又由武昌搬回了汉口。这一时期，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如瞿秋白、李维汉、邓小平等都曾住在汉口德林公寓。周恩来离汉前也住在这里。

中央离汉前曾在武汉设立了联络处，代转中央文件及保持与内地各省之联络。据参加这一工作的羊牧之回忆，此联络处先设在汉口华界原山西人开的一个钱庄的楼上，后又迁到旧血花世界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写到：“中央暂留武汉交通处在南洋大楼左侧永安里十二号，找张启发，来人先须住店再来找，以后再交文件……中央名已改吴世荣，安中原取消。”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紧接着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徵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和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徵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因他已率领南

昌起义军去广东、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仍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期。鉴于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九月底至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往上海。

（陈芳国执笔）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 自武汉迁上海的经过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征集编研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开始酝酿将中央机关迁离武汉。七月下旬，党已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党内有些同志提议将中央机关移到南昌，“以中央直接指挥南昌暴动”。但是，多数同志反对这个意见，他们“以为中央移到南昌必使中央跟着军队跑，结果全国失了领导是非常危险的”。这样，迁南昌之说未能成立。中央的决定是迁到九江然后转赴上海。就在七月，中央即着手准备搬迁事宜，派何叔衡、洪扬生、曾某、张宝泉等人陆续前往上海筹备。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指导下，曾某等于八月上旬在上海已为中央机关寻觅到一所房屋，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曾将寻觅房屋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不过，中央并未马上迁往上海。“八七”会议之前，蔡和森“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八七”会议决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因此，中央

乃“决定暂留武汉指导两湖的秋收暴动”，并通告全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九月十九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又正式讨论了中央驻地的迁移问题。会议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的进展时就去上海，等广东有头绪时再到广东去。九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派戴琨去（上海）布置住房，建立机关。与此同时，中央机关开始了向上海的迁移。

中央决定迁移上海时，“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数不在中央工作。政治局委员九人，有三人不在武汉：王荷波被派往北方担任北方局书记，彭湃在南昌起义军中，向忠发出走长沙。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他们全部不在武汉：邓中夏被派往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张太雷被派往广东任省委书记，彭公达被派往湖南任省委书记，毛泽东此时正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均在南昌起义军中，正南征进入广东。因此，留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六人。由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主持中央工作。

九月二十八日，在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罗亦农等出席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再次讨论了中央机关的迁移问题。会议决定：苏兆征于当天启程去上海；瞿秋白于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动身去上海；李维汉最后走，待任弼时由湖南返回武汉后，由李维汉召集顾顺章、罗亦农、任弼时等开一次会，最后安排中央离开武汉以后的有关事项，再启程赴上海；瞿秋白到达上海之后，同苏兆征、邓中夏等商

定有关工作，然后即赴广东。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央的派出机构——长江局，以解决中央迁走后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指导问题，以罗亦农为书记。苏兆征在出席这次会议后，当天即动身东下。瞿秋白随之亦于九月三十日或十月一日由郑超麟陪同，乘日本客轮秘密赴沪，十月四日或五日到达上海。李维汉于十月二日代表中央出席了长江局第一次会议，并在武汉安排了善后工作，大约在十月八日或九日到达上海。至此，中央机关完成了由武汉到上海的迁移。

在中央机关迁移过程中，早在七月上旬就已离开党中央总书记岗位的陈独秀（当时由秘书黄文容陪同在汉口隐蔽，完全与外界隔绝），根据中央的通知，在一天晚上与黄文容一起由专人带上客轮，包了一间二等舱，扮作病人躺在床上，黄文容装作亲戚照顾他，也顺利地到达了上海。

在中央机关迁移过程中，军委人员负责运输、联络工作，办理购票、送人上船和退掉中央机关在武汉的住房等事宜。当时有一只英国人开的祥泰木行的货轮，来往于上海、武汉之间，由于它为外国人所有，并且是货轮，可以不受检查，船上又有我们的党员，该轮就承担了为我们秘密运输人员（一次只能带少量人）、物资、金钱甚至武器的任务（这一关系被一九三一年叛变的顾顺章供出而遭破坏）。在中央机关全部离开武汉后，军委人员亦陆续撤离。军委的干部王一飞因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湖南省委书记，未赴上海而去长沙。欧阳钦因调任长江局之下设的中央军事

部特派员罗亦农的秘书而留武汉，直到十一月收容南昌起义部队的掉队人员工作结束后，他才撤回上海。

九月三十日，正当中央机关离汉迁沪期间，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潮、汕失利，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取得广东。瞿秋白十月初旬到达上海时，已从当时上海报纸上看到潮、汕被广东国民党军队占领之消息，经过与苏兆征、邓中夏等商酌，都认为不可贸然去广东，乃“决待数天”，等李维汉到达上海以及有了我党自己从广东来的直接消息“然后决行止”。不久，获知可靠消息便决定中央机关留驻上海。

（李婉霞执笔）

福建查田运动的前前后后

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到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一段时间内，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以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为内容的查田运动。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查田运动也毫无例外地在福建各地普遍开展。

在毛泽东领导下，福建的土地革命制订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发展是健康的。可是，到了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中央，改变了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开展了以“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为特征的查田运动，使福建的革命形势受到严重破坏。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所产生的“左”的错误，亲自起草和主持制订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阻挠，文件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查田运动越查越“左”，越查越糟，终于造成整个苏区社会惶惶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使闽西苏区处于严重困难之中，教训是深刻的。

一九二九年春，红四军入闽以后，毛泽东、朱德、陈

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赣南、闽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取得了土地革命初期的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共闽西“一大”和一九三〇年赣南的“二七陂头会议”及六月闽西的“南阳会议”，先后制订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赣南特委，指示土地等革命要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逐步形成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广大群众积极拥护，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六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八十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大大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

但是，这一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受到“左”倾土地政策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三一年二月，王明发表《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一整套“左”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包括“重分富农土地”和“富农分坏田”的主张。三月五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红旗周报》第一期上发表《土地法草案》，全文十四条。主要提出：（1）“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即地主不分田）；（2）“富农在被没有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即富农分坏田）；（3）按照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原则，进行分配；（4）不仅

在苏维埃区域，而且在新夺取的疆土内立即施行。这个土地法草案，为后来左倾路线的土地法定下了政策的基调。

四月，临时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根据地，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和《土地问题决议》，虽然这一次会议不得不承认“过去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的是正确的”，但又决定对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开始贯彻王明“左”倾政策。八月二十一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中央的土地法草案，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应当没收，可以分得一份较坏的土地”。但这个决议案也肯定了在江西、闽西等地的苏维埃区域中，“实行了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之后不久，中央在八月三十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已批评苏区中央局与前委“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等是“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抵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但到十一月十日，临时中央在《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对苏区中央局在《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肯定“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这一点，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十一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即“赣南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批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原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至此，苏区中央局也完全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随后召开了全苏“一大”时所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是王明教条主义者于三月五日发表的《土地法草案》的翻版。

“赣南会议”和全苏“一大”后，“左”倾教条主义者立即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进行“土地检查”。名为土地检查，其实就是查田。“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检查土地工作”抓得很严厉，要求各地“绝对执行”，“不能稍有疏忽和怠工”，否则将受到“法律裁判”。

一九三二年四月，东路军胜利攻克漳州，红十二军又乘胜出击，收复、发展了大片苏区，福建省苏拥有龙岩、永定、上杭、平和、南靖、漳平、宁洋、连城、武平、长汀、宁化、清流、归化等十余县的大部分地区及永安、大田、沙县的部分游击区。六、七月，福建局势空前稳定，出现了全盛的局面。

在这个形势下，七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精神，颁发了《检查土地条例》，宣布在福建苏区开展一个检查土地的运动。福建查田运动的初期，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因此，检查土地工作较为慎重，认真，差错也比较少。经过半年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冬，福建省苏张鼎丞、温必权、范乐春、阙继明（后叛变）、吴兰甫等人前

往瑞金的叶坪，向毛泽东、项英、胡海、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福建检查土地工作的情况。省苏主席张鼎丞说：福建的查田有三种类型的地区。第一种是暴动区：经过暴动的地区，斗争较深入，谁家有钱，谁是地主，谁是富农比较清楚。群众觉悟也较高，斗争性较强，工作较好开展，如古城、四都、新桥、河田、涂坊、南阳、才溪等地；第二种是游击区，所谓“七月红、八月白”的地区；群众斗争不很坚决，有点动摇观望，工作就较棘手，如：红山的腊口、山车、涂坊的河甫，新桥的叶屋岭，古城的南严一带地区；第三种是斗争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濯田地方大、人多、反动头子多、阶级成份复杂，这种地区的工作特别难于开展。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张鼎丞同志汇报后还作了指示，毛泽东强调说查田是查阶级，各个县、区要组织查田工作组搞调查，要组织建立贫农团、雇农工会。

为了指导查田运动的开展，一九三三年初，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指派王观澜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的南山大田屋也搞了查田运动试点。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错误地抹煞了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成就，指出中央苏区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因而决定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查田运动中，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时，“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六月二日，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内容和《训令》基本相同。

接着，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和二十四日至七月一日在瑞金叶坪分别召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福建省参加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会议的代表有：省苏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长阙继明（后叛变）、省苏副主席兼福建军区动员武装部长温必权、土地部长范乐春、保卫局长吴兰甫；长汀县苏主席涂作义、县副主席兼工农检察部长张仁标、土地部长游荣长、保卫局长阙初茂；宁化县苏主席曹寿一，还有吴茂品、张国海、张新华、吴登海、范衍泮。

这次大会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从政治、思想、组织、方法上对查田运动作了动员部署，并通过了《查田运动大会的结论》。当时，还发生了范衍泮反对查田运动的事件。范衍泮是福建宁化县禾口区土地部长（《结论》中误写为黄衍泮）。他在回答什么样的人叫流氓时说，如禾口地方穷，田少人多，山上不长树木，许多人以砍柴、挑担为生，每天要跑到江西边界去砍柴，这些砍柴、挑担的人到处流浪就是流氓，依靠这些流浪的人来搞查田运动，会弄出鬼来。当时会议气氛很紧张，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仅把范衍泮押起来，还有人要求杀掉他，毛泽东不同意，

但是大会认为“范衍泮是完全站在帮助阶级敌人抵抗广大群众查田斗争的立场上，完全污辱苏维埃的职务，建议中央政府撤销范衍泮的禾口区土地部长职。”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一日又召开了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作出了《八县贫农团查田运动大会决议案》。这样，中央苏区一场激烈的查田运动开始了！

但是，此时福建苏区形势有很大变化：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广东的敌人已进至寻邬、安远，福建的敌人盘踞在上杭、连城、清流一带，威胁汀州重地，闽西的局势日趋困难。加上福建省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大肆反“罗明路线”，闽西的领导干部遭到严重的打击摧残。因此，查田运动进展缓慢。

为了使查田运动能迅速掀起高潮，省苏从长汀、兆征、宁化、汀东等县苏挑选积极分子二、三百人，在兆征县东街赖宜伦家举办查田运动检举训练班，由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主持，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讲，主要学习中央的政策法令。学后，分派各地督促开展查田运动。与此同时，长汀、宁化县苏分别开会传达中央八县查田运动大会精神。

会后，宁化县在淮土区田背、大王、凤山等三个乡，七天中查出了土地一千多担。

长汀濯田区经过十九天，查出六十多家地主富农。古城区在三、四天内，查出地主十二家、富农四家、土豪一家、反动富农三家，没收了土地三百多担，山林纸料二百余担。

七月中旬中央派出巡视员到福建的宁化、长汀、汀东

等县视察查田工作。

八月，中央作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对福建的查田运动进展缓慢，成绩不大表示不满。当讲到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领导时，批评福建“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查田训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没有普及到一切地方”，“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

中央政府通知福建省苏政府在八月内召集各县苏执委扩大会及各县乡苏主席大会，中央政府派人参加。要在这两种会上检查各县、各区、各乡查田工作进行的是否适当，领导是否得力。

八月四日召开了福建省苏第四次执委扩大会，接受中央的检查。会议一方面肯定查田运动已经在各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另一方面检查出查田运动仍犯了许多错误缺点，最主要的是：（一）大规模的发动群众不够，只是由上而下或由少数人去进行发动。（二）有些地方仍犯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如古城、新桥、大埔之七里桥等地）。（三）没收出来的土地不迅速解决。（四）尚没有与各部的工作协调一致的进行，如肃反工作、检举工作、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等，仍甚缺乏以查田运动为基础而得到很大的成绩。（五）查田运动进行的成绩仅在各县某些区域（如宁化之城市、禾口、曹坊区有成绩。如汀东仅新桥区，长汀濯田赤（策）田等区有成绩），尚没有在各区乡普遍发动起来。要求福建省苏立刻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缺点，加强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并要求对查田运动在九月十五日以前，以

县为单位进行检查，在省苏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进行大检查。

这样，福建查田运动在中央三令五申并派巡视员检查督促下，八月在各县全面铺开。省苏组织了查田工作组，中央特派员杨岳彬（后叛变）、省苏副主席温必权到宁化，省苏副主席阙继明、土地部长范乐春到长汀指导查田运动。省、县、区也都派出大批工作组下到各区、乡指导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大体分这么几步骤：首先召开各种会议，如代表会、贫农团会、群众会、宣传查田、查阶级。接着，依靠党团员、干部，先摸区干部的成分和表现，后摸乡干部的情况。嗣后，贫农团吸收贫农参加，雇农工会在贫农团里起领导作用，依靠贫农团骨干摸清以下情况：哪户有多少土地？哪里的田租给谁？有无请长工？有多少高利贷剥削？有没有管公堂？查清楚填表报到区苏；区苏批下来后，由贫农团开大会宣布；没收委员会进行没收地主财产，富农罚款；并根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法令，进行土地分配，对罪行轻的地主富农强迫劳动或送往长汀中央第四劳动感化院，罪行重的交县保卫局处理。

福建省经过八、九两个月查田运动，宁化县查出地主、富农五百六十四家，没收土地一万四千五百余担，汀东查出地主、富农二百二十家，没收土地三千一百担，长汀查出地主富农一百八十多家，没收土地二千余担。每户平均被没收的土地，宁化是二十五担半，汀东是十四担半，长汀是十一担。据一九三〇年三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案》规定：“按照该乡人数及田地面积为比例

计算，每人平均分配得实谷六担以上者，照人口分配。”说明中农占有的土地在六担左右，超过六担者平分土地。以一般五口人家为例，就有土地三十担，人口多的还不至此数。而福建查田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平均每户的土地，没有一个县可达此数。宁化县低于此数，汀东县少于此数的一半，而长汀少得出奇，差不多只有此数的三分之一。说明当时的土地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怪不得一九三三年九月发表于《红色中华》的《福建查田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汀州市“有将中农、贫农认作地主、富农没收的，以及没收工人、雇农、红军家属的财产。”这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福建查田运动查出的地主、富农，其中大部分是中农、富裕中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农，甚至雇农。

福建八、九两个月的查田运动，从全局来看，“左”的错误占了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相当严重的侵犯了中农利益，混淆了阶级阵线。

长汀县濯田乡上坊村把做小生意或有点放债的也查为富农，如做过乡主席的王雪峰，因平时炸灯盏糕卖，被划为富农。王在庆因种蔗自榨糖自卖，也被划为富农。结果，这个村的中农、贫农被错划为富农、地主的就有十一家。涂坊慈坑乡有坑村有一户因借了一担谷子给别人，就被认为放债，划为富农。宁化县上曹乡曹球婶因女儿年幼没有劳力，就说她不劳动划为地主。自行规定地主、富农的界限是以耕地多少为标准，但不分自耕还是佃耕，凡耕田三十至五十担的划富农，五十担以上划地主。

因为运动中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非常严重，引起中农

的恐慌，他们担心劳动积极，收成多，生活好过后，又被打成富农、地主，还有不少中农逃到白区。如福建宁化上曹乡溪背村有二十左右户，多数人家有些土地，生活也较富裕，他们害怕查田运动，全村人都跑光。新泉县新泉、芷溪两区逃到北四、五区或白区的群众，就占全区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二、乱抓乱杀地主富农，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

在八、九月查田运动中，凡是被划上地主、富农的，就把人抓起来，没收其家产，轻则强迫劳动或押往长汀劳动感化院，重则杀掉。地主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对象，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人身。“左”倾政策使查田运动一再升级，越搞越左，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结果许多地主、富农被逼上绝路，有的做乞丐，有的上山为匪，投靠敌人反对我们，给根据地带来损失和危害。

三、运动不走群众路线，而是搞神秘化、简单化，必然会搞错。

不少地方查田运动没有开展宣传发动，群众也不明确怎样划分地主、富农。查阶级时，有的事先没有经过调查摸底，只有召开贫农团大会，当场提名一个，举手表决一个，也不经上级批准手续，立即进行捕人、抄家，没收财产。如兆征县大埔乡。有的只凭个别干部秘密开会决定，然后交贫农团大会通过，就算确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如新泉县陂坑口、长汀县濯田。有的地方查田运动简单草

率，如兆征县古城区苏，要求古城乡苏三天内完成查田任务。《红色中华》登载的《福建查田的经验与教训》一文，承认了查田运动不走群众路线的事实：说：“除宁化的淮土、南城及长汀的濯田区、大埔区等外，一般的都没有依靠群众经过群众来进行查田查阶级的斗争。有的仅经过党支部会通过没收；有的由政府用命令的方式执行（汀州及宁化某某乡），更有仅由土地部长或主席个人去封房子没收家产的（汀州及古城），至于没收和分配的方法有的由政府直接没收，不分给群众而拿来拍卖（如才溪），有的没收以后由查田委员会自己分得了（如长汀）。”

四、大搞“唯成份论”，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建设。

在所谓“对内查阶级异己分子，对外查地主、富农”的“左”倾政策下，不仅在各级机关，而且在红军部队也开展了“查阶级运动”。但是，“当时的查阶级运动，实际上是大搞‘唯成份论’，甚至对于当了几年红军的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也不问表现如何，政治坚定与否，都开除了军籍，这是错误的。”如“温晴波同志是上杭县政府的秘书长，因他是地主出身，他的家被查了三、四次，什么都查光，还把他母亲抓起来。”（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汀东县新桥乡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彭立中，原是汀东县苏秘书。他父亲被国民党马贤康杀害，房屋被烧毁，查田运动中说他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欲把他杀掉。幸好张鼎丞同志来到新桥，经他释放并调去省里工作。有许多参加机关、部队工作者，家庭被查田划为地

主、富农后，机关、部队也不管其错与不错，本人是分子还是子女，把他们统统当作不纯分子清洗回家。如长汀濯田乡王鸿盛原为中农，四个儿子三个参加红军，一个在濯田区委工作叫王金兴，家庭成份划上地主后，三个儿子从部队清洗回家，王金兴上吊自尽。当时从部队、地方清除的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各地都有，相当普遍。如果谁为这些人说话，就会被指责为阶级妥协分子，而受到严肃处理，所以，大家只好不说为佳。

一九三三年十月，福建的查田运动实行复查纠偏。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查田运动问题出现很多，搞不下去了，又请毛泽东来扭转局面。为了使各地分清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等阶级成份的界限，纠正七、八、九三个月以来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的极“左”错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由毛泽东撰写和主持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重要文件，并宣布“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于是，福建省苏又开了一次查田运动总结会，检查纠正一些地方过“左”的问题。会后，各地进行了一次复查，纠正了一批被错划的成份，如：

1. 把中农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地主的纠正过来。如宁化禾口乡张邦万、张启徐两户中农，因土地较多，生活较好，查为富农。复查时按人口算，平均土地不算多，又都是自耕，改正为中农。还有四、五户过去祖上土地很

多，破产后土地卖掉了，运动中划上“破产地主”，复查纠正为其他成份。兆征县古城元坑乡马角寨邱元亮是一位教书先生，游击队的接头户，全家六口，有田三十多担，四个劳力自耕，其兄和侄原来分开吃饭，后来合为一家。运动中被认为邱元亮雇工剥削其兄、侄的劳力，被划为富农，复查纠正为中农。

2. 把轻微放点债、收点租、雇点工，主要靠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生活而被错划为富农的纠正过来。如古城王凤林会篾纸做生意，自家无田地，六口人，租种十二担田，因其母放过一点高利贷，便划为富农。王不服，古城离瑞金又很近，他跑到瑞金上诉中央工农检察部，经批准纠正为贫农。另一户胡十二妹，全家六口，无田地。胡的丈夫做木匠，大儿开油盐店，两个媳妇砍柴做家务，也因胡十二妹放过高利贷，被划为富农。她向中央上诉后，纠正为中农。汀东县馆前康宏年一家三口，仅十担田左右，平日勤俭节约，生活较好过，被划为富农，复查纠正为中农。长汀县河田卢竹乡有将亲戚帮工当做雇工，如范昭汉九人吃饭，五人劳动，没放债，只大忙雇过临工，也划为富农。纠偏后仍保持其中农成份。

3. 把因姓氏房族斗争而借机报复，以泄私愤被错划的成份纠正过来。如福建省白区工作部江兴本，在家乡新桥探亲时，对当地干部提了一点意见，他说：“查田工作要查得认真一点。”因此得罪了当地干部，要划他为富农。但他家总共不到二十担田，划不上就将他堂叔的七担田划为他的，故被划为富农并停止工作。复查纠正为中农后，调

二十四团任政治处主任。汀东县新桥乡李应生给李家当长工，后被招郎入赘继承李家业，有田二十五、六担，四、五口人吃饭，全部自耕自种外，还蒸酒卖。乡苏干部向他赊了酒吃，一二年不还。因李应生向他要酒钱，将他打成地主，人抓走，家产全没收，复查纠偏改为中农。

但复查纠偏还没有一个月，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以后，查田运动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把复查纠偏作为右倾的表现，强调“更普遍地开展查田斗争，特别要深入落实区的查田工作。”于是，省苏副主席阙继明率领一工作组进驻武平，各地查田运动的所谓落后区又普遍开展起来。至十月底，在宁化、长汀查出地主富农九百多家，没收土地二万一千三百余担，在汀东、上杭、兆征等县共查出地主富农四百余家，没收土地九千多担。

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四月闽赣省开展突击运动，经过五十天，查出地主五十余家，富农六十余家，查出田二千三百余担。

建宁在战争环境中开展了查田突击运动，在建宁县城、巧洋、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建宁城市还有一个工人被打成土豪的。

一九三四年五、六月以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险恶，各地全力以赴搞扩大红军、支前运输等工作，查田运动无法进行。十月，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一场错综复杂的查田运动至此不了了之。

回顾过去这段历史的时候，张鼎丞同志在他的《中国

共产党创建闽西根据地》著作中指出：“那时候，由于错误地进行肃反和‘查田查阶级运动’，造成了党、政、军、民的离心离德，使闽西处于严重的困难中。我们对于这些痛苦的教训，应该好好地总结，切实引以为戒！”

（康模生执笔）

拉法、新站战斗有关简况

中共吉林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吉林蛟河县委党史办公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派兵进攻解放区，遭到了解放区军民沉重的打击。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被迫同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並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机构。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下达之后，更加紧了大规模的内战准备。美帝国主义则以“调处”为掩护大力扶植蒋介石集团，並企图软化我们党和欺骗中国人民。当时在关内，蒋军向解放区蚕食、进攻不断发生。在关外，蒋介石大量增兵，抢占东北要地，不承认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国共双方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协议》，随即就被国民党破坏了。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又达成在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就在当天，国民党军队进占了我战略要地吉林蛟河县北的拉法、新站。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东北军民同美、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至十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师和二师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以下简称东总）之命，全歼进

占拉法、新站的蒋军一千九百人，收复了战略要地。我方代表在与美蒋代表就谁破坏停战协定问题进行的四个半月的谈判中，挫败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我们在军事、政治斗争上都取得了胜利，并且赢得了补充、整训部队时间。

一、拉法、新站战斗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战略撤退。五月二十三日，蒋军进占长春。当日，蒋介石飞抵沈阳，亲自策划蒋军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五月二十八日，蒋军进占吉林市。由于吉林市东面的拉法地处铁路公路交叉点上，战略地位重要，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拉法非常重要，必须派兵一团固守。”五月三十日蒋介石又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召见廖耀湘，又一次指示廖耀湘：“拉法为战略要点，必须以一个加强团固守。”廖耀湘即命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和二六四团一个营于六月六日进占拉法、新站。

早在六月五日，我东北民主联军一、二师即到达蛟河、奶子山一带待命。六月六日，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先后两次向东总请战建议消灭拉法、新站孤立之敌。

东总为了保住战略要地，阻止蒋军继续北犯，于六月六日二十二时电东满军区和一、二师首长：“国民党已下令明日起停战十天（按：应为十五天），望你们坚决设法保持拉法，拒敌于拉法以西。”蒋军违反东北暂时停战命令，

于“七日午后起，永吉以东拉法方面，国民党军向拉法东南蛟河县城进攻，并以飞机猛炸蛟河、敦化等地”。为惩戒违约向我进犯之敌，东总于六月七日电令一师：“坚决消灭拉法、新站之敌，一、二师由梁、梁指挥。”

七日晚我军以两个团的兵力歼敌二六四团一个营，收复拉法。八日晚，我军集中四个团的兵力乘胜围歼新站之敌，经两夜激战，至十日晨全歼敌二六三团。

十一日，东总在电报中表扬一师和二师，拉法、新站战斗“打得好”。

二、战后谈判斗争

拉法、新站战斗期间，驻沈阳谈判二十七执行小组蒋方代表就拉法事件在三日之内（六月七、九、十日）提出四次备忘录，要求小组开三次会，指责我方有意破坏停战命令。

蒋介石得知拉法蒋军被我全歼后，复电杜聿明：“这是共军破坏停战，破坏和平”，并要杜向沈阳三人小组提出交涉。

六月十一日上午，北京军调执行部开会，蒋方代表声称：杜聿明特正式通知，十日开始（国军）将大规模追击进攻，并以中断会议进行恫吓。

六月十二日，杜聿明飞抵长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污蔑我军破坏停战命令，正集中二万余人，向拉法国军进攻。

六月十三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声明中指出，东北停战命令下达后，拉法蒋军继续向蛟河进攻，我军是被迫还击，以揭露蒋军破坏停战协定。

六月十四日，中共发言人就目前时局在南京发表谈话，指出：“休战至第五日（十一日），中央社报道杜聿明将军又公开限我军于十二日午十二时退出拉法，否则将破约采取行动，这些显然不是休战以求和平，而系争取时间……等待增援以谋再战。”

战斗结束后不久，由美、蒋、我三方协商同意就拉法战斗谁开第一枪，谁破坏停战协定进行调查谈判。

第一阶段：美蒋代表的所谓调查。

拉法战斗后一周左右，我东满军区委派二师政委刘兴元、一师政委梁必业为代表，负责接待美、蒋代表进行调查。美、蒋代表妄图通过调查，抓到指责我破坏停战命令的证据。我方则利用美、蒋的调查时机，召开群众会，由蛟河县长周化南控诉蒋军进犯蛟河的罪行。蛟河当地群众捡来带有“USA”字母炮弹皮证实说，这是七日下午蒋军继续向蛟河进犯时打的炮弹，美蒋代表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正值美、蒋代表于蛟河调查时，美制蒋机到蛟河上空扫射轰炸，美蒋代表吓得钻进防空洞。我方代表据此指出，破坏停战的，不是我方，而是蒋方。

第二阶段：三十三小组谈判。

美、蒋不顾第一段调查的失败，仍要求以拉法事件进行谈判。经我同意，于七月初成立三十三谈判小组，谈判地址在我占领区的新站镇铁路医院。

中共中央东北局委派七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为我方上校首席代表，东满军区政治部孔石泉为中校副代表，何锡麟为翻译，严佐民、吴侏、徐英才为副官。

美方先后更换四次首席代表。第一个是德莱克中校，时间不长就换了；第二个是李萍客中校，与我们磨的时间最长，第三个是詹逊，时间很短；第四个是威尔逊。

蒋方代表一直是蔡文献中校，美国代表讲什么，他听什么，是个典型的奴才。

谈判小组始终围绕拉法、新站战斗谁开第一枪问题争论不休，十一月中旬蒋军在南满向我丹东地区大举进攻，我方提出抗议，终止谈判。美、蒋想以拉法战斗指责我们破坏停战协定的企图未能得逞，谈判不了了之。

我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在四个半月的谈判时间里，我一、二师主力部队转入后方补充、整训，参与剿匪，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为以后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打下了基础。

三、群众的积极支援

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是与蛟河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拉法、新站战斗前，蛟河县、区政府就组织群众筹粮筹草供给部队。新站区委为了配合我军阻止敌人进犯，在五月下旬就派区中队长刘德利带领民工扒毁了老爷岭至新站南三角线处的铁路，起到了迟滞敌人进攻的作用。

拉法、新站战斗进行期间，蛟河县委、县政府已转移。我军民运干部直接深入蛟河地区发动群众筹粮、筹草，组织大车运送给养。仅此次战斗，蛟河人民就为部队提供近百万斤粮食，并且组织了担架队，抢救伤员。仅蛟河镇二街一个居民组就出了十二名担架队员，他们跟部队上火线，把负伤的干部、战士抬到蛟河镇内的野战医院。

我军围攻新站时，保安屯的积极分子组织本屯妇女日夜为部队磨面做饭，并且还亲自带领群众给在南山上的战斗部队送水。

六月十日，战斗胜利结束后，新站区委书记渠刚生组织区干部配合部队到群众家借棺木，安葬了烈士遗体。

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使我军保持了战略要地，保障了拉滨线、拉图线铁路畅通无阻。同时，使东满、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有利于东满、北满根据地的建设，保障了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的贯彻执行。

我军全歼拉法、新站之敌，给蒋介石当头一棒，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迫使蒋军停滞在老爷岭以西、松花江以南地带，不敢再分散兵力，孤军深入，冒然北进。

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打消了我军中部分干部、战士一度存在的悲观消极情绪，鼓舞了他们勇敢杀敌的斗志。在拉法、新站战斗中，民主联军以劣势装备战胜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事实，扫除了一些人对国民党的迷信。

通过围绕谁破坏停战协定问题的谈判，揭露了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破除了一些群众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英雄的红军第三十四师

朱 光 梅

红三十四师的前身，原为福建的红军地方部队。经过两次比较大的变动，才整编成为红三十四师。

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底，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持，在上杭县石圳潭一带，将三个红军地方独立师（即七、八、九师），加赣东北的一个独立团，整编为三个野战师（即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师）。

第二次，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由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震林主持，在上杭旧县一带，又将福建军区的三个野战师（即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师）整编为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第一任师长为周子昆，政治委员谭震林兼，下辖三个步兵团，即一〇〇团（团长韩伟、政委范世英）、一〇一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一〇二团（团长吕贯英、政委程翠林）。每个团编有三个营，每个营编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每个连都是一百三、四十人。

全师共有四千余人。干部来源，当时除了少数是从红四军调来的，大都是福建地方土生土长的。战士来源，全

是闽西和赣南的翻身农民。他们都经过土地革命，战斗意志旺盛，有较好的战斗作风，加上地理条件熟悉，能攻善守，敢于同敌人拚刺刀，打近战、夜战和肉搏战，成为当时工农红军中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一)

红三十四师一产生，就和兄弟部队一道驰骋在闽西革命的战场上，隶属林彪，聂荣臻为首的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先后参加了攻打龙岩、漳州等一系列的著名战斗。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以彭德怀、滕代运为首的红三军团和福建军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打击敌人卢兴邦。红三十四师奉命增援，并归属三军团指挥。当时敌人卢兴邦所属旅长张兴隆率其部三〇团于七月九日由清流增援宁化泉上的敌人，红三十四师立即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切断清流与泉上两地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安乐、雾阁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红四师、红十九师围攻朋口和莒溪，红三十四师和红五师担任牵制侧翼和打援任务。经过几天的战斗，红四师、红十九师将朋口和莒溪的守敌全部歼灭。红三十四师在连城北面的山下，向敌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个团阵地连续发起进攻，经过两天多的战斗，歼灭守敌大部，占领了敌人整个阵地。

一九三三年八月，红三十四师同红四师、红五师、红十九师在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连城守敌十九路军区寿年七十八师慑服东方军的军威，弃城逃跑。红三十四师

与红四师、红十九师乘胜追击该敌，敌狼狈逃入永安城。于是红三十四师与兄弟部队配合在小陶一带，歼灭七十八师一个团。驻守新家一线的敌十九路军六十一师见势不妙，立即缩回龙岩。至此，这一战斗共歼灭敌人七十八师一个旅三个团。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红九军团成立，辖三师和三十四师。不久，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红三十四师又奉命归七军团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红三十四师和红十九师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三军团作战。二十五日凌晨，红军向沙县城发起总攻，城墙被炸破，红军攻占该城。同时，七军团乘胜攻占尤溪县城，缴获卢兴邦的兵工厂。此时，发现敌人有两个纵队的兵力向我建宁、泰宁方面运动，红四师赶往泰宁，配合一·九军团阻击南进之敌，红五师撤回归化待命，仅留红三十四师和红十九师驻守沙县县城。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三十四师奉命开往宁化、清流、归化一带消灭土匪、民团、大刀会、打土豪筹集粮款，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不久，红三十四师又奉命北上，途经闽北的邵武、光泽和江西的资溪、金溪，到达南昌东南边的浒湾地区参加作战。

战前，公布了红三十四师新领导成员的命令：彭绍辉接周子昆任师长，程翠林任政委，袁良惠为参谋长，朱良才为政治部主任。一〇〇团团团长韩伟，政委张力雄；一〇一团团长陈树湘，政委杨一实；一〇二团团团长吕贯英，政

委范世英。全师干部，除少数来自红四军以外，大部分是从红军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和福建土生土长的。此时，红三十四师已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此次北上，主要是奉命增援作战的。由于守敌顽强，敌增援部队又赶到，战斗相持了数天，未能攻克浒湾，我军主动撤退。撤退时，红三十四师奉命归五军团指挥，掩护一、五军团转移，阻击敌人前进。

一九三四年三月初，红三十四师随着红五军团在黎川城以南的团村一带进行设防，阻击敌汤恩伯纵队向南的进攻。由于敌人吸取了过去“围剿”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法，在战术上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政策，每前进占领一地，便修筑碉堡工事再继续向我发起进攻。红军在错误路线指挥下，在战术上采取阵地战、正规战，抛弃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以堡垒对堡垒，以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等作战方式，结果，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红三十四师在团村这一仗，坚守阵地作战六、七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由于敌人兵力不断加强，我军主力撤出阵地，奉命到达福建泰宁的新桥。此时，除一〇〇团三营驻德胜关担任监视团村方向敌人的新进攻外，师部和一〇〇团一、二营驻新桥，一〇一团和一〇二团分别驻朱口、龙湖、上青一带。部队到达各自的驻地后，由于敌人占领团村后，在加紧修筑工事，没有立即发起进攻。红三十四师进行了休整。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广昌失守，红三十四师奉命坚

守泰宁。战斗打响前，上级又任命了新的领导成员：师长由一〇一团团长陈树湘接任。参谋长为王光道，政治部主任为刘英，各团主要干部，除一〇一团团长由杨海如接任外，其它无变化。接着，红三十四师在城关周围山头的阵地上，修筑了许多碉堡和掩体工事，主要阵地前沿还架设了路柴、竹杆、地雷等障碍物，各阵地之间挖有交通壕。进攻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主力汤恩伯部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战斗打得很激烈。红三十四师虽给敌以重创，终因敌强我弱，撤出泰宁城。

一九三四年五月初，红三十四师奉命在梅口（即泰宁与建宁之间）地区设防，阻击敌向建宁进攻。不久，敌向梅口发动进攻，红三十四师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坚守数日。从梅口撤出战斗后，红三十四师奉调江西，先后参加了高虎脑、驿前的战斗。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在保卫兴国的口号下，红三十四师开赴兴国以北的高兴圩参加阻击敌周浑元纵队的战斗。这是红三十四师在中央苏区参加的最后一仗，由于形势日趋恶化，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和艰苦。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红三十四师奉命撤至兴国县城以南二十里处设防，不久遵照军委指示，随五军团接替一军团的任务，继续阻击向南推进的敌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红三十四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秘密向于都开进，并在鲤鱼坝设防，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主力军团从瑞金、兴国向集结地域——于都开进。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突破蒋介石的围剿，争取新的胜利，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特别要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两个庞大的机关纵队殿后。红三十四师奉命作为五军团的后卫师，担任掩护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当左翼一、九军团首战韩坊、新田，右翼三、八军团进攻百石、古陂，红三十四师随五军团为牵制南路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于王母渡、新田间渡过信丰河（桃江），与余汉谋部展开激战。这样，突破敌从赣州、信丰至安远间的第一道封锁线的突围战斗就全面展开。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红三、一军团攻占古陂、安息，八万几千红军胜利前进。红三十四师紧紧跟随中央纵队和五军团的后面，阻击尾追的粤军第一军，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通过信丰河，进大坪，过梅关，向大余开进。

当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得知大为震惊，急令湘、粤两省军阀堵截追剿。何键的湘军主力六十二师陶广部赶到汝城布防，地方反动武装胡凤璋等也分兵把汝城县境各要地与关口，遍筑碉堡二百余处。广东军阀也把李汉魂的独立第三师，李振球的第一师，叶肇的第二师和范德呈的独立第一旅集中在粤北一带。并以继夜办理保甲，实行坚壁清野。妄图通过设置第二道封锁线，把红军堵截在城口至汝城、桂东一线之间。红军在敌人追击、堵截情况下，继续西进，红三十四师只好仍然“拿棍打狗，

边打边走”。

红军主力分三路向汝城、仁化推进。当中央机关和主力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和仁化城口之间一通过，粤敌叶肇师和陈章族分别从南雄、吉村驰赴仁化、长江口，向城口挺进；湘敌亦从北向南压来，妄图截断中路的中央军委机关纵队，以及五军团部队通路，红三十四师立即从南北两面展开，猛烈袭击粤湘两敌，掩护机关和部队向延寿、文明司前进，接着红三十四师在汝城县西南的延寿、岭秀、靶子场、珊瑚岗一带，同五军团第十三师阻击追敌，与湘敌六十二师、粤敌一师激战，歼敌大部，然后主动撤出延寿向宜章前进。

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红军继续分兵三路西进。红三十四师随五军团之后，在延寿、岭秀一带继续阻击湘、粤敌主力六个师和胡凤璋地方武装的追击。十三日也撤离延寿，经文明司向宜章前进。

十一月十八日，红军从宁远、兰山分兵两路：一路出道县，一路出江华。一军团的先头部队从临武出发，急行军，迅速抢占了道县城。在此，敌周浑元的四个师追了上来，在宁远和道县边界的天堂圩、柑子园附近，被红三十四师和红一师坚决顶住，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三十四师凭借地形，节节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于二十五日在道县、江华间渡过潇水。

红军主力渡过潇水，红三十四师在道县城南设防，拆除浮桥，隐蔽船只，迟滞敌军行动。但敌军从潇水上游白马渡抢劫民船和砍树制作木筏，渡过了潇水。红三十四师

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纵队西进，他们在道县城南与敌激战。

红军渡过潇水，彻底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探明红军的意图，是要过湘江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于是又调集四十万大军在湘江沿岸三百里长的地段，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天险，堵击与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

当红军主力军团进至湘桂边境时，已深感局势的严峻。要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势必要有一场恶战。中革军委在战斗部署上，仍然选中红三十四师担任全军的总后卫，走在最后头，负责阻击敌人。

但红军抓住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红军入桂的心理，乘虚进入桂境，并控制了文市、石塘南北高地，钳制了桂军、湘军的行动，掩护主力和中央机关沿永安关、文市、石塘圩、麻子渡一线向湘江边前进。

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空中几十架飞机轮番侦察，轰炸，由于中央机关前进速度十分缓慢，追敌分多路扑了上来，红三十四师担负的掩护任务也更加艰巨。

这时，红三十四师与尾追之敌李云杰、李温珩部及地方保安旅团频频接火，边战边前进。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经蒋家岭、雷口关进入灌阳县，在水车一带布防阻击追敌。此时，在南有桂敌夏威的部队推，东有两李的部队追，北有薛岳、周浑元，罗卓英、王均等中央军几路纵队挤压的情况下，英勇的红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紧紧地从三面顶住敌人，用他们的血和肉筑起一道道城墙，拦截、堵

击数万敌人的追兵，为一、三主力军团在前面开江劈路，为中央和中革军委两个机关纵队赢得充裕的渡江时间。他们从水车到文市一线，与大于自己十几倍的敌人，鏖战了四天五夜，虽然伤亡惨重，但坚持到最后，保障红军第八军团顺利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才结束了他们在长征路上、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的掩护任务。

(三)

完成掩护红军渡过湘江任务后，红三十四师立即转入为自己过江的准备工作。他们开始收缩部队，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疏散安置受伤的战友。接着在水车的江边迅速驾好了浮桥。当部队刚开始西渡湘江时，就遭到天上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上的敌人重重围攻，浮桥被炸毁了，千余人的队伍又伤亡近二百。红三十四师将敌击退后，稍加整顿，便突出重围，沿湘江东岸北去，经燕头、大塘、苗源，到达全州南边的洪水青，午夜在椅子坪宿营。

十二月一日下午，红军主要渡江点——界首已为桂军占领。其它徙涉点——凤凰嘴等，亦落于敌手。至此，在北起东安、南至兴安的湘江沿岸的渡口全被敌人封锁。敌东岸有四个师，西岸有两个师。这一天，红三十四师翻过海拔一千九百米高的宝盖山，到达全州的箭杆青宿营。二日，从箭杆青出发，经安和出凤凰，试图再在湘江边上的凤凰嘴徙涉渡江，又遭桂敌四十三师、四十四师的猛烈阻击。虽经一场殊死战斗，牺牲惨重，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都在战斗中阵亡，也未能徙涉成功。此时，全师所

剩数百人枪又被湘江东岸的敌人冲散。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等领导，带领师部机关和直属分队三百余人，又向东折反回全州，灌阳之间的岭脚暂避。

在此艰苦的转战中，红三十四师余部上下十分疲惫、饥饿，但又常与湘、桂两省的保安旅和民团等地方武装频频遭遇接火，人枪不断减少。十二月三日，在罗塘和梓木塘遭民团唐炳煌部的袭击，五日在洪水青又遭伍明烈、易生玉等部的袭击，战斗又是一整天，伤亡一批久经战火磨炼的干部和战士，直到黄昏才借夜色分别突围，到达龙母霸集中。但此地无大山，不便久留与休整。如何行动？经发电请示军委，回电要红三十四师退回到群众基础好的湘南。于是，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当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时，桂敌四十三师一部向我发起了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红三十四师余部集中兵力，进行了一次猛烈反击。敌人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急忙后撤，这次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信心，但毕竟是孤军作战，陈树湘师长当即命令：“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时机。”

这时，已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红三十四师已不足七百人枪。陈师长宣布决定兵分二路突围，向湘南前进。一路系师直分队和一〇一团、一〇二团余部，共约四百人，在陈师长和王参谋长率领从江塘经永安关进入湘南道县的大岩村；一路系一〇〇团余部，大约三百人，在团长韩伟、二营长侯德奎指挥下，掩护师部突围，然后

从八工田、柳木青方向走，到大江源时又遭地方民团武装的袭击。经一场恶战，全团仅剩三十多人，后失散。九日，师长陈树湘、参谋长王光道带领的一路，经德里大营到达道县的空树岩。后部队又进至永明（今江永）的大溪源。敌何键成铁侠部及道县保安团立即尾追而来。红三十四师一部且战且退，退至刘家庄。接着在上木岭、大宝腹又与敌接火，连夜进至上江圩。第二天，红三十四师余部又抵达桥头铺，在马山附近潇水西岸，抢渡牯子江。当木船渡至江心时，两岸突然枪声大作，中了敌人江华民团的埋伏，部队伤亡惨重。师长陈树湘也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受了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师长，由永明的界牌再进入道县。敌人闻讯后，又尾追了上来。

红三十四师余部一百多人，又继续前进了。当部队到达驷马桥时，左侧又突然响起了枪声，一股地方反动武装道县义勇总队扑了过来。参谋长王光道立即指挥部队边打边走，在到达清水塘时，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这时，陈师长立即对指战员作出指示：敌人还会反扑的，可能会出现种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大家要各自为战，冲出去，到前面的牛栏洞山区汇合。果然，刚布置完毕，敌江华、宁远、道县三个保安团蜂拥而至，红军战士且战且走，几个抬担架的，奔跑行走很不方便，也不安全，师长见此情景，再三挣扎着要下来，战士们说什么也不同意。当部队退到富竹湾时，路边馒头岭上又突然响起了枪声，是另一股地方反动武装向红军进行阻击。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严重。陈师长当机立断，命令一个班抢占馒头岭

对面山头打掩护，其余指战员迅速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突围中，陈师长不幸被俘，在押往县城途中，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的年轻、宝贵的生命。

陈师长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还有一百多人，由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于十二月十四日进入宁远县香花铺的小南海和汪井一带。当夜与敌人遭遇。在战斗中，红三十四师余部又牺牲了十多个战士。

据一〇二团三营司号员龙良清回忆，从此，红三十四师只剩九十四人，在杨团长率领下，游击在宁远和兰山、嘉禾三角地带的丛山峻岭中，后由天宫山出临武，以图过郴州与游击在湘粤赣边的红军独立五团李宗保部会合，但沿途遭到敌保安旅团和义勇队的截击，又返回宁远、兰山，上了九嶷山。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三十四师余部重入道县，在插花坪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惩办土豪劣绅，不久，又有几十名瑶族、汉族贫苦农民参加红军。之后，这支红军队伍又东出兰山、临武，又多次遭到保安团队清剿。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未能实现突围过郴（县）宜（章）公路。只好再次返回九嶷山。

一九三六年春，红三十四师余部再次下山西进。当进入到道县插花坪时，遭到敌主力成铁侠部及敌道县保安团唐季候的突然袭击，部队牺牲惨重，大队长陈天一等十二位领导被俘，虽经严刑拷打，他们至死不屈，最后被杀害

于道县铁骨岗。余部东返，又遭到敌成铁侠、欧冠等主力
和道县、宁远、兰山三县保安团的多次围捕与清剿。这年
冬天，他们被围困于九嶷山里，经过几天激战，终因孤军无
援、粮尽弹绝，大部壮烈牺牲。个别幸存者，在群众的掩
护下，三五成群集合在一起，潜往湘粤和湘赣边寻找部队，
后又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了。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记事

傅国祯 周宏雁

前 言

一、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向国民党军连续实施的大规模的歼灭战。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二天，消灭国民党军两个“剿匪”总部，“剿总”两个指挥所，十二个兵团部，一个绥区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四十六个军部、一百四十一个师(旅)，连同特种部队及非正规军，总计一百五十四万五千人，其中起义，投诚及和平改编四十余万人。解放军共伤亡二十三万八千人。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丧失殆尽，从军事上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陷入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从而为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关于军事历史题材电影的谈话》中说：“三大战役本身并不是

孤立的三个战役，而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适时抓住有利时机，决定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而有计划、分步骤地连续实施的三个战役。从事物的发展上看，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把三大战役的内在的联系写出来，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战略思想和运筹帷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宏大气魄。我们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在当时是国内外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三大战役则是其集中的体现。”“是非常值得书写的”。本记事，就是依照胡总书记的谈话精神写的。本记事的基本思想，是围绕并通过记述战役方针、战役部署、政治工作、瓦解敌军、人民支前、作战结果以及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来反映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战思想和指挥艺术。

三、为了充分体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决战思想和指挥艺术，本记事在时间上作了适当的延伸。为了体现三大战役的内在联系，本记事在内容上在以我军为主、作战为主的前提下，还选用了若干有关联的条目。为了便于阅读，本记事在体例上，将每件事的始末尽量一次汇述完整。

一九四八年

二 月

七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主

席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就东北冬季攻势结束后下一步作战问题指出：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处之敌、应依当时情况来决定。但是，东北我军应作好对付敌军由东北撤向华北的准备，“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明确提出了就地歼灭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目标。

上旬 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调整部署：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继续在中原战场作战；第一、第四、第六纵队集中休整，准备执行进军长江以南的新任务。

三 月

上旬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打击之下，东北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决心坚守东北。蒋介石在一日会见张作相、万福麟等东北有影响的人士时说：“中央对东北有决心，有办法，即将派大军出关，并即恢复交通。”同一天，国防部长白崇禧说：“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九日，蒋介石又声称，“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决心。”

十三日 东北解放军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发动的冬季攻势，至三月十三日结束，共歼敌十五万六千余人，将敌军卫立煌集团的五十五万人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为尔后全歼东北敌军创造了极有利的形势。

十四日 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各一部联合发起的洛阳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中原重镇洛阳，全歼守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二万余人。

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说：“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月消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师）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师）左右。”

四 月

九日 蒋介石在伪“国大”第四次会议作施政报告，说：“我们只要守住了沈阳、长春、锦州几个重要的据点，就必能保障东北永久是我们国家的领土，这几个据点是必须固守而且必能固守的。”

十八日 中共东北中央局常委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党中央、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方针问题提出先打长春，然后南下作战的建议。并计划在建议中说，我军打长春时如沈阳之敌不增援；力争在十天或半个月內拿下长春；若出援，我军主力则在四平附近先消灭援敌，然后夺取长春。

二十二日 中央军委复电东北局常委：“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并着重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五 月

五日 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暂缓执行渡江南进的战略任务。决定该部队在四个月至八个月内，继续在江北作战、在开封、徐州或其南北地区以歼灭国民党第五军为目标。

九日 为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中央决定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谢富治、张际春、刘子久等十二人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书记。同时决定恢复中原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在陈毅参加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后，中央决定由粟裕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

十四日 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按：即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的，由粟裕、叶飞率领，准备执行渡江南进任务的兵团，以后该兵团撤销）团以上干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用钓大鱼的办法”，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第七师，和“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等等”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

中旬 蒋介石调整作战指挥机构。十三日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十九日决定撤销各地

行辕，将东北、北平两行辕的职权与业务分别归并东北、华北“剿总”司令部，将西北、重庆、广州行辕改为绥靖公署。三十一日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原部长白崇禧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六 月

五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目前就正式攻击长春，但成功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我攻城兵力同敌守城兵力对比还不到三比一，而打援兵力只有新成立的两个纵队，难以挡住由沈阳北进之敌。若不能迅速攻克长春，整个局势将对我不利，因此不宜采取。第二，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转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如采此案，将遇到不好打之敌和粮食补给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也不宜采用。第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时间准备两个月至四个月，可以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与拿下长春。

七日 中央军委同意林、罗、刘提出的第三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并希望精心组织这次战役，充分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

九日 蒋介石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

十四日 东北野战军在吉林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修改原定强攻长春的计划，改为“久困长围”。从六月

二十五日起东北解放军对长春正式实行围困。

十七日 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发起豫东战役，至七月六日结束，共歼敌九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取得了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和打大歼灭战的经验。

七 月

十三日 华东野战军解放兖州，历时一个半月的津浦路中段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第十绥靖区司令部等三万余人。

十四日 中央军委就今后作战任务指示华东野战军：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尔后南下，打几个大仗，争取于今冬明春夺取徐州。

中旬 兖州解放后济南同徐州的陆上联系完全截断。美国驻南京军事顾问团向蒋介石建议“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但蒋介石认为“济南是山东省会，必须防守”，未予采纳。

十九日 卫立煌根据固守东北的方针，作了如下部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两个军及其非正规军共十万人守长春，以牵制我“军大批主力南下，减轻辽南和关内负担”；东北“剿总”指挥第八、第九两兵团八个军及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人，防守沈阳、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并支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第六兵团等部六个军及非正规军共十五万人，防守义县、锦州、锦西、山海

关一线，确保关内外陆海联系。以所谓“持久消耗战略”对付东北解放军，求得稳定东北。

二十日 东北解放军自正式围困长春以来沈阳敌军并未北上解围，长春守敌也没有突围。东北局常委鉴于“围城打援”计划难以实现，决定“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二十日报告中央军委说，准备八月中旬开始南下作战。

二十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求中央军委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华北“剿总”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吸引到大同方向去，以利东北部队南下作战。

同日 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并要加紧进行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拟定全盘作战计划电告中央军委。

二十三日 中央军委决定由华北军区第一纵队及第二、第六纵队各两个旅，组成一个兵团（后称华北第三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任政治委员，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相机夺取归绥，然后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远产粮区，吸引傅作义部西援，配合东北作战。

三十日 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在拟制新的作战计划时，应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的作战。只要有可能，

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

三十一日 中原局、中原军区在河南宝丰召开团以上干部的整党和新式整军会议，会议于八月七日结束。会议期间，陈毅传达了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精神，邓子恢作了关于中原新区政策和财经等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关于整军工作的动员报告。

八 月

一日 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的社论。社论指出：“为了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首先，要“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以便继续大量地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第二、“要引起全党全军来认真研究和正确执行对于新区和解放城市的政策”；第三、“要在解放区全力提高生产”；第四、“要在政治上继续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在组织上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的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

三日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在西柏坡接见杨成武，授予“一年内经营好全绥远”的战略任务。为配合杨成武部远征绥远，中央军委指示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向北平古北口线、北平张家

口线以及察哈尔省的南部行动，协同第三兵团进行察绥战役，吸引傅作义主力西顾。并规定上述两兵团均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同日 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至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陆、海、空三军正副总司令、联勤总司令、国防部正副部长及所属各厅局长，各“剿总”司令、各绥靖公署主任等。会议期间，蒋介石作了“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承认局势的发展对国民党很不利。他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关于战略方针决议案规定：“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实行“堵剿兼施”，“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中原解放区；在西北，确保关中、汉中，并建立以兰州为中心的“独立作战地带”，控制甘肃、青海、宁夏诸省；在长江以南成立绥靖公署，“培养地方武力”肃清人民游击队，巩固大后方。

六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东北主力行动时间向中央军委提出，为了达到调动傅作义主力向西目的，不宜由东北部队先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七日又提出：东北部队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中央军委于九日指出：“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八日 国民党国防部发表“半年来战局总检讨”，说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止解放军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

九日 蒋介石为加强中原战场的机动兵力，决定组建新的兵团。至二十一日，先后成立了四个兵团：以原整编第五军军部改编为第二兵团部，任命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兼兵团司令官（后由邱清泉担任）；撤消原第四、第十两兵团部和整编第十八军，成立第十二兵团，任命黄维为兵团司令官，成立第十四兵团，任命宋希濂为兵团司令官；撤消整编第四十七军，改编后第十六兵团部，任命孙元良为兵团司令官。连同第三兵团（一九四七年成立，兵团司令官张淦）、第七兵团（一九四八年七月成立，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第十三兵团（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兵团司令官李弥）共七个兵团。

十一日 毛泽东致电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出西北野战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宜在渭河以北寻机歼灭胡宗南几个师。这对于扣留该集团在陕西不向中原地区和山西增援，配合中原、华北我军作战是一大战略利益。十五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从九月起，全国各战场均将有大战，西北野战军应从战略上进行积极有效的配合。

十七日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解放军进行了整编。成立了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林彪兼司令员，罗荣桓兼政治委员，刘亚楼兼参谋长，谭政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兵团部，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另十五个独立师，共七十万人。东北军区部队三十三万人。

十九日 国民党国防部颁布，经蒋介石核准的所谓“华中战场作战计划”：除以各绥靖区部队分别对苏北、大别山、

大洪山、江汉及陕鄂边解放区进行“清剿”外，以“进剿”兵团分别控制陇海、平汉、津浦铁路和汉水、丹江各要点。加紧整编训练部队，“在整备未完成前，全盘战略暂取守势”。

二十三日 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现在国民党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军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对于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二十九日 东北野战军向各纵队、各师发出政治动员令。指出即将举行的作战，对于歼灭大量敌人，完成东北的解放，打通东北同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配合全国各战场皆有重大意义。号召全军发扬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挫折，为夺取更大胜利而奋斗。

九 月

五日 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这样，我军就可以在北宁线展开大规模作战，同时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相互孤立，有利于尔后作战。”

同日 中原军区颁发秋季作战的政治命令。命令指出，秋季作战的目标，一方面是在于寻求一切可能的战机歼灭当面的敌人，同时更在于密切配合友邻兵团作战，求得更大的歼灭敌人。全军应在“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总口号下动员起来。

七日 中央军委发布战争第三年作战任务，规定从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应歼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师）、左右。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为此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州）、榆（山海关）、唐（山）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补充新兵和处理俘虏事宜。

八日 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至十三日结束。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任务。

十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当前作战计划报告中央军委：只要现时的敌军位置无根本变化，在北宁线任何一个目标，我军均有把握夺取，就是敌人重点防备的锦州，我军也能完全有把握夺取。计划第一步歼灭锦州南北分散之敌，孤立锦州；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十二日 东北野战军按照预定部署，在义县至唐山七百

里的北宁线上向守敌发起攻击，攻克昌黎、包围兴城、绥中。锦州、唐山间陆路交通被遮断。辽沈决战全面展开。

十四日 为牵制傅作义集团，配合辽沈战役，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发起察绥战役，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共歼敌二万余人。绥远除绥西之五原、临河地区和归绥孤城外，全部获得解放。

十六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十七日 济南战役开始后，蒋介石令王耀武坚守济南，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由鲁西南、鲁南以兖州为目标，求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但由于济南迅速被攻克，蒋介石的这一“会战计划”破产。

十九日 济南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

二十四日 济南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济南战役之后即乘胜举行淮海战役。

二十五日 中央军委同意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并在给华野的复电中指出，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第三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争取歼敌十几个旅，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我军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先打锦州后打锦西的计划，并强调指出，必须将作战重心

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上面，尤其是锦州一点。因为这是整个战局的关键。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再次报告中央军委，决心攻锦州，说：锦州是敌人的弱点与要害，我军攻锦州时，沈阳敌人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锦州作战，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表示要极力争取决战的胜利。

三十日 东北局发出支援辽沈战役的指示。号召东北全党克服一切困难，勇敢的坚决的动员与领导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完成二线兵团的组建和动员民伕、担架以及收容俘虏等项任务。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决战中，参加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其中经常在前线参战的即有九万六千余人，由后方送到前方的粮食约七千万斤。

十 月

一日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一个师，攻克锦州北面屏障义县，歼守敌万余人。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至此，义县、高桥、塔山、兴城、沙后所、绥中、北戴河、昌黎均为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完全陷入孤立。

同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从华北抽第六十二军三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驻守烟台的第三十九军的两个师，连同原在锦西的四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援锦。

二日 蒋介石由北平飞至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地区之部队分为守备兵团和攻击兵团，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第八兵团（辖第五十三军）和“剿总”直属部队，坚守沈阳；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攻击兵团，西进增援锦州。

同日 林彪获悉国民党增兵锦西、葫芦岛的消息后，攻锦州的决心发生动摇，他向中央军委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攻锦州，但估计难以速克，在塔山地区的阻击部队不一定能顶住敌之攻击，如此两锦之敌就可能合，我军将陷入被动；二是回师打长春，估计长春守敌的战斗力的在我军久困之下已进一步减弱，我军攻占长春的把握性增大了。第二天，即三日，九时半，林彪又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仍然攻取锦州。说，回头打长春太费时间。并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两个纵队在塔山地区对付敌之东进兵团，以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一个纵队位于高桥为战役预备队，以九个独立师围困长春。

同日 华东局开会，决定以济南战役中成立的华东支前委员会为淮海战役的支前领导机构，并开始筹划支前事宜。

三日 中央军委收到林彪要回师打长春的建议后，于三日连发两电。电报中说，过去长春好打，你们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却因敌增兵锦西，而改变决心。指示按照既定方针力争十天内外夺取锦州。并说，只要打下锦州，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权，反而增加下一步的困难。

四日 中央军委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决心攻锦州的电报后复电指出：“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并说，你们这样做法才算是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的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东北野战军按照调整后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实施，争取攻克锦州。

同日 东北野战军指挥所由阜新移至锦州前线。

五日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曲阜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会议于十月下旬结束。

同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荔北战役，攻击驻守在渭河以北洛河以东地区之胡宗南部，至十八日结束，共歼敌二万五千余人。这次作战，有力地策应了中原和山西战场之作战。

六日 蒋介石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不等增援部队到齐，就以先期到达的部队由锦西向塔山攻击。

八日 粟裕、谭震林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反复破击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反复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段，江淮军区部队反复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运河车站段，以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九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军委说，攻锦州部署大体上已完成，决定以五个纵队攻城：第二、第三两纵队（主力纵队）与最大部分炮火由北向南攻击，第七、

第九两纵队（战力较弱）由南向北攻击，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攻击。第一步消灭城东半部之敌，然后消灭城西半部及飞机场之敌。以第一纵队为总预备队。

十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很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芦岛、锦西援敌一部，歼灭长春逃敌以及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同日 塔山阻击战开始。锦西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三个师于拂晓强攻塔山，数十次冲锋均被东北第四纵队击退。

十一日 廖耀湘兵团进占彰武，切断了东北野战军的补给线，妄图用这种取巧办法吸引东北野战军主力回援，借以解锦州之围。

同日 中央军委就淮海战役部署发出指示，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增援，歼其一部。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第三阶段，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攻歼两淮地区之敌。完成淮海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准备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协同中原野战军将敌打至江边。秋季举行渡江作战。

同日 中央军委令中原野战军迅速部署以主力攻击郑州，牵制孙元良兵团东进，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

十三日 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军区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

十四日 中央军委就阻击徐州各路援敌以保证全歼黄百韬兵团，指出，应将牵制和阻援、打援兵力放在徐州的北面、东北面、南面和西面，形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敌错觉我军似夺取徐州，待敌发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若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就给我军赢得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时间。

十五日 东北野战军攻锦部队在强大炮兵支援下，从十四日十时开始对锦州城发起总攻。各纵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迅速突破敌之防御，插入纵深，展开巷战。至十五日十八时，经三十一小时激战，攻克了锦州，全歼守敌十万余人，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泉。

同日 锦州攻克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于十五日和十八日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撤退。其计划与部署是：廖耀湘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南，在锦西地区部队策应下，“规复”锦州，打通北宁线，全军从陆路撤入华北；另以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并在天津征集船只，以备廖耀湘兵团及沈阳各部从海上撤退；周福成继续指挥防守兵团守沈阳，牵制东北野战军。命令杜聿明负责指挥这次撤退。

十六日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蒋介石严令的手令交给东北野战军，并立即作了起义部署。

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电祝贺锦州大捷。贺电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同时号召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同日 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下一作战方向发出指示：如果廖耀湘兵团不敢继续向锦州前进，东北野战军稍经休整后集中兵力求歼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这时沈阳敌人可能被迫增援，只要它远离沈阳，走大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如廖耀湘兵团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企图重占锦州，并将主力放在山海关至天津一线，东北野战军应争取迅速地攻占锦、葫、榆、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介石、卫立煌空运一部兵力增援平津，以利回头歼灭敌主力。如果敌经营口海运增援榆、唐、平、津，亦须先取锦、葫，然后再议入关作战。

同日 曾泽生率第六十军在长春宣布起义，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六、第八师进入长春市区接替第六十军阵地。

十八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廖耀湘兵团继续南进的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决心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该敌歼灭在黑山、大虎山、沟帮子地区。

同日 长春守军新编第七军与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达成放下武器投诚的协议。

同日 周恩来写信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希望郑洞国毅然率领长春守军宣布起义。

十九日 郑洞国率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

同日 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提出今后“全盘战略计划”。内容是：放弃沈阳，扼守锦西、葫芦岛地区、防止东北解放军入关；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华中（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华东）以徐州刘峙集团监视华东解放军，以汉口白崇禧集团攻击中原解放军；西北胡宗南集团及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集团协力解决陕北问题。

同日 中央军委同意东北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我军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因为沈敌决心撤退，我军必须用全力抓住，暂时不打锦西、葫芦岛之敌，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箝制目标。还指示东北野战军应派必要兵力控制营口，并说，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

二十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敌军动向，决心围歼廖耀湘兵团于彰武、新立屯、黑山地区。其部署是：令第十纵队由饶阳河一线退至黑山以北阻敌前进；第五、第六两纵迅速隐蔽插入敌后断其退沈阳道路；独立第二师迅速向营口前进，抢占营口，阻塞敌海上退路；第一、第三、第八纵队为第一梯队自锦州分三路向东兼程急进，担任正面攻击；第二、第七、第九纵队为第二梯队跟进；第四、第十一纵队仍位于塔山阻击锦西之

敌；长春之第十二纵队及各独立师均兼程南下，策应主力作战。还规定：如果廖耀湘兵团逃向营口，则以主力跟踪追击与堵击，力求在牛庄、营口地区歼灭之。

同日 东北野战军发布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困难，不怕伤亡，为解放全东北而战。

二十二日 中央军委电示陈毅、邓小平攻克郑州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同日 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守敌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等部万余人弃城北逃。中野第九纵队将其全歼于老鸦陈地区。中共中央在二十三日贺电里指出，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二十三日 自本日至二十五日，廖耀湘兵团以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二〇七师第三旅，在重炮掩护下，向黑山猛攻，均被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击退。黑山阻击战的胜利，为全歼廖耀湘兵团赢得了时间，并迫使该敌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中。

同日 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命令规定，集中华野全力首先歼灭新集镇地区之黄百韬兵团和冯治安部。

二十四日 中原军区之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守敌弃城东逃。中共中央在二十五日电贺里指出，“中原三大

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我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同日 蒋介石就“当前作战之指导”电示刘峙、白崇禧：徐州方面采取攻势防御，在陇海路以北、运河西岸地区加强防御工事，以阻止华东解放军南下。徐州“剿总”应加强徐州、蚌埠、淮阴防御工事，务期坚强固守，以形成各机动兵团之核心。华中方面，由黄维兵团并指挥南阳第十三绥靖区部队寻求中原野战军主力作战，如该野主力越平汉铁路东进，黄维兵团则应先机进至周家口附近，适时配合刘峙集团夹击而歼灭之。

同日 沈阳第五十二军袭占营口。中央军委在二十五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批评他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二十六日 廖耀湘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西进受阻，被迫放弃重占锦州的计划，于二十五日改向营口方向撤退。先头部队在台安以西与东北独立第二师遭遇，廖耀湘以为是东北野战军主力，遂又改向东，企图经新民窜回沈阳。这时，东北第七、第八纵队主力已赶到台安、盘山之间，第六纵队由彰武以北地区向南，第五纵队由彰武西南向东南急进。进至厉家窝棚及二道镜子，截断了敌人退新民的铁路、公路，与从右翼迂回的第七、第八纵队构成合围；与此同时，第一、第二、第三、第十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将廖耀湘兵团全部合围在饶阳河以西，魏家窝棚以北，无梁殿以南，黑山大虎山以东的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地区内。

二十七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野战军：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不少于三个纵队的有力兵团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如沈阳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二十八日 东北野战军合围廖耀湘兵团之后，乘敌恐慌混乱，立即展开围攻。全部、干净聚歼廖耀湘兵团十万人，其中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俘虏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同日 中共中央电贺辽西大捷。贺电说：“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二十六个整师共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同日 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会议，研究南京、上海不保时的应有之计划、决定政府应迁广州；政府应为军政府；缩减政府机构；调整部署，东北部队撤入华北；华北守唐山、天津、塘沽；徐州“剿总”以一部守青岛、海州，主力守京、沪以南，华中“剿总”守武汉、宜昌、沙市；西北守陇中及陕南。

同日 廖耀湘兵团被全歼后，沈阳残余国民党军惊慌失措。东北“剿总”于是日九时即开始向营口撤退。为掩护撤退，除原在沈阳的第五十三军一个多师、新一军一个师外，又把已撤至鞍山、辽阳的第二〇七师两个旅调回沈阳，统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于三十日由沈阳飞抵锦西，一星期后飞北平。

二十九日 蒋介石为挽救危局，鼓舞士气，指使傅作义集中三个军又两个师，于二十八日由保定地区开始南下，企图捣毁平山、石家庄一带中共中央及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央军委除令华北第二兵团由延庆地区兼程南进，准备歼击敌人外，又令东北野战军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第十一纵队等部组成先遣兵团，由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率领进至河北东部，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配合华北军区粉碎傅作义部进攻。由于遭到华北军区部队的阻击和惧怕后路被切断，南犯之傅作义部于三十一日开始北撤，偷袭石家庄之计划遂被阻止。

三十日 东北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由辽中以西渡河，先后收复辽阳、鞍山、海城等城后，急转向营口方向前进。

同日 中央军委就淮海战役发起时间电示华野、中野：为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互相不能照顾，我军应于同一时间动作。

三十一日 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局、东北局：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于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

同日 徐州会战一触即发。华中“剿总”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令黄维兵团（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东进确山附近，补给后开太和、阜阳地区，限十一月

十日集中完毕，准备参加徐蚌地区作战。

十一月

一日 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统一由陈毅、邓小平指挥。

同日 中央军委发出统一全军番号的通令。规定野战军辖军、师、团，各级实行三三制编制，现有纵队、旅一律改编为军和师。东北野战军可以特殊采用每军辖四个师，即每军除编三个师外，另编一个独立师。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又规定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约于一九四九年三月整编完毕。

二日 解放沈阳市。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和独立第三、第四、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师于一日开始对沈阳守敌发起总攻击，至二日结束战斗，歼敌十三万四千余人。从九月十二日开始的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解放军共歼国民党一个“剿匪”总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共四十七万二千余人。东北野战军伤亡六万九千余人。

同日 东北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独立第二师攻占营口，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第五十二军军部和一个师部、三个团乘船逃走。至九日，锦西、葫芦岛国民党军全部撤走。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三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全东北解放电》贺电说：“东北

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一九四五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一百一十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三日 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国民党“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建议陈毅、邓小平率主力首先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用“斩断敌人中枢方法”，调动孙元良兵团于运动中歼灭，调动邱清泉兵团南顾，并说，这一行动必“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

同日 中原野战军解放豫南重镇南阳城，守敌逃窜。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在准备召开的纵、师两级干部会议上，应把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问题，列为会议内容，并应向全军公开提出准备举行平津战役和夺取平津的任务。

同日 傅作义奉召到南京。当日何应钦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委任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异己的惯技怀有戒心，不愿南撤。蒋介石亦考虑到放弃平津即放弃华北，而控制平津支撑华北，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南下，对整个战局亦属有利，同时

判断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蒋介石与傅作义经过多次磋商后，决定暂守平津并授予傅作义对华北军政“便宜指挥处理的权力”，傅作义还可以直接接受美国援助。六日，傅作义飞回北平。

五日 陈毅、邓小平提出中原野战军主力于七日首先歼灭仍位于商邱地区之刘汝明部。中央军委于六日复电同意。

同日 蒋介石派顾祝同到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的一点两线的部署，“缩短正面，加大纵深配置，即以两翼部队向徐州附近地区集结”，“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我军，伺机决战，并于六日正式下达命令。

六日 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按照预定部署对徐州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淮海战役开始。当晚，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包围郟城，第六纵队攻克马头。

同日 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按照预定部署，开始收缩：孙元良兵团三个军，由商邱移至蒙城地区，保护津浦路安全；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两个军，由商邱移至临淮关固守；邱清泉兵团四个军，仍在砀山、永城地区待机；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两个军，放弃枣庄、临城（今薛城），退贾汪、台儿庄固守；第九绥靖区撤销，所属第四十四军，由海州沿陇海路西撤改归黄百韬指挥；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在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一起向运河以西集结；李弥兵团两个军，由碾庄、炮车段向灵璧、泗县集结，担任机动任务；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四个军，守备淮阴、扬州线；“剿总”直属第

七十二、第六十六、第九十六、第一〇七军守备徐州、五河、蚌埠、睢宁；由国防部直接指挥的黄维兵团四个军，由确山进至阜阳地区待机。上述二十九个军，加上从东北、华中调来的四个军及新建一个军共计三十四个军、八十二个师，连同地方部队，总计八十万人。

七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淮海战役第一仗应力争歼灭黄百韬等部二十一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华东整个形势即将改变。如徐州敌人不南撤，第二仗力争歼灭黄维、孙元良两兵团，使徐州完全孤立起来。两野战军照此方针，坚决执行，愈坚决，愈能胜利。又指出：为保证连续作战，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方针，使部队经常保持有充足的兵员和旺盛的士气。

同日 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在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一部配合下，于商邱张公店地区歼灭刘汝明部第一八一师。

同日 华东野战军第四、第八纵队渡过运河，山东兵团攻占韩庄万年闸。

同日 苏北军区部队解放新浦、海州，十日又解放东海、连云港等地。

八日 粟裕、张震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建议以有力措施，将敌歼灭于长江以北。

同日 国民党第三绥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三个半师，二万三千人，于贾汪、台儿庄起义。

同日 黄百韬率四个军(包括第四十四军)由新集镇撤

过运河以西，第六十三军向瑶湾，担任翼侧掩护。

同日 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追击和堵击。第八、第九纵队占领炮车、新安镇；苏北兵团三个纵队越过陇海路，经睢宁、皂河向徐州东南迂回；山东兵团三个纵队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向徐州以东陇海路猛插。

同日 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攻克郯城，歼灭守敌山东省保安第一旅五千人。

九日 中央军委复电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指出：“徐州敌有总撤退模样”，中原主力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东集中四个纵队攻击李弥兵团，主力则歼灭黄百韬兵团，“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撤退的计划”。同日，中央军委再电强调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样，战役规模比预定计划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地歼灭刘峙集团就成为战役的总方针。

同日 苏北军区部队在淮阴、淮安、泰州一线积极活动，牵制当面敌人。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北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指出：目前傅作义正徘徊于平、津、张、保之间，或守或撤，似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早日夺取太原和扣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二兵团率第三、第四、第八纵队准备由曲阳西开，协同华北第一兵团，争取于十二月十五日前攻克太原，然后北返，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夺取平津。同时考虑到攻

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部早日西退的可能，因此，华北第三兵团应停止执行围攻归绥的计划，率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移至集宁一带，准备歼击由平、张西退之敌。

十日 中央军委电示陈毅、邓小平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兵团，控制徐蚌段，愈快愈好。

同日 刘伯承由豫南到达柘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同日 蒋介石决定徐州之作战，“本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击灭之”，令黄百韬兵团“固守待援”；邱清泉兵团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李弥兵团一部配合黄百韬兵团作战；孙元良兵团由蒙城，宿县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刘汝明部进至固镇；黄维兵团到达阜阳后即向宿县前进。但刘峙认为“徐州以西之匪尚有强大力量”，决定“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百韬兵团之作战”。蒋介石于十一日午时，训斥刘峙“所呈作战方针过于消极”，令其彻底奉行十日电令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我军，“以免黄兵团先被击破”，并令刚从东北回来的杜聿明赶赴徐州重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剿总”指挥所主任协助刘峙指挥作战。

十一日 山东兵团三个纵队插至徐州以东，其第七纵队在大耿庄歼灭李弥兵团后尾一个团，第十三纵队在曹八集歼灭黄百韬兵团先头第一〇〇军之第四十四师，切断了黄百韬同徐州的联系。

同日 华东野战军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及第一纵队将黄百韬兵团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四、第一〇〇军包围于碾庄地区，其第六十三军被包围于瑶湾地区。

十二日 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第十一纵队一部配合下，全歼瑶湾地区敌人的第六十三军两个师。

同日 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六个军在飞机、大炮和一百辆坦克掩护下，沿陇海路两侧向碾庄方向增援。

同日 山东兵团第七、第十及第十一纵队（第十三纵队奉令参加攻歼黄百韬兵团作战）在荆山铺至徐庄一线，正面五十华里，纵深八十华里，以攻势防御阻击邱、李两兵团东援。

同日 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发起徐蚌作战：中原第四纵队、华东第三和两广纵队在夹沟地区歼灭孙元良兵团后尾一部。十四日又在闵贤集歼灭第七十七军之第三十七师残部三千人；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占领固镇。

同日 承德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撤至密云、通县一线，冀热察辽军区部队解放热河省省会承德市。

十三日 中央军委提出在将近歼灭黄百韬兵团之际，诱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于徐州以东的作战计划。

同日 苏北兵团解放睢宁，在大王集迫使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及第二六〇师投诚，其第二六一师于十四日被追歼于观音堂。

同日 黄维兵团到达阜阳地区。中央军委电示邓子恢、李达：即令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赶到黄维兵团前面阻敌，令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坏敌必经之道路，迟滞其行动。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先遣兵团，在向南作战中“尤重在抑留傅作义于平津张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

其得由海上南撤。”

十四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评论说：中国军事形势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转为优势，这是胜利已经迫近的标志。指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十四日 华东野战军召开作战会议，总结几天来的经验教训。根据黄百韬兵团已转入工事防御的情况，决定采取稳扎稳打，逐点攻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由西而东卷击敌人。并确定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指挥；阻援部队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

同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如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歼击该敌为上策。

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规定对新解放的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般都成立军管会。军管会的任务是：①肃清一切残余敌人和散兵游勇；②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③恢复和维持秩序；④收缴反动分子的武器和违禁物品；⑤解散反动党团组织并登记；⑥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犯；⑦建立革命政权；⑧进行革命宣传；⑨整理和建立党的组织。

同日 中央军委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指出：军委同你们意见一致，一切需待歼灭黄百韬，攻占宿县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同日 中原局发出《全力支援淮海前线的紧急指示》。指出：“争取此次决战的胜利，不仅是全中原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豫皖苏分局应加强支前机构和支前工作。二十四日，豫皖苏分局就调集粮食、副食、服装、运输、动员民工和组织领导作出了决定。同日，中原军区就通信、弹药运输、粮站和民站的设置等作了布置，三十日又成立了运输司令部，专事领导运输工作。

国民党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刘汝明任司令官；蚌埠第九十九及由东北调来的第五十四、第三十九军组成第六兵团，李延年任司令官。两兵团组成后，由蚌埠沿徐蚌路北援。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建议，停攻太原，集中华北三个兵团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集团既不能南撤亦不能西退，待东北野战军到达合力歼灭敌人。

同日 东北先遣兵团到达蓟县地区集结待机。

十六日 中央军委决定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及支前工作。还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

同日 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在第九纵队一部配合下，于十三日包围宿县，十六日凌晨攻克宿县，全歼守敌第二十五军之第一四八师及交警第十六总队一万二千人。

同日 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进至蒙城、涡河北岸，准备阻击黄维兵团北进；第九纵队及豫皖苏部队占领固镇、任桥，准备阻击由蚌埠北进之敌；第二、第六纵队到达涡阳地区待机；第四纵队由夹沟南移；华东野战军第三、两广纵队位三堡地区，牵制徐州敌人。

同日 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华北第一兵团现包围太原，不能放弃已占阵地去包围张家口或保定。第二、第三兵团集中在一起，位于绥东或包围张家口，虽然可以阻止傅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傅两部集力从海上撤退，因此，不能达到抑留平津敌人的目的。保定守敌是由保安部队组成的军，包围与否无关大局。并征询东北主力能否“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海上逃跑”。望考虑并将意见报告中央军委。

十七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部队在辽沈大战后需要休整、补充和动员。

同日 中央军委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华北局，指出：在淮海战役的胜利威慑下，蒋介石必将考虑加强长江防线问题，而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西北和华北，首先必是华北。因西北胡宗南集团尚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故傅作义集团是其“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利益考虑，将蒋、傅两部抑留在华北来消灭，对我最有利，一则有利于东北野战军入关歼敌；二则使蒋介石无法组成长江防线，从而加速其反动统治的崩溃。要

求东北野战军领导人郑重考虑早日入关或仍按原计划休整两案。

十七日 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谭震林，指出：敌在防御时尚有相当战斗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给以各个歼灭。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应抽出五个纵队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之预备队，准备协同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同时提出中原、华东各一部在大店附近诱歼李延年兵团的作战计划。

同日 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在蒙城地区，开始阻击黄维兵团。当日，黄维兵团突过涡河，二十二日进至浍河以南赵集地区。

同日 鉴于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随时有撤退的可能，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以一、二天完成出发准备，用最快速度包围唐山、塘沽、天津，防止敌人逃跑。同时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攻太原，华北第七纵队停攻保定，以稳定傅作义。

十九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两次向中央军委建议说：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打得很疲劳，“刀锋似略形钝挫”，如接着打战力更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同时，中原野战军单独对付南线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困难颇多”，在北线打邱、李不能速决，南线阻援又无把握的情况下，我军势必陷入被动。因此建议在歼灭黄百韬兵团残部后，华东主力位于徐、宿间阻击徐州敌人南援，以六、七个纵队协同中原主力歼灭黄维兵团

或李延年兵团为上策。

同日 华东野战军命令担任济南守备任务的渤海纵队南下参战。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我们决遵来电于二十二日出发”（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改为二十三日出发）。同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东北先遣兵团于二十四日全力包围唐山，等候主力到达后歼敌，防止敌人发现我主力南下后先我逃跑。

二十日 华东野战军攻克黄百韬兵团部所在地碾庄，黄百韬逃至大院上，指挥残部继续顽抗。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自十二日至本日，计歼敌第四十四、第一〇〇军全部及第二十五军大部、第六十四军一部。

同日 苏北兵团指挥第二、第十二、鲁中南及中原第十一纵队，于十五日向位于潘圩、六铺圩、林佟山线之邱清泉兵团侧后攻击，求得切断该敌退路，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但该敌配置密集，多次攻击未能奏效。二十日奉令停止攻击，准备南下作战。中原第十一纵队于十九日南下归还中原野战军建制。

同日 华东局发出《紧急动员起来，支援淮海战役的指示》。号召华东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前线，力争歼灭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或大部。在此前后，华东局所属江淮、苏北、鲁中南、渤海、胶东行署或区党委亦发出了相应的指示。

同日 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包围唐山的时机值得考虑。在东北主力距离较远和未切断

平津、圻唐联系的条件下包围唐山，敌必有所动作；以一部或全部进至津圻唐线，即可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上撤退的准备，使我很难歼灭该敌。因此，东北先遣兵团应推迟包围唐山的时间。又说：现山海关有敌一个军，目的是监视东北主力入关。因此，东北入关部队应十分隐蔽，夜行晓宿，走热河、出冀东，不走山海关。并令广播电台播放在沈阳、锦州、营口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傅作义。

同日 美国计划帮助傅作义装备五个军，第一批五万吨武器、弹药运到大沽港。另外，美国还援助傅作义价值二百七十万美元的麦粉，第一批一万六千吨，于十二月十七日运到。傅作义计划扩军二十万至五十万，并已着手第一批新编十二个师。

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美军保护一事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现已即将覆亡”，“美国政府如果派出其军事力量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全面的或局部的保护，均为对中国神圣的领土主权之武装侵略，其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

二十二日 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毙命。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同日 蒋介石曾限邱、李两兵团于二十日与黄百韬会师，违者以军法论处。但邱、李兵团在华东野战军阻击和侧击下，自十二日至二十二日的十天中，仅前进四十华里，伤亡万余人，被击毁坦克四十辆，终未能与黄百韬会师。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保障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

同日 保定第一〇一军主力撤至涿县，华北第七纵队解放河北省省会保定市。

同日 华北“剿总”宣布，鉴于东北解放军陆续入关，自本日起，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之间地区划为戒严区，实行戒严。

二十三日 中央军委向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发出指示，指出：现徐蚌地区尚有敌人五十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在现地作战三至五个月、二十万人伤亡和一百三十万人（包括部队、民工和俘虏）的粮草；必须利用间隙休整部队；对兵员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方针；对人民实行耕战结合方针；对部队和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敌人开展猛烈有效的政治攻势和策反；在战术方面，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又指出：“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号召华东，中原全军在总前委领导之下，争取新的更大胜利。

同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根据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孤立突出，决心放弃南坪集，将敌一部诱过浍河，待敌进入预设的袋形阵地后，夹河歼灭之。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说：“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指示华东野战军派必要兵力参战，情况紧急时，一切由陈、邓处置，不要请示。

同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指挥所移至临涣集以东小李家，就近指挥歼击黄维兵团。

二十四日 蒋介石为改善徐州的不利态势，电召刘峙、

杜聿明到南京。决定“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我军，“打通徐蚌间交通”。

同日 东北野战军主力由沈阳、锦州、营口出发，其第五、第六、第一、第七、第十二及特种兵纵队由喜峰口入关；第三、第十、第九、第八、第二纵队由冷口入关，以玉田为集结地域（十二月五日，东北野战军根据战况发展决定尾第二、第七、第十二及特种兵纵队改经山海关入关）。

同日 东北局常委兼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东北入关部队八十万，民工十五万，马匹十四万，汽车三千辆，大车八千辆，月需加工粮五千二百二十万斤，马料五百万斤。又说：已急电冀东区党委准备粮草，同时筹划从东北内地赶运粮草和物资入关。

同日 中央军委命令杨成武，李天焕率华北第三兵团于二十五日由集宁地区出发，攻击张家口地区之敌，切断张、宣（化）联系，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跑掉为原则；李井泉率晋绥军区第八纵队留在绥远，监视敌人。

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大捷电》。贺电说：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等部十八个师，攻克宿县、海州等地，使徐州敌人陷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此种重要成就，深堪庆贺”，尚望为全歼当面之敌而奋斗。

同日 黄维兵团一部于二十四日突过浍河，在发现处于不利态势后，于当日回窜。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从四面出击，至二十五日，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并在大营集击溃第十八军之第四十九师。

同日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于十九日由碾庄地区南下，协同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于二十三日包围灵璧，二十五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第十二军之第二三八师。

二十六日 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奉命到达双堆集地区参战。

同日 中央军委发出平津战役作战计划：（1）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敌人西援；待北平敌人西援后，华北第二兵团于紫荆关、东北先遣兵团于蓟县，立即控制宣化至怀来（现怀来镇）段，切断平张线，与华北第三兵团扭打线上诸敌，以拖住平津之敌，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2）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首先切断平津、津坊、坊唐联系，尔后歼灭芦台、坊沽、唐山之敌，攻克天津，最后夺取北平。（3）平张线上作战部队由程子华、黄志勇指挥，整个战役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交由林、罗、刘指挥。

上述参战部队，计东北野战军两个兵团、十二个纵队、四十八个师及一个特种兵纵队，华北军区两个兵团、七个纵队、二十个旅及一个炮兵旅，连同东北军区之冀热察、冀东、内蒙军区和华北军区之北岳、冀中、冀南军区及晋绥军区部队，总计一百万人。

同日 冀热察军区五个独立团和华北第二兵团留在平张线活动的第十二旅，破击平张线沙城（现怀来）至新保安段铁路、公路，以阻滞敌人行动。

同日 朱德总司令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在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全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又说：“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刘峙指挥笨，他的“指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不象白崇禧那样狡猾会逃跑。”他“原估计我们从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冯治安部的起义，对战局的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黄百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一点亏”；黄维自恃是嫡系主力，估计我们不敢打他，结果我们从侧翼打他，使其东与李延年、刘汝明靠不上，北进不了徐州，队伍一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傅作义比较聪明”，他“过去守涿州出过名，东北军没有把它打开。他又看到阎锡山暂时守住了太原，于是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最后说：“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

二十七日 黄维以四个师并肩向东南突围，遭中原野战军的坚决阻击。第八十五军之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两个团乘机举行战场起义。黄维突围失败后，于二十八日转为固守待援。中原野战军适时改变战法，“采取坚决压

缩，逐步剜击的战法”，稳扎稳打。

同日 山海关、秦皇岛守敌撤至唐山。至此，傅作义集团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四十二个师(旅)，连同地方武装五十余万人，全部收缩于滦县至柴沟堡一线。部署是：第十七兵团部及第六十二、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共十六个师，防守天津及唐山、圉沽、廊坊一线；华北“剿总”、第四、第九兵团部及第十三、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第一〇一、第一〇四军，共十八个师，守备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涿县地区；第十一兵团部及第一〇五军等共八个师(旅)，防守张家口及柴沟堡、万全、张北、宣化、怀来线。其部队的布置基本呈一字长蛇阵，蒋系主力位于北平以东，傅系主力位于北平以西。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可能”，应加防范。

同日 蒋介石鉴于黄维兵团被围、打通徐蚌路计划难以实现，徐州孤城难守，决定放弃徐州。令刘峙率“剿总”机关飞蚌埠，指挥李延年兵团再次北援；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避开华东野战军正面阻击，沿徐州永城公路，向永城，蒙城前进，然后协同李延年兵团解救黄维兵团。

同日 为配合淮海战役，西北野战军于十五日发起冬季攻势，至二十八日，在临皋、永丰地区歼灭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六军等部二万五千人，使蒋介石无法从西北抽兵增

援徐蚌作战。

二十九日 华北第三兵团按照预定计划，向张家口地区之敌发起进攻，至十二月二日，先后占领左卫、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切断了张（家口）、宣（化）联系，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同日 傅作义判断解放军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急令第三十五军两个师由丰台、第一〇四军之第二五八师由怀来向张家口驰援；又令第一〇四军主力由昌平、南口移至怀来，第十六军由涿县移至昌平、南口，确保平张线交通。

三十日 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于二十四日开始向南进攻。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依托多道阻击阵地，抗击敌人。至三十日，将敌阻于孤山集一线。七天中，敌仅前进三十华里，并遭到重大杀伤。

同日 进至任桥、花庄集地区之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惧被我歼灭，于二十六日闻风南窜。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旅跟踪追击。直至曹老集始停止前进，因河流阻隔，仅歼敌后尾一部，逼使敌人两个团投诚。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出发，十二月七日进抵河北省蓟县以南孟家楼指挥。

十二月

一日 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三十万人，撤离徐州，六日到达青龙集、孟集地区，因部队争相夺路，队形极为混乱。蒋介石恐杜聿明一意西逃置黄维于不顾，于三日命令杜改经濉溪口取捷径向双堆集攻击前进。

同日 华东野战军发现徐州敌人西逃后，以十一个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采取尾追、平行追击及迂回拦截的手段，展开猛烈追击。二日，先头部队在瓦子口与敌后尾接战，沿途俘散敌三万人，缴大批遗弃物资。至四日，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陈官庄、李石林、青龙集地区内。

同日 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进驻徐州。二日，中共中央发出《贺徐州解放电》。贺电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巨大军事基地，徐州的迅速解放，对于全国战局极为有利。”

二日 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东北先遣兵团分向涿鹿、怀来急进，华北第三兵团重点隔断张、宣联系。

同日 华北局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对东北入关部队的供应，华北以李富春所提数字，按两个月计划，供应东北部队。

同日 蒋介石派国防部作战厅副厅长罗泽闾到北平，要傅作义确实控制海口，以利尔后行动。

三日 苏北军区收复淮阴，接着于九日至十七日又收

复淮安、高邮、宝应、兴化等地。守敌第一绥靖区及第四、第五十一军等部南逃。

同日 傅作义于二、三日两次飞张家口部署作战。第三十五军等部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张家口后，会同守军第一〇五军向东、向西反击，至四日占领万全、沙岭子，恢复了张、宣间联系。

四日 中央军委电示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对于进入筑工防御的黄维兵团，“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对于杜聿明集团，则应乘其运动之际，我各纵大胆插入敌人各军之间，务必不使敌人结成一团，然后各个歼灭之。

同日 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采取三面防御，一面攻击的战法，向东南攻击前进。华东野战军则采取三面突击，一面阻击的战法，坚决阻击和歼击敌人。

同日 李延年兵团三个军及刘汝明兵团一个军越过淝河再次北援。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依托阵地，坚决阻敌。六日，总前委调中原第二纵队及华东渤海纵队之第十一师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豫西军区两个独立团参加阻援。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目前数日内最大顾虑，就是张家口敌人乘东北先遣兵团将到未到南口、怀来间，突围向东，而怀来之敌向西接应。故华北第二兵团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怀来与张、宣两敌的联系。

五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击命令，规定各部统于六日十六时半开始总攻，一直打下

去，直至歼灭黄维兵团。

同日 东北先遣兵团在行进中攻克密云，歼灭第十三军之第一五五师。

同日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感到北平及平张线受到威胁。急令第三十五军星夜返回北平，第一〇四军主力和第十六军向西接应，同时令第九十二、第九十四（欠一个师）、第六十二军，由津坊地区到北平加强防御。

六日 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将抢先向西突围的孙元良兵团歼灭大部。孙元良逃脱，余部退回包围圈内为邱清泉收编。

同日 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奉令越过淮河，协同原在淮南活动的由李步新、谭启龙率领的先遣纵队，破击浦口、蚌埠段，牵制和歼击敌人。

同日 中央军委决定由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飏、杨成武、李天焕七人组成平绥前线委员会，以程子华、罗瑞卿分任正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线作战及粮食、弹药、处理俘虏等事宜。

同日 华北第二兵团第十二旅占领新保安，冀热察军区部队占领土木（沙城）。

同日 傅作义之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由张家口乘汽车向北平回窜，沿途遭华北第十二旅的节节阻击，至七日方进至新保安。

七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军委建议，以东北野战军先头入关的第五、第三纵队由蓟县、丰润插至南口地区参加歼击由张家口向北平逃跑的敌人。

八日 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以先头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第十六军，在全盘计划上不妥。你们首要任务是隔断平津，第二个任务是包围唐山，第三个任务是隔断津坨，应静候主力到达执行上述任务。“只要北平、唐山敌人跑不掉，天津、坨沽、芦台之敌(十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

同日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到达位置：第四、第十一纵队向怀来、康庄间插进；第五纵队于蓟县；第三纵队于丰润；第十纵队于迁安；第九纵队于建昌营；第八纵队于建昌；第六纵队于喜峰口；特种兵纵队于绥中；第七纵队于锦西；第一纵队于朝阳；第二纵队于黑山；第十二纵队于新民。

同日 华北第二兵团赶到新保安东西地区，一部占领下花园。九日击退敌第三十五军由新保安、第一〇四军主力由沙城的夹击，十日完成对新保安的包围。

同日 华北第三兵团于七日解放宣化，并在沙岭子歼灭由宣化向张家口逃跑的第一〇一军之第二七一师，八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与此同时，由华北第三兵团指挥的北岳军区五个独立团，从大同附近到达南壕堑（现尚义）、晋绥军区第八纵队，由归绥附近到达集宁地区，构筑阻击阵地，防止张家口敌人西逃。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应构筑多层阵地，实行长围久困，待命攻击方针。

十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战况的发展，决定

集中兵力先歼灭黄维兵团，再歼灭杜聿明集团。为此，调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十一、鲁中南纵队，由陈士榘率领南下双堆集参战，对杜聿明集团则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阻其南逃。刘伯承将这一方针比喻为“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兵团）”。

同日 东北先遣兵团占领康庄，并在康庄东南追歼第十六军指挥所及两个师大部。

十一日 中央军委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现在傅作义集团向绥远、徐州、郑州、西安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稳定傅作义，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即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实行“围而不打”，对平津等地之敌实行“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不作战役包围。为此，要求东北野战军克服疲劳、寒冷等困难，加速赶进，完成既定部署，然后从容歼敌。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向东北野战军各纵师发出政治工作指示。指出：国民党在全国只有平津、徐州、武汉、西安、太原五个战场，“但兵力最大，对于全局有决定作用的，仅为两个战场，即徐州战场和华北战场。此两大战场均处于危境”。我军歼灭了这两个战场的敌人后，“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即无主力。那时长江以北局势即可稳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从此即可巩固地建立起来”。要求各部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为消灭傅作义集团而战。又指出：“平津是大都市和文化商业中心，为全国人民及国际人

士所注目，这就需要我们成为作战的模范，团结人民和友军的模范，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要求各部严格执行“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

同日 东北先遣兵团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追歼由沙城、怀来向北平逃跑的第一〇四军两个师及第十六军一部。

十二日 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歼灭黄维兵团后，刘伯承即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来前，总前委开一次会，研究下一步作战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由刘将意见带来中央。十七日，总前委在肖县之蔡洼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开会，研究渡江作战及整编问题。会后，刘伯承、陈毅同到中央汇报。

同日 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劝告其“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要再作无谓牺牲。

同日 华北“剿总”依据空军侦察，在宝坻附近发现东北野战军强大纵队向平津赶进的情况。急忙再次收缩防区，放弃南口、涿县、通县、及唐山、芦台等地，命令第六十二（欠一个师）、军由丰台、第八十六军由芦台撤至天津加强防御。第八十七军由唐山撤至坨沽，巩固海口。并将北平和天津、坨沽划为两个防区，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坨防区司令。

十三日 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薄一波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兼北平军管会主任、北平市长，黄克诚为中共

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根据林彪、罗荣桓的建议，决定以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一兵团部为北平、天津市卫戍区司令部，程子华为北平市卫戍区司令员，肖劲光为天津市卫戍区司令员。

同日 中央军委根据战况发展，决定撤销平绥前线委员会，南口以西平张线作战部队统由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东北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指挥第三、第六、第十及华北第七纵队，位于北平东面和东南面，防止北平敌人东逃；第二兵团程子华、彭明治（战中调任该兵团副司令）、黄志勇指挥第五、第十一纵队，位于北平南面，防止北平敌人南逃。

同日 华北局向平津地下党组织发出关于在解放和接管中如何工作的指示，“要求尽可能保证这些重要的城市与工业区完整的归于人民所有。”

同日 华北军区命令冀中、冀南军区及所能抽调的部队、军事学校学员和民兵，在保定、石家庄、衡水、沧州一线，堵截捕捉由平津溃退南逃的敌人。

十四日 中央军委命令淮海前线部队，在歼灭黄维兵团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以稳定蒋介石，不使其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

同日 自十二日至十四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占领

南口；第十一纵队包围宛平（现芦沟桥）；第五纵队攻占丰台；第三纵队占领通县；第六纵队进至郭县镇；第十纵队进至廊坊；第一纵队向宝坻前进；华北第七纵队进至黄村（现大兴）。至此，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切断了平津路。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保护北平和入城纪律问题作如下规定：①保护学校和文化古迹；②派兵看守应接管的单位；③对外侨和使馆采取保护政策；④指定东北第二兵团政法部及第四纵队入城后担任卫戍任务、并对部队进入遵纪教育。

十五日 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全歼黄维兵团四个军、十一个师，生俘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李延年指挥的四个军、八个师向淮河以南逃窜。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李富春、华北局，指出：预计我军在平津地区作战、休整及准备下步行动约需五个月时间，关于给养问题，决定由东北担负三个月，华北担负两个月的供应。

同日 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指挥北岳军区部队和内蒙军区骑兵第十一师及晋绥军区第八纵队之骑兵旅，攻克张北，歼地方武装一部。

同日 傅作义派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携电台至北平，在地下党员李炳泉引导下，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即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转达傅作义要求和平解决的意向：（1）参加联合政府；（2）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3）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放军要其仿效长春郑洞

国将军放下武器。二十三日，傅作义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赞成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希“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二十六日，崔载之返回北平。

十六日 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转入休整。华东野战军亦转入战场休整，一面围困杜聿明集团，一面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这时，杜聿明集团尚占据八十八个村庄，约五十平方公里）。

同日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解放石景山工业区。

北平、天津守军在市区赶修机场。十八日，北平东单机场竣工，并开始降落飞机。

十七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为中原、华东解放军司令部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书中说：“立即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同日 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令归绥守军三个师东进，准备于二十日进至单资山，然后进攻集宁，以配合张家口守军向西突围。同日，华北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命令晋绥第八纵队在集宁地区准备阻击该敌。

同日 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由南口西开，归华北第三兵团指挥，加强对张家口敌人的包围。

同日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攻占北平南苑飞机场，缴获飞机十余架及大批物资。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大捷电》。贺电说：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包围杜聿明集团，“凡此

伟大战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

二十日 东北野战军，先头第九、第八、第七纵队先后占领唐山、芦台、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及张贵庄机场，切断了津坊间交通，主力逼近坊沽，一部监视天津。第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纵队正由汉沽、山海关向津沽前进。至此，傅作义集团全部被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坊沽五地，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二十一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先取坊沽，后攻天津”，命令东北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准备，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当日，中央军委在来电指出：攻击坊沽的时间，以能否封锁坊沽来决定。又指出：敌人内部甚为动摇，“嗣后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劝降办法，即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

同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东北各纵、师，在接受地方支前中，必须注意团结友爱、遵守纪律。

二十二日 华北第二兵团经过充分准备后，于二十一日扫除外围，二十二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傅作义系统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一万六千人。

同日 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布告：
(1)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护民族工商业；
(3)没收官僚资本；(4)保护学校、医院及公共建筑不受破坏；(5)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不抵抗，不破坏，解放军一律不俘虏、不逮捕；(6)一切散兵游勇、警宪到公

安局投诚报到；(7) 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8) 解放军愿和全体市民及各界人士，共同维持秩序，免遭破坏。

同日 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及第一〇五军等部七个师(旅)五万四千人于二十三日拂晓放弃张家口，突围北逃。华北第三兵团、东北第四纵队及北岳军区部队展开阻击和追击，至二十四日将其歼灭于西店子至乌拉哈达一带，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脱。

同日 中央军委电示华北第二兵团，指出：大同国民党军有逃跑模样，命令该兵团立即结束休整，包围大同。同日，中央军委又令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东返归建，该纵队于二十五日到达沙河地区。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转达东北七纵的意见说：坨沽东临渤海，无法四面包围，又因距离远，炮火亦难封锁，地形复杂，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后，才能攻击。二十六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平津敌人有突围征候请示暂缓攻击坨沽、大沽。同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如平津敌人确有突围征候，应断然放弃攻击两沽计划，并考虑调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加强包围北平的力量。

二十六日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杜聿明集团正在日趋瓦解，“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华东野战军用写信、喊话、广播等办法向杜聿明集团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收效很大(从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就争取来降者一万四千人)。

华东野战军后勤部长刘瑞龙、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奉总前委之命在徐州召开支前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及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代表。会议讨论和解决了急需解决的粮食和民工等问题。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华北解放区共调集粮食五亿四千万斤，直接支前民工二百二十万人，另外，还有数百万临时民工。鲁中南、苏北群众抢修公路二千五百公里；滨海妇女一个月碾米四千万斤；渤海组成三千辆大车、五万辆小车千里运粮；豫、皖、苏仅新解放的宿西县即出担架五千七百付，牛车上千辆，肖县、宿县六天内筹粮一千万斤。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陈毅在战后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十七日 北平军管会接管清华、燕京（现北大）大学，受到两校师生热烈欢迎。清华大学师生纷纷向军管会控诉国民党十九日轰炸学校的罪行。

二十八日 粟裕、陈士榘、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报告说：淮河以南合肥等地敌人准备逃跑，建议以中原主力提前发起江淮战役。三十日，邓小平复电说：“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即有亦在南京、武汉附近，故仍以准备充分再发动似较妥善”。三十一日，中央军委指出：“淮南敌人是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休整”。

二十九日 林彪向中央军委建议：以五个纵队包围天津，如平津敌人突围，即先打突围之敌，如敌不突围即准

备攻击天津。当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五个纵队准备攻击天津。并令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由大同、张家口东调，加强对北平的包围，北岳军区部队由张家口西调，监视大同，冀热察军区部队守备张家口。

三十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揭露了美国及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玩弄的和平阴谋。指出：“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华北大捷电》。贺电说：我军“以出敌不意的手段”攻克新保安，解放张家口，歼灭康庄怀来之敌，“凡此伟大胜利，深堪庆贺，”望为解放平津而战。据不完全统计：在平津战役中，华北、东北两解放区共调集粮食三亿一千万斤，直接支前民工一百八十八万人，另外，还有数百万临时民工为部队修路、架桥、破冰、转运伤员、看管俘虏、磨米、磨面等。

一九四九年

一月

一日 中央军委电示林彪，指出：新保安、张家口敌人歼灭后，傅作义内部已经发生变化，应通过多种渠道认真地做傅作义的工作。通过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亦不要去南京开会，我军允傅部编一个军，其它军队一律缴械，希望傅作义派全权代表出城谈判。

同日 北平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军管会主

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到职视事，并发出军管会第一号布告。

同日 蒋介石发表声明：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的条件下，愿与共产党举行谈判。

二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正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所辖暂编第二十一、第一八一及暂编第五十二师，依次改编为第一四八、第一四九、第一五〇师。

华东野战军发布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命令。规定各部统于六日开始攻击，首先歼灭战斗力较弱的李弥兵团，尔后歼灭战斗力较强的邱清泉兵团。

同日 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并开始扫除外围据点和进行攻城准备。

六日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刘亚楼提出的以下意见，即在天津作战中，对外国人居住的房屋，凡有敌人设防并据以顽抗者，不论插有哪国旗子，都一律攻击之；凡无敌人设防和顽抗者一律不准攻击和进入，并加保护。同时指出：要注意保护工厂、学校，尽量减少破坏，对敌人占据的工厂、学校，尽量采取劝降的办法解决。

同日 林彪、罗荣桓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劝告他们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将保证其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及个人行动自由。

同日 傅作义派其高参周北峰偕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

张东荪第二次出城谈判。七日，聂荣臻与其谈判。周、张说：傅作义希望平、津、绥、坊一齐解决，军队不用缴械方式解决，可采取开出城外，以整编方式解决。九日，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和平接收平津”。应告诉周、张，平、津、绥、坊均应解决，但平津人民困难甚大，应先解决。平津守军应于十二日开出城外，按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周回北平报告后，要求宽限日期。平津前线司令部告知傅作义代表，北平方面可以宽限，但天津守军应先于十三日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否则我军于十四日开始进攻。

同日 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特务头子郑介民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调第十三军空运青岛。随后，傅作义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十五日，解放军炮轰北平市天坛机场，使蒋介石的空运计划破产。

同日 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击天津的部署：天津守敌为第六十二军(缺一个师)、第八十六军等部十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十三万人。东北野战军以五个纵二十二个师及特种纵队大部共三十四万人，由刘亚楼指挥，攻击天津。根据天津市南北长、东西窄和守敌南北强中部弱的部署特点，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部署是：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及第六纵队一个师共九个师，由西向东攻击；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第七、第八纵队共八个师，由东向西攻击；由第九纵队加第十二纵队一个师，共五个师，由南向北助攻；以警卫团等部在北面实施佯攻。另以第十二纵队

主力位军粮城，监视圪沽敌人。

八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从军事上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关于美军出兵干涉问题，决议说：我党从来就是将美国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划在我国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又说：“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减少。”

十日 华东野战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六日十六时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发起总攻。至七日，歼其十四个团，攻占三十五个村庄。八日调整部署，九日继续攻击。杜聿明不仅拒绝投降，而且施放毒气掩护其突围，但未得逞。至十日，全歼该敌，生俘徐州“剿总”副总司兼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共消灭国民党部队五十五万五千人。解放军伤亡十三万人。

同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平津战役，并领导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

十一日 华北人民政府向平津作战地区各级政府发出慰问平津前线将士的指示。本月二十一日，华北政府组成以副主席兰公武为团长的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与此同时，冀中行署派出一千八百辆大车，拉着慰问品分路到前线慰

问。

十二日 东北野战军自三日至十二日攻克天津外围东局子灰堆（辉德镇）等据点二十处，歼敌四千人。

同日 天津守军自八日至十一日三次出城到解放军天津指挥部谈判。解放军令其放下武器，守军先是要求宽限日期，以后又提出准其携带轻武器南撤，为解放军拒绝，并限其于当日十二时放下武器。

同日 江淮地区国民党军纷纷南逃。至二十五日，解放军先后解放怀远、五河、蚌埠、合肥、扬州等十四城。

十四日 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提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的八项条件。

十五日 东北野战军于十四日十时对天津发起攻击，十三时在东、西、南三面九个地段突破城防。十五日五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于金汤桥、金刚桥。经二十九小时激战，至十五时结束战斗，攻克天津，全歼守敌，生俘陈长捷。

同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十九日天津市军管会成立，黄克诚主任黄敬市长，到职视事。

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淮海战役彻底胜利电》。贺电说：“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使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河以南地区大部入我掌握”，特致热烈的庆贺和慰问。

同日 圉沽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第八十七军等部五个师，乘船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解放

圯洁。

十九日 刘亚楼、谭政检查天津破坏情况和部队执行纪律情况，并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天津工业区除中纺七厂因敌顽抗毁于炮火、中纺六厂略有破坏外，无大破坏；市区除东西突击地段及警备司令部破坏较大外，无大破坏。各部队均能严格执行纪律和政策，基本作到了“缴获归”，“原封不动”的规定。当日恢复了水电和交通，秩序良好，甚得中外人士好评。二十一日，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模范执行纪律的部队。

二十日 傅作义派“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偕周北峰第三次出城谈判。林彪、罗荣桓曾于十六日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二十日，傅作义来电说，北平守军于二十二日开始离城，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二十一日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包围北平的各部队，自本日起，停止攻击。

同日 傅作义在华北“剿总”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宣布接受和平改编的协议。

同日 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由南京飞奉化，进行幕后指挥。

二十二日 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代表议定：在绥远方面，双方先停止战斗，恢复交通，等待谈判解决。三月二十三日，解放军代表李井泉、潘纪文、张友渔和傅作义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商谈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六月八日双方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七月二十六日，傅作义、

邓宝珊飞归绥、包头对守军进行工作。九月十九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宣布起义，所部四万余人，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同日 北平守军第一〇一军及骑兵第四师首先开到城外邢各庄一带，听候改编。

三十日 按照协议组成联合办事处并开始办公。解放军代表为叶剑英、陶铸、徐冰、戎子和，傅作义代表为郭淙汾、焦实斋、周北峰，共七人，叶剑英为主任。

三十一日 华北“剿总”、第四、第九兵团部、第十三、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重建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一〇四(重建的)第一〇一军军部，共二十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连同特种部队、地方武装，总计二十五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奉令开入城内担任卫戍任务。北平古城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剿总”、三个兵团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一个整师，连同其他部队，总计五十二万人。解放军伤亡三万九千人。

二 月

二日 中共中央发出《贺北平解放电》。贺电说：“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

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三日 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庄严的入城式，受到北平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日，北平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入城办公。

八日 林彪、聂荣臻和傅作义在融洽欢畅的气氛中会面。傅作义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林彪、聂荣臻在谈话中，赞扬了傅作义将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的贡献，勉励其消除顾虑，真诚合作，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十四日 新华社发表《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天津战役特点》。发言人说：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在水网地带以极短的时间，一举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表现了解放军各兵种协同作战更加熟练。这种熟练地、合拍地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勇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人民群众全力支前和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配合作战，是这次战役迅速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战役的另一个特点，是解放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群众纪律，在这一点上，解放军更足以作为楷模。

十五日 北平市二十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庆解放。北平市长叶剑英、人民解放军“塔山英雄团”团长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代表讲了话。

二十一日 平津前线司令部召集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兵团、军、师三级军官开会。平津前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宣布自本日起，结束接受改编部队原有的指挥关系，正式隶属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并宣布改编方案：

原华北“剿总”、第四、第九兵团部及八个军部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所属二十五个师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并授予番号；各级军官按其自愿，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或到学校学习或回原籍；自愿回原籍者，发给证明书、路费及三个月的薪金，家在解放区者，可分得应有的一分土地。林彪、罗荣桓讲了话，原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代表傅作义出席了会议。

二十三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在谈话中，共同商谈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时间和办法。

三 月

五日 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重点已由农村转入城市。在评价三大战役胜利时指出：“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解决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是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二十五日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西柏坡进入北平城。由此，北平就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附录: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至第二十辑目录

第 一 辑

- 发刊词 廖盖隆 (1)
-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4)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 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 赵 镠 (18)
-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 廖盖隆 (29)
-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彭嘉庆 (48)
——记陈云同志主持的“七道江会议”前后
- 我的回忆 王维舟 (69)
- 一、幼年时期 (70)
- 二、三年学徒 (71)
- 三、辛亥革命与光复川东绥定、东乡地区前后 (72)
- 四、护国之役 (78)
- 五、在川东时期的旧军队生活 (79)
- 六、寻求真理，加入朝鲜共产党 (82)
- 七、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85)
- 八、“赤心社”与“俄灾救济会”的活动 (86)
- 九、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大革命的斗争 (87)
- 十、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88)
- 十一、红三十三军的成立及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97)
- 十二、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长征到陕北 (101)
- 十三、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 (106)
- 十四、陇东十年 (107)
- 十五、解放战争时期 (110)

十六、伟大的十年	(112)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114)
一、青少年时期和家庭	(114)
二、走上革命道路	(119)
三、在苏联的五年半	(130)
四、回国前后	(149)
五、在中央苏区	(154)
六、为李德作翻译	(167)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 (180)
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	高文华 (184)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刘培植 (189)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经过	胡琦 何华生 许明修 (211)
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	罗征敬 (224)
· 参考资料摘登 ·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238)
· 参考资料选译 ·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摘译	美籍华人郭成棠 (256)
一、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	(256)
二、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点	(288)

第 二 辑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序言	谭震林 (1)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5)
第一章 转折	(5)
第二章 突围	(17)
第三章 会合	(28)
第四章 新起点	(36)
第五章 北山事件	(44)
第六章 反“清剿”	(56)
第七章 扎根	(72)

第八章	反搜山	(82)
第九章	大发展	(94)
第十章	“两面政权”	(105)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118)
第十二章	突变	(129)
第十三章	谈判	(139)
第十四章	集中	(150)
第十五章	下山	(157)
	后记	(168)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		(170)
七、	遵义会议前后	(170)
八、	长征途中	(178)
九、	从东征到陕北边区政府	(187)
十、	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193)
十一、	在延安军委总部	(203)
十二、	到东北	(211)
十三、	在军调部执行小组	(216)
十四、	在东北军区	(222)
十五、	开国和回乡	(230)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罗明 (234)
一、	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	(234)
二、	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及其恶果	(252)
三、	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关系	(258)
四、	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	(260)
五、	几点经验教训	(268)
	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271)
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黎玉 (277)

第 三 辑

关于一大的回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3)
——张国焘给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16)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	(23)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26)
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 (一九三六年七月)	(60)
陆定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	(66)
——团结问题和路线问题	
附：陆定一同志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	(8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88)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1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事日志	(132)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 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	(164)

第 四 辑

答薛暮桥同志	刘少奇 (1)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内战时期白区工作 问题	(7)
——薛暮桥同志给少奇同志写的报告	

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	李志民 (20)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三)	(54)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	成仿吾 (147)
黄安县委关于黄麻暴动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189)
平江扑城暴动	钟期光 (208)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一、二、 三次“围剿”	崔田民 (218)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马辉之 (259)
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独秀 (316)
附: 简释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	陈旭麓 (329)

第五辑

· 文 献 ·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周恩来 (1)
------------------	---------

· 专题报告 ·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	(7)
中央党史研究室	

· 回 忆 录 ·

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	(18)
第一章 在中央苏区	(18)
一、到中央苏区去	(18)
二、到一军团工作, 参加打漳州	(24)
三、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38)
四、到建宁、黎川、泰宁开辟新苏区, 鏖战浒湾	(45)
五、反第四次“围剿”	(51)
六、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62)
七、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70)
八、政治思想工作	(85)

第二章 长征	(94)
九、突破敌人一、二、三道封锁线	(94)
十、奔袭道州，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101)
十一、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112)
十二、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20)
十三、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128)
十四、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139)
十五、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150)
十六、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154)
十七、出腊子口，在吴旗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164)
十八、打直罗镇，献奠基礼	(172)
第三章 在陕北	(179)
十九、东征	(179)
二十、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189)
二十一、山城堡战斗	(200)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209)
八七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209)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和我对几个决议案的看法	(223)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和我去两湖巡视的情况	(256)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基本结束	(279)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290)
· 专题访问 ·	
黎川事件的真相——访肖劲光同志	李泽才 张炜 (305)
· 读者·作者·编者 ·	
回忆周恩来同志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一些	
情况	吴 青 (317)
对《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的	
补正	孔 原 (321)

第 六 辑

· 遵义会议专题资料 ·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 云 (1)

附：发表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说明

..... 编 者 (11)

陈云同志对《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
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 (13)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6)

附图：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营时间
示意图

附录：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3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
决议大纲 (55)

张爱萍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书写的诗词二首 (59)

· 回 忆 录 ·

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 曾 三 (61)

庚申忆逝(之一) 张稼夫 (73)

回忆无锡秋收暴动 徐彬如 (141)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 方卓芬 (148)

记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 勇龙桂 刘志诚 (166)

· 年 谱 ·

罗荣桓年谱(初稿) 《罗荣桓传》编写组 (173)

第七辑

·文 献·

忆友人詹大悲 董必武 (1)

·回 忆 录·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一) 李志民 (21)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 (143)

——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

一、初到中联部(1958—1960) (143)

二、参加庐山会议(1959.8) (152)

三、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6) (156)

四、东欧四国党代会(1962.11—1963.1) (168)

五、二去莫斯科(1963.7和1964.11) (189)

六、出席罗共“九大”(1965.7) (206)

七、参加“四清”(1965.10—1966.4) (211)

八、二访阿尔巴尼亚(1964.11和1966.10) (215)

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 肖 华 (226)

·党在各地活动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沿革概况(初稿)

(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五年) 王景 金字钟 (264)

·读者·作者·编者·

敬告读者 (288)

来函摘登 (289)

第八辑

·文 献·

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1)

杨尚昆同志答复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 (11)

——关于遵义会议前夕是否开过中央会议问题

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给杨尚昆同志的信 (12)

·回忆录·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李维汉 (13)

附录：动机与立场 罗 迈 (51)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二) 李志民 (55)

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钟期光 (182)

回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一段斗争 杨成武 (211)

——在河北省委召开的冀中人民斗争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庚申忆逝(之二) 张稼夫 (239)

收复张家口之战 段苏权 (293)

·大事记·

延安整风运动大事记 贺晋清 (313)

·考证·

有关平江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 吴定邦 晓 玉 (359)

第 九 辑

·文 献·

陆定一同志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

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 (1)

·回忆录·

北伐纪实 肖劲光 (27)

回忆苏中战役 粟 裕 (56)

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 罗 明 (98)

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汪 锋 (101)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 白如冰 (117)

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明远 (139)

湘鄂西工农红军第四军编制的前后变化情况 张 德 (154)

·专 访·

叶剑英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后 陈 力 (165)

新疆航空队始末 欧阳如华 (204)

· 传 记 ·

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 朱 瑞 (217)

· 人物介绍 ·

创建闽西苏区时期的邓子恢同志 蒋伯英 (266)

· 小 资 料 ·

西安事变, 红军南下支援抗日友军 (203)

第 十 辑

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 陈 云 (1)

· 回 忆 录 ·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维汉 (6)

山西抗战的回忆 任弼时 (53)

国民党改组前后和大革命的失败 吴玉章 (70)

解放长春 肖劲光 (92)

洛川会谈前后 钱之光 (122)

艳晚事件 宋 黎 (139)

忆川陕根据地时期与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 徐以新 (160)

回忆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成长历程

..... 陈 健 梁威林 (169)

· 专题调查 ·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
发展概况

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 江苏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合编 (181)

浙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

.....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245)

大连“福纺”厂罢工始末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255)

· 人物介绍 ·

怀念黄道同志方志纯 (285)

· 考 证 ·

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的经过郑建英 (296)

第 十 一 辑

· 文 献 ·

彭德怀同志对美军视察组的谈话 (1)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结论部分

· 传 记 ·

吴玉章略传吴玉章 (10)

· 回 忆 录 ·

皖南惨变记(节录)钱俊瑞 (74)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李志民 (195)

· 宁都暴动档案资料 ·

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信 (255)

刘伯坚致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信 (258)

红十二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 (26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263)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敬告全国士兵兄弟书
..... (26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
士书 (276)

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
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 (279)

中革军委关于调送一批本地战士给五军团的命令 (284)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	(285)
中革军委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问题的训令	(288)
宁暴经过	董振堂 (290)
二十六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	(294)
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	(296)
中革军委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	(306)
· 专题资料 ·	
内蒙古蒙旗独立旅的创建前后	乌嫩齐 (308)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	袁 伟 (327)

第十二辑

编者的话	(1)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摘录)	毛泽东 (3)
邓颖超同志给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的信	(4)
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 (5)
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断回忆	孔 原 (46)
关于南方局的组织机构和南方局组织部的情况	荣高棠 (57)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 巩固的主要情况	廖志高 (69)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 (105)
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	高文华 (131)
建设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卓越思想和光辉实践 ——记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的革命活动	郑新如 (162)
南方局军事组前段(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	

工作概况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军事组	(203)
附件：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象		(232)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	童小鹏	(245)
南方局整风学习运动的部分情况	王 汶 姚黎民	(273)

第十三辑

· 回 忆 录 ·

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	李维汉	(1)
从百色到湘赣	袁任远	(49)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80)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	黄火青	(100)
开辟辽东根据地	肖 华	(113)
老航校诞生前后	黄乃一	(151)

·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 ·

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	张 颖	(190)
我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营救行动		
.....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	(212)
关于胡世合事件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工运组 重庆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228)

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

.....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	(246)
-------	----------------	-------

· 专 访 ·

屈武谈周恩来敦促张治中释放被关押在新疆的一批 共产党员的情况	欧阳如华	(272)
来函摘登		(280)
本刊征稿启事		(282)

第十四辑

·回忆录·

- 初到陕北李维汉 (1)
- 长征中的红一师李聚奎 (21)
- 对我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历程的回忆许涤新 (64)
- 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
情况刘 晓 (87)
- 从山东到太行肖 华 (108)

·人物介绍·

- 长征中的彭德怀同志蒋宝华 (129)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

- 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
.....钱之光 (178)
- 从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 (224)
- 香港《经济导报》的创刊及其活动
.....赵元浩 雷起予 林 铃 方卓芬 (263)

第十五辑

·历史文献·

- 迎接一九四一年邓小平 (1)

·回忆录·

- 回忆陕北公学李维汉 (18)
- 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李运昌 (57)
- 解放军打到那里 火车就开到那里吕正操 (81)
- 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

·东北抗联党史资料·

-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和党的领导罗占元 李秉刚 (96)
-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李鸿义 王 景 (128)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张一波 袁鲁毅 (173)

·党在各地活动史料·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

.....丁晓春 (189)

太岳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的沿革

.....阎文彬 宋荐戈 卢海明 (223)

第十六辑

·文 献·

晋西北之今昔贺 龙 (1)

·陈云同志对两个问题的答复·

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11)

对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恢复陈云同志当年居室旧址

的答复陈 云 (12)

·回 忆 录·

真假和谈的斗争李维汉 (13)

——记北平和谈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乌兰夫 (35)

从苏北到东北黄克诚 (56)

——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的回顾

李聚奎回忆录(摘登) (82)

平江起义 (82)

留守井冈山 (103)

返回湘鄂赣 (117)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辽东根据地

.....江 华 (131)

在坚持黔东斗争的岁月里段苏权 (155)

我所了解的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前后国共合作 的有关情况	钱之光 (174)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	郑伯克 (196)
· 大 事 记 ·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大事记	黄修荣 (216)

第 十 七 辑

· 文 献 ·	
支持华北抗战中的八路军	任弼时 (1)
· 回 忆 录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节录)	李维汉 (10)
北伐战争时期	(10)
大革命的失败	(45)
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	肖劲光 (61)
回忆我党在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的工作	蒙定军 (84)
内蒙工作的回忆	刘 春 (111)
我的回忆	李伯钊 (167)
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央党史 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	(188)
彭涛同志谈“一二·九”运动	(191)
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	(197)
· 资料综述 ·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纪略	黄 铭 (211)
· 专题资料 ·	
黄麻起义	(220)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党的组织机构、领导 人员变动情况及其主要活动	(241)

第十八辑

· 文 献 ·

关于“三勤”政策周恩来 (1)

附：“三勤”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策

.....吴瑞章 黎勤 (4)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

.....林伯渠 (16)

陈毅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在盐阜区各界座谈会

上的演说 (52)

附：盐阜区士绅座谈会工作经验 (78)

· 回 忆 录 ·

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点线工作

委员会的情况姚依林 (85)

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胡愈之 (97)

一次重要罢工的回顾周林 (143)

抗日战争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小林青 (151)

· 人物介绍 ·

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

.....王刚 李青 余鉴则 (164)

· 专题资料 ·

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

概况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81)

抗战时期党在赣南“工合”中的活动和作用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

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

.....杨圣清 谭宗级 (211)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金宇钟 常好礼 (226)

第十九辑

· 文 献 ·

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

- 总报告(节录) 邓子恢 (1)
- 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 张鼎丞 (22)

· 访问纪录 ·

-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张云逸 (33)

· 回 忆 录 ·

- 浙东四年 谭启龙 (39)
-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 任质斌 (63)
-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 汪金祥 (82)
- 江淮春晓 谭希林 (104)

· 日记摘登 ·

- 《秦蜀日记》摘录 武志平 (113)
- 对日记的补充和说明 (158)
- 附件: (一)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信 (169)
- (二)孙蔚如给武志平的信 (171)
- (三)王宗山给武志平的信 (173)

· 专题资料 ·

淮南抗日根据地概述

-《淮南抗日根据地》资料编辑会 (174)

浙东抗日根据地概述 浙江省委党史办公室 (196)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

-“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征编组 (220)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报

-凌步机 (245)

第 二 十 辑

· 文 献 ·

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聂荣臻 (1)

· 回 忆 录 ·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肖劲光 (27)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宋任穷 (64)

塞北抗日回顾 高克林 (99)

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张子燮 (117)

· 专题资料 ·

英明的战略决策, 卓越的指挥艺术 罗焕章 (143)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战略展开

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效果 成汉昌 (160)

· 日记摘登 ·

阵中日记(摘录) 《阵中日记》编辑组 (186)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